看世界

傅莹◎著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看世界

作者:林帝浣

ISBN:9787508688381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2014

27/5

傅莹应邀出席“中国与邻国：推进共同繁荣与发展”国际学术论坛并发表主旨发言。



2015

20/5

傅莹应邀出席美国芝加哥大学首届美中关系论坛框架下的学生公开论坛并发表演讲。



2015

29/7

傅莹应邀出席新加坡第 22 届国际战略研究所富丽敦论坛，并发表演讲。



2015

31/10

傅莹应邀出席 2015 年京城国际论坛，并主持与基辛格博士的公开对话。此图为傅莹扶基辛格博士上台演讲。





2015

1/11

傅莹应邀出席国创会“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并在午餐会上发表演讲。

2016

13/2

傅莹应邀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并在“中国与国际秩序”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





2016
25/10

傅莹应邀出席俄罗斯瓦尔代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

2017

1/2

傅莹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与青年学者交流。



2017

24/6

傅莹应邀出席第六届世界和平论坛，并发表演讲。



自序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

我希望这部文集能为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尽绵薄之力。这是我的第二部文集，大部分是2015年到2017年在国外的演讲，以及在外国报刊杂志和网络媒体上发表的文章，有几篇是更早的，其中不少在国内发表过。感谢中信出版社把这些文稿收集到一起，建议我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出版。本书共收录了40篇文稿，分为九个篇章，包括秩序、格局、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以及亚洲问题等。

人在往前走时不太会想到丈量脚下，隔了一段时间回头看才发现，原来已经翻过了那么多座山，趟过了那么多条河。重新审读这些文章时，意识到这些年还是做了不少思考的，观点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深化。如今一并呈现在大家面前，多少有些惶恐。因是在不同场合谈及，且囿于时间空间的限制，对一些看法的阐述难以系统和周全。例如关于秩序问题，就在不同文章中反复出现。有的文稿是根据谈话整理的，基本保留了原来的语言风格。

这部文集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如何看世界，旨在回应当时国际上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有的文稿在草拟过程中吸纳了不少学者的意见，有些看法是经过讨论甚至是辩论而形成的，也有的文章得到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指点，也不乏尖锐的批评。这个过程让我受益匪浅，使得一些观点能在一次次打磨中抽丝剥茧、聚沙成塔。

当世界即将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最后阶段之际，国际形势纷繁交织的变化逐渐显现出头绪。美国作为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主导性国

家，不愿继续承担全球义务，从一些领域的“领导责任”中退出，这对美国自身及其盟友产生比较大的震荡。2017年12月我在欧洲参加了三场论坛，人们关心的两大问题：一是美国是否会继续收缩国际战略和部署？换言之，没有了美国“领导”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二是谁来填补“真空”？会是中国吗？

显然，当美国的“领导”角色陷入疲态之际，人们把目光转向中国，想知道中国能为世界做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人们希望从中更好地了解中国，判断中国未来的方向和对世界的影响。

另一方面，目前外界对中国仍然缺乏全面了解。长期形成的偏见并没有消除，一些人继续用旧的思维惯性揣度中国的战略和目标，美国对中国的警惕和疑虑正在上升，新的错误认识和判断仍在生成。中外语言文化的差异也容易带来理解问题。

中国在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过程中，需要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向哪里去？要成为什么样的世界大国？

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是在用改变自己的方式改变世界的，也需要通过更好地阐释自己来让世界信服。一个大国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遭遇各种阻力，我们需要多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以赢取更多的了解和理解；不主动讲，谬误就容易越积越多。赢得理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的许多主张需要多讲、反复讲。

出版这部文集，既是向努力思考和探索前行的同仁们致敬，也是抛砖引玉。在此谨向帮助我的学者和助手们表示衷心感谢。有些文章和演讲是用英文发表的，也要感谢提供协助的翻译和朋友们。

傅莹

2018年1月20日

世界秩序

2014年是世界秩序转折之年㊟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国际上高度关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从年初到年中，西方国际研究学界中出现了一种观点，担心亚洲出现紧张甚至冲突，认为中国有点像“一战”之前的德国，经济高速发展，民族情绪高涨，军备快速增长，对中国是否会走上地区扩张道路有许多议论。在5月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论坛上，这种观点十分盛行。

但是2014年发生的事情与西方学者们的设想完全不同。10月份我和一些中国学者一起访问美国，走访了7家智库。当时美国学者关注的是四大热点和难点问题，排第一位的是埃博拉疫情，美国社会几乎出现恐慌，担心国家对输入性传染病没有足够的手段应对。排第二位的是“伊斯兰国”组织（ISIS）——一个组织优良、目标明确、手段狠辣，而且有西方教育出来的年轻精英参与其中的极端恐怖主义势力。在美国无心无力再度向海外大规模投送兵力之际，这种挑衅显得十分棘手。排第三位的是乌克兰危机，美欧与俄罗斯的较量难解难分，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一直带有强烈的政治情绪，有学者甚至预言将出现新冷战。排第四位的是全球经济恢复缓慢，美国对自身经济能不能强劲复苏不托底。

在2014年进入尾声之际，美国和其他国际关系界学者反观年初对中国和亚洲的判断，觉得至少不似上述问题那么紧迫和现实。尤其年底油价持续下滑，突破了所有人预期，更显得当代世界大事的游走方式扑朔迷离。国际社会对中国作用和与中国合作期待进一步上升，当然，美国对中国的担心和疑虑并无减少。

从全球秩序的角度看，2014年具有转折性意义。无论是在2014年发生的事情，还是大家对2014年的看法，都显示出现存世界事务的治理方式正走向终结。美国学者在探讨2014年面临的国际难题时，表现出一种无奈，认为许多问题都"无解"。确实，现存世界秩序在应对新问题和新现象上明显吃力，现有工具箱里的手段已经解决不了出现的新型问题，今日世界对国际体系和秩序改革的需求和推动力都在增强。这可能预示着，后冷战时期将走向终结，需要开启新的构建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00年间，世界经历了许多。"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没能建立起支撑公允和持久和平的国际体系。"二战"后国际关系中的雅尔塔体系本质上也是基于大国划分势力范围，即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苏美争霸使世界陷入长达40余年的冷战，尽管竞争和对抗激烈，但是两大集团力量的相对均衡维系了世界大体和平。"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治理机制日臻成熟，并且在后冷战时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现在，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场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在全球力量结构中所占比重逐步上升。同时，在世界全球化、信息化和多极化的推动下，跨越国界的人员流动和经济活动十分广泛和活跃，也使人类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和具有多重性特征，传统的认识和处理方式需要调整。很多发生的事件和问题，表面上看各有各的原因和逻辑，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但归结到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国际控制力和治理能力不适应新的环境，世界主要国家对一些问题的判断失误、处理失策、应对失序，往往导致问题的扩大化和复杂化。例如恐怖主义的上升和埃博拉疫情的扩散就明显有初始处置不当的问题。

为什么世界会出现这种情况？从世界秩序的角度讲可以关注以下因素。

一是美国的因素。冷战结束后，美国居于对世界事务的掌控地位，现阶段出现的国际失序在很大程度上有美国的责任。首先是美国的道义地位发生了动摇，尤其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再者美国外交决策出现了问题，两党政治争夺导致决策成本高，判断力下降，敏感度不够。最重要的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世界发展大趋势的判断出现了错误，一直滞留在冷战轨道上，试图通过军事手段维系霸权。美国在全球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目的是掌控世界，服务于自身利益。如果说2014年对世界秩序是一个转折点的话，最根本的就是美国推行的这套东西行不通了，需要调整。

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力量的因素。中国经济总量已攀升到世界第二位，新兴经济体按市场汇率法计算的GDP占全球比重达到50%。然而，美国等传统力量虽然治理能力下降，并没有让出空间的意思，整个新兴力量也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挑大梁的程度。新兴力量多是发展中国家，它们在国际理念上对西方传统做法不认同，因而从主观上还没有表现出填补治理空间的意愿。在如何改造和调整世界秩序的问题上形成共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是其他中间力量的因素。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居于传统力量和新兴力量之间。这些国家工业化基础好，有介入国际事务的意识和经验。但是在这个动荡时期，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自顾不暇，难以发挥大的影响。其他中等力量也把重点放在具体利益上，对国际事务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第三股力量还没有形成。

这可能是一段比较混沌的时期，也是风险极高的阶段，一些小事处理不好会演变成大事。而这个时期恰恰又是我国特别需要和平稳定的阶段，2020年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因此，今后五年国际形势的走势和我国与世界的总体关系对我们自身的发展是极其关键的。

未来美国会怎么样？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保持经济恢复的强劲势头，经过一个短暂时间的耐心经营，恢复国家实力，再度拉紧与欧洲和日本等盟友的配合关系，并且重建国际威信和信誉。如果在这段时间其他国家不能及时做出调整甚至犯错误，美国则有可能重新赢得对世界事务的掌控能力。美国依托的是两洋霸权，其冷战时期的重点一直是大西洋关系，而在后冷战时期它把投入的重点放在中东。目前，考虑到亚洲地位的重要性，美国已经开始把重心转向太平洋。美国未来的国际影响力首先取决于综合实力能否彻底恢复过来，在这点上它需要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合作。二是中国等新兴国家能否持续增长，抑或停滞甚至出现新的危机。

美国的第二种可能性是继续相对弱化，沦为多强之一，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美国目前的经济恢复还不够扎实，油价下跌则是双刃剑。全球经济能否总体上走向复苏对美国也很关键。还有一点很重要，美国在国际事务上搞双重标准和以己划线的做法对其形象是很大的损伤，也不适应世界和平发展总趋势的要求。在这些问题上如果美国不能做出调整，也难以再度赢得国际上的广泛接受。

考虑到当今世界美国和中国的特殊位置，两国对自身的把握和对彼此关系的把握对于世界将来向哪个方向发展至关重要。再搞均势那一套恐怕不符合21世纪复杂国际环境特征，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多次探讨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想法，是一个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大思路。这需要两国通过一次次的对话和一个个的重大合作来逐步落实。

其他力量也值得关注。欧洲结构改革步履维艰，即使好转，一时也难以回到从前的地位。俄罗斯则更加困难，即使缓过气来也落下内伤。日本的增长继续陷入停滞。但这些国家有可能构成第三股力量，它们往哪个方向靠，哪种道义力量能把它们吸引过来，将是影响国际

格局的关键因素。这些国家也将在自己走出困境的过程中构建新的依托和合作关系。

2014年中国的国际作为不同凡响，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中国自身的表现都具有转折意义。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中国需要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2014年中国的国际作为可以用“积极主动”来形容，中国依托自身优势提出了一系列地区和国际合作的倡议和外交理念，最具代表性的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6+1”的合作也加快了步伐。中国在应对埃博拉疫情上出手有力，投入的人力和财力都居全球之首，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担当国际责任的勇气和能力。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可以发挥的作用必然相应增长。

但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是历史性的。中国没有作为世界大国在国际舞台上运作的历史经验，民众对介入世界事务也缺乏国际体验，尚处在一个学习和适应的阶段。同时，中国已经提前开始面对复杂和困难的国际局面。中国是现存秩序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同时也是改革者。在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秩序改革和建设上，我国与许多国家已经建立起共识并且取得一些成果。但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之间仍存在深层矛盾和分歧。中国对未来世界秩序确立什么样的构建蓝图？如何通过主动参与重大国际事务，并在秩序构建上提出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和可行的中国方案？这将是我们未来需要认真思考的方向。

在当今这个充满变化和动荡的转折时期，中国需要调动智库力量积极建言献策。例如，对国际上普遍关心的“未来中国将如何使用自己力量”的问题，中国智库应该拿出自己的主张和建议。我们应该很冷静地、用全新的心态来看我国未来的国际角色和外交路径。

再如，作为新生的世界大国，我们能否保持谦逊、自省的心态和压力意识。事实上，我国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依赖不亚于世界以及其

他国家对我国的依赖。把握自我认识对大国的成长也很重要。

又如，我们能否扩大国际视野和培育国际主义精神。作为大国，我们需要逐步地把自身利益放到国际视野下去看，有世界和平才有中国的和平，世界整体的增长有利于中国的增长。对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凡事若放到共同利益的盘子里去考虑，通过谋求共同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阻力会更小些。当自身利益与共同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时，有时可能舍小利益来维护大利益，比争小利益毁掉大利益要好。

还有，大国需要考虑言论和行为的后作用力和反弹力，包括国内的反响和国际上的影响。当一个大国，包括新兴大国，在国际上操作时，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不引发后果。因此，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不仅需要考虑到自己的需要，也要考虑到国际受众的感受。我们在世界上提出新的主张和倡议时，需要有更多的国际意识，强调合作和共同利益，增强能够赢取人心的软实力建设。

当前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智库发展面临大好时机。智库的任务一是为决策提供参考意见，二是对国民和国际社会进行政策传播。从中国目前的状况看，需要加快扶持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智库发展，决策机构与智库之间应该进行更加有效的沟通，需要在这方面设计和构建适当的平台。中国智库和学者需要努力提高自身思想政治水平，增强讲中国故事的能力，努力承担更大责任，帮助国际上更好地了解我国的制度和政策，为未来中国更多参与地区和世界事务提供智力支持。

---

1. 2015年1月8日，傅莹应邀参加《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研讨会并发表讲话。讲话全文发表于《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期。

进入21世纪的“秩序”争论[注]

引子

在全球化大潮的带动下，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快步提升。这是否会给21世纪的世界秩序抑或国际秩序带来新的变革？

中国于2010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历史文化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也正处在深刻变革的过程中。

我常听到的问题是：中国想向世界要什么？能给世界带来什么？中国是否要挑战美国主导的现存秩序？

对于一个1993年才停止印发配给粮票的中国来说，这些问题似乎来得太早。实际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是第一代成长中没有遭遇饥饿的中国人。确实，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但普通中国人更关心的是人均GDP，因为这才是决定生活条件的关键。

但是中国人并非对世界毫不关心，源于殖民时代的不平等世界秩序，给中国人对国际关系和秩序的观念留下深刻印记，他们从自身的体验中形成了强调包容和公正的国际秩序理念。现在，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国人关于秩序的讨论也相当活跃。中国学者关心：什么样的秩序能更好地服务于21世纪世界的需求？很多人在这场争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今天我希望从学术的角度，分享个人观点，权当“抛砖引玉”。首先谈谈怎么看当前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之后是关于中国对国际秩

序的一些体验，以及对两者的比较分析，最后谈谈对当前秩序面临挑战的看法。

一、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

基辛格博士的名著《世界秩序》一书对此有最全面的阐述，他对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根基延续至今的世界秩序有很深的理解和认同，同时也主张这个秩序需要现代化。

确实，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减少了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催生出支撑现代国际关系的法律和机制框架。然而，它从构建之初就是一个西方秩序，而不是作为普世原则来考虑的。对许多被殖民的国家来说，这个秩序更多像是一个排他性的政治、军事小圈子，这也成为其后来的内在弱点。当时世界其他地区还有很多与之并存的秩序观。

美国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完成崛起，确立了在近代西方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快速将西方秩序扩展至全世界。1990年11月美国总统布什正式提出“世界新秩序”的美国全球战略新构想，强调美国不可替代的领导地位。归纳起来看，这个世界新秩序包括三个支柱。一是作为道义制高点的西方价值观；二是作为安全基石的美国军事同盟体系；三是以美国制定的国际经济金融规则和制度安排为基础的全球经济。在美国的世界秩序观念中，联合国体系反映和贯彻了美国领导下的秩序原则与规范。

无疑，现存秩序对全球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资金、市场、技术、生产在向全球各个方向扩散，为长期处于边缘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良机。像中国这样贫困的人口大国正是抓住了这一良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两个月前我访问印

度时，到处听到如何吸引外资、如何创新的议论，可以感受到又一个大国经济起跳的跃跃欲试。

然而，目前这个体系的三大支柱都面临挑战。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凸显了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上的缺陷。在政治领域，西方价值观的全球推广不仅成绩寥寥，而且后遗症严重。在安全领域，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没有克服集团政治的弊病。例如在亚太地区，给人的感觉是，美国似乎更加重视其盟友的安全利益，甚至将其凌驾于中国这样的非同盟国家的安全利益之上。

更为令人忧虑的是，它没能为许多新的现实挑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许多非传统和跨领域的安全威胁越来越多地控制全球议程，而美国受制于国内外的诸多因素，其领导力常常差强人意。

我前不久访问美国时，不少美国智库正围绕谁会成为新的战略目标、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等问题开展新的讨论。

基辛格博士说，他现在思考最多的是美国还有多少时间和空间来维持现存秩序，并构思未来的新秩序。他认为中美需要合作，但未来不会一帆风顺。

看起来，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面临的一大考验就是，能否根据形势变化做出调整，能否与世界舞台上的新兴力量合作而不是对抗。

二、中国人的“国际秩序”观念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中国人对国际秩序的体验。这里我使用的是“国际秩序”而非“世界秩序”，因为这两者并不完全一样。

中国所认同和支持的国际秩序，是指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框架和围绕这个框架形成的一系列机制，认为它是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根基，它所秉持的国家之间平等相处的基本原则和规范赋予它国际公认的合法性。

2015年6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清华大学主办的第四届世界和平论坛上专门谈到中国对秩序的观点。他说，中国直接参与设计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中国将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中国在封建王朝的漫长历史时期，维持了与外部世界稳定而有限的关系，发展出自己的天下观。当然，当时的地理知识是有限的。19世纪，西方的炮舰外交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破坏了中国人传统的天下观、秩序观。从那时起，中国开始努力融入到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这一进程伴随着痛苦、艰难和挫折。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逐步接受了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的讲话中，向世界阐释了中国的现代秩序观。他指出发展中国家争取政治独立的重要性，并强调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40年来，中国始终秉承这一政策理念，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到，要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015年4月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亚非国家领导人系列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要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也谈到中国将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中最为积极和活跃的成员之一。例如，中国已经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维和人员贡献最多的国家。

由此可见，中国对国际秩序采取的一直是融入的思路，而中国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也受益良多。同时，中国十分强调国际秩序中公平、公正、开放、平等原则的重要性，支持对现行国际秩序一切有必要的改革，以适应新的现实。我们主张这些变革应当是渐进式的。

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积极推进了这一进程的发展，推动二十国集团（G20）、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金砖国家、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等合作机制取得进展。中国主张不断推动和深化以联合国为核心的现有体系的改革，提高其运作效率、覆盖范围和代表性，希望最终催生一种更健康和更公正的全球市场和惠及各方的发展环境。亚投行的建立得到了50多个国家的支持，就充分说明了这个方向的正确性。

在国际安全合作领域，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新型安全观。我们不主张构建排他性的安全模式，而是希望为地区乃至全球寻求一种综合性与合作性的安全结构，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和亚信会议是这方面的有益范例。

三、比较分析

令美国深为担心的是，中国早晚会挑战它的世界权力和对国际事务的掌控。而美国的矛盾在于，它希望继续领导世界秩序、主导世界事务，但又不愿意至少是部分地改变其秩序当中排他性的属性。

从中国的角度看，这种对世界权力争夺的担心属于过去的20世纪。中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和传统，并不认同强权政治的逻辑。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坚定支持者，积极推动其宗旨和原则的贯彻实施。

这也是为什么，当美国人谈到中国试图挑战其领导的秩序时，中国人会感到困惑。显然我们不是在一个层面进行对话。

虽然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中美两国对当今世界秩序建设上的观点并非迎头相撞，相反，还存在重要的共同点。例如，对世界和平与繁荣的追求，对改革和完善联合国体系的希望等等。中美在核不扩散问题上也持相近立场，也都表达了对大国之间危机管理和冲突预防的需求。在一些重要的政治议题上，两国都表示没有损害对方的“大战略”。例如，美国明确表示无意遏制和围堵中国。

我们都认识到，需要对国际秩序进行变革以适应新的现实。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努力超越差异、相向而行？还是渐行渐远？

四、21世纪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秩序”

20世纪上半叶接连发生了两场惨痛的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紧接着，在“二战”结束后不到两年，美苏两国关系从战时的盟友急转直下，滑入一场长达40年的冷战，使世界被集团政治所分割。

英国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尼古拉斯·博伊尔发现，在过去5个世纪当中，每个世纪的第二个10年所发生的一些大事会影响整个世纪发展的轨迹，如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19世纪的拿破仑战争、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们都是以冲突或者战争的方式实现权力的再平衡的结果。

现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世界能否摆脱这一历史规律并探索出大国之间相处的新模式？

基辛格博士《世界秩序》一书中最后一章的标题用的是问号，“我们走向何方？”。他谈到国际秩序的重塑问题，认为这是对当代政治家的终极考验。他提到现代世界需要一个“全球世界秩序”，各国领导人应超越日常琐事，来思考更为重大的未来世界秩序问题。

确实，在全球化的带动下，今天的世界更加扁平，国与国之间更加相互依存。但是在秩序的层面，不仅中国与美国存在看法上的差异，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出现不同的趋势。例如俄罗斯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体现出彼此的不相容，而“伊斯兰国”组织（ISIS）则宣称要恢复传统的伊斯兰秩序。

也许在适当的时候，需要考虑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宏大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秩序”构架，如同一个更大的伞，让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话语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多次谈到利益共同体，或者是命运共同体这样的理念。

当然，这方面的讨论将是一个漫长的建立共识的过程。重要的是21世纪人类不应再次落入大国权力争斗的窠臼，而应增强秩序的公平性和各国平等受益，着眼于维护发展和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不仅处置传统问题，也能够应对复杂的新疆域挑战。我们当前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和挑战都是新型的和跨越主权边界的，人类在应对上还缺乏经验，需要采用新的思维和联合的手段。

中美作为当前秩序变革中的核心国家，应该避免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采取相互排斥的做法，应该有风险意识，避免相互刺激和相互指责。同时，中美应该更加强有力地支持联合国和东盟等地区组织，加快构建共识。

秩序也好，体系也罢，说到底还是人与人的沟通和理解。各国之间需要开展更加广泛的沟通。中国作为新兴的大国，更需要学习如何

将自己的政策和战略意图及时和清晰地传递给世界，从而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总之，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确保21世纪成为一个真正和平和共同繁荣的世纪，不要再犯20世纪多次出现的导致严重冲突的错误。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全球秩序应该是思想众筹和共同演进的结果，需要所有国家的参与和努力。

---

1. 2015年7月29日，傅莹应邀出席新加坡第22届国际战略研究所富丽敦论坛，并发表演讲。演讲中英文全文刊发于外交部网站和中美交流基金会网站（china focus）。

在共同的屋顶下——中国的全球秩序观㊟

在美国，关注的焦点是如何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继续拥有领导地位。出于对传统大国更替的天然恐惧，美国对自己能否保持强大、新兴国家是否会与美国争夺世界主导权产生焦虑，有学者主张制定新的“大战略”来应对。

在中国，关于秩序的讨论更多是围绕如何改进国际秩序、完善全球治理。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外部环境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首先，世界站在历史性变革的新关口。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在传统和非传统领域，乃至实体和精神层面，变化都在发生。同时，中国人认识到，自己的国家正成为世界变化的主要动因之一，对国际事务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中国公众对学习并且扩展国际视野兴趣日益浓厚。当奥巴马总统说“如果我们不制定世界贸易的规则中国人就会去制定”时，有意思的是，这句话刺激了更多的中国人想了解：这些“规则”到底是什么、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又当如何应对？中国学者也在积极探讨未来秩序和相关的理论。

美国对中国这个新兴经济大国的意图充满疑虑，担心中国要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担心中国要另起炉灶，建立新的国际规则和秩序。中国则反复申明，中国是国际秩序中的一员，遵守其规则并从中受益，无意也无力推翻现行秩序。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好像总在各说各话。那么，中国说的“国际秩序”与美国声称领导的“世界秩序”是同一个秩序吗？恐怕也是也不是。

通常的理解是，美国自恃发挥领导作用的“世界秩序”是一个包括现行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以美式价值观和全球军事同盟架构为支柱的全球霸权秩序，西方世界是其主要构成和获益者。需要看到，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在“二战”后为维持和平和促进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冷战结束后推动了全球化进程。

但这个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西方世界的圈子，尤其在安全和政治上具有排他性的特点，在当今世界多元化和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其局限性日益显现。同时，其排他性质也削弱着美国自恃的世界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以中国为例，美国一方面视中国为新崛起的大国，希望中国接受其领导并在某些领域配合美国行动，但同时，美国又在政治上将中国视为异己，在军事上把中国看作潜在对手。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的成员中，也存在将中国视为威胁来源的倾向。

而中国谈到秩序问题时，采用的表述是“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而不是“世界秩序”。中国说的是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机构和体系，中国是其中的平等成员，有归属感，也是这个秩序的重要发起方和建设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9月访问美国时，在联合国大会上专门谈了中国的观点。他说：“中国将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确实，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安全方面，中国为世界做出的贡献多以联合国机制为核心，并且得到联合国的授权。

当然，中国与美国的秩序观都有其缘由，所谓的“世界秩序”和“国际秩序”存在很多重叠。作为联合国框架及相关机构的主要设计者和支持者，美国虽然无法完全控制这个体系，且有时还会绕过它自行其是，但依然认为联合国及其机构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不可或缺。而中国是在现行国际秩序中实施的开放政策，并且成功地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未来在世界上的很多发展机会仍将源自于此。因此，中国会继续支持和参与这个秩序结构。

同时必须认识到，不管是“世界秩序”，还是“国际秩序”，都不足以应对人类目前面临的复杂挑战。

举个最近的例子：在叙利亚一国之土地上，聚集了政权更迭、大国干预、极端势力兴起、人道危机等人们可以想象得出的几乎所有动荡元素，很难通过哪个秩序结构找到一个能解决如此复杂危机的方案。

刚满70岁的联合国为世界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的结构和制度缺陷从未得到解决，其官僚主义和低效能饱受诟病，在应对当今全球挑战时更显得力不从心。比如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后，联合国及相关机构既未在预防上有所建树，应对时也未能及时发挥有效作用。在气候变化问题《京都议定书》后续谈判中，联合国的推动也显得效果有限。

现行国际体系和治理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而中国人希望走在前列。当然这个改革不是摒弃或者取而代之，而是改进和完善，也许可以说是秩序的“重塑”。

2015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邀请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教授就全球治理进行了授课。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之后的讲话中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是大势所趋。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他特别提醒国人，“不仅要看到我国发展对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

中国已在有意识地主动参与和推动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秩序。中国积极推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治理结构改革，并

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与其他国家一道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2014年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使国际卫生机构力有不逮时，中国首先派出医疗队，提供经济支援，使危机得到控制。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宣布了中国政府的一系列重要决定，包括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用于支持联合国和平与发展事业；建立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并于今后5年向非盟提供总额1亿美元的无偿军援。

2016年中国将在杭州主办G20峰会。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如此重要的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论坛，是在全球治理上有所创新和建树的难得机会。

可以相信，未来中国在继续保持自身发展的同时，将会担负起更多的国际责任。

那么在未来，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秩序呢？与其辩论哪一种秩序观更优越，不如超越现有概念，提出“全球秩序”这样一个更加宏观的新概念，最大限度地容纳全球治理、大国协作、地区合作、南北对话等等，把我们这个多层面的时代所需要的所有支柱和环节都包括进来，包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和关切，提供一个大家都能舒适地居于其中的秩序屋顶。

在共同的屋顶下，这个“全球秩序”至少应该具备三方面的机制能力：一是保障世界和平，二是保障全球可持续发展，三是保障用合作方式解决争议问题。在这个框架之内，各国应培育合作的习惯和规范，大国协调和多边机制都应充分发挥作用。习近平主席多次谈到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因此，在全球秩序这个共同的屋顶下，世界应该是一个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

无论未来秩序是什么样的，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必然是核心参与方，而它同时也是现行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因而面临调整的巨大挑战。比如：美国是否有魄力改变固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走出狭隘的利益小集团思维，从自我的道德绑架和盟友的利益捆绑中解脱出来？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的大国，所面临的挑战同样很大。因为中国缺乏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或者说充当国际层面“玩家”的经验，需要扩展自己的国际视野，尤其是在公众层面。我们不仅需要维护好自身的国家利益，还应该拓宽眼界，考虑更加广泛的利益。中国人也需要逐渐从历史上“受害国”心态的束缚中走出来，成长为真正的世界公民。这需要一个过程。

未来“全球秩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之间能否开展真诚的对话与合作。中美有广泛的合作，同时也有矛盾和竞争，两国关系早已经超出双边层面，对全球的影响日益巨大。中美之间的合作会使世界受益，而任何冲突，如果不能妥善处置，都可能给世界带来风险。

比如，现在南海就存在着紧迫的危险。美国把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做法视为旨在控制整个地区的“战略扩张”行为，并且依据这个判断采取应对措施。中国把美国派军舰到中国的南沙岛礁附近巡航视为严重的挑衅。这导致地区安全局势更加紧张，双方的不同认识对已经因为多重争议而相当复杂的地区局势来说，如同火上浇油。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此事也促使双方相互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中美需要沟通和协作，需要增进理解和信任。两国军方的会面和讨论让我们有理由期待，双方能找到更好的办法来处理矛盾和分歧。一个新型秩序也许就需要在这样的碰撞和摩擦过程中产生。

虽然现在要预言未来世界的秩序图景，以及全球秩序是否会出现，还为时尚早，但是，通过各国的交流，通过坦诚的对话，我们有理由期望，国际社会能就什么样的秩序架构有利于保证21世纪真正成为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纪逐渐形成共识。30年多前，当中国刚刚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改革时，邓小平用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比喻。我们现在或许需要以类似的态度来探索塑造“全球秩序”之途。

中国需要逐步积累参与国际治理的经验，需要学习，并且是快速地学习。同时，中国也需要讲好自己的故事，让世界读懂中国，了解中国，这是真正意义上国际合作不可或缺的基础。

---

1. 2015年11月1日，傅莹应邀出席国创会“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并在午餐会上发表演讲。演讲全文经修改后于11月2日发表于观察者网。在太平洋两岸的中国和美国，围绕未来秩序的问题进行着不同的讨论。

失序与秩序再构建㊟

习近平主席2015年10月对英国的“超级国事访问”为中英合作谱写了新篇章，两国打造黄金时代的前景令人充满期待。

英国人一向善于制造惊奇，最近脱欧公投获得通过令世人始料不及，而第二天看英国新闻时，已经有人追悔莫及甚至想重新投票，再次让世人跌破眼镜。

现在还难以预料事态的前景，但我们都看到世界在发生变化。人们在问：欧洲一体化是否已经止步甚至走向瓦解？这是否会加快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我看到的各种评论和分析中最为深刻的是基辛格博士的呼吁，他希望不要忘记欧洲如何终结了纷争和开展一体化的初始目的，主张即便英国要脱欧，英伦和欧陆也要保持团结之心，不要让欧洲从小的分离走向大的分裂。

许多人问，此事对中国何益何损？其实中国对世界一向秉持整体性的观念，中国的最大关切在于全球的稳定发展。目前我们要表明的是，中国仍然要与英国更加紧密地合作，也要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

对于当今世界的秩序，一方面有人担心中国要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或者另起炉灶；另一方面又有人忧虑21世纪的世界将滑向失序。两种担心既是相互矛盾，又是相互关联的，我今天主要谈第一个问题。

请允许我借用雷蒙德·卡佛的一句经典句式：当我们谈论秩序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在英国和西方，人们认为当今世界秩序是由美国建立和主导的，是“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概括看这个秩序有三个支柱：一是美国或西方的价值观，二是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三是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组织。这个秩序有其形成的历史原因，也在现代世界发挥作用，美国作为主导者从中获利匪浅。

讨论中国对这个秩序持什么立场，首先需要搞清楚中国与之是什么关系。必须承认，所谓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从未完全接纳中国，尽管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但因与西方体制有差异，长期以来在政治上受到排斥。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也不关心中国的安全利益，甚至在亚太对中国施加安全压力。所以至少可以认为，这个秩序在包容性上存在缺陷。

同时，这个“世界秩序”确实面临多重挑战，但并非源自中国，而主要是源于它无法为今天世界的所有复杂难题提供解决方案，有时甚至制造的问题多过解决的问题。

例如，美欧在全球推广西方价值观的做法已被证明效果不彰，尤其是在一些国家，当旧的治理体制被破坏后，新嫁接的西方体制并不能有效运作，权力真空引发更多混乱，甚至动荡外溢，结果带来的不是有序，而是失序。想想看，反恐战争打响的时候，谁能想到有朝一日恐怖主义会发展到准国家形态？在阿拉伯世界燃起革命之火的时候，谁又想到后来欧洲会面临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潮？

在防御领域，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将其安全利益置于他国之上，在全球安全中引发新的矛盾，尤其在一些地区争端中导致更为复杂的局面，这如果控制不好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加快失序。

全球化的进程改写了世界，同样也改变着世界力量格局。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先看到资本、技术和市场从西方发达国家构成的中心向更加广阔的边缘地区扩散和转移，使较不发达国家有条件实现经济超

越性发展。而现在我们也开始看到，伴随这个转移和扩散，世界权力也出现分散化的趋势。新兴国家被期待更多地参与世界事务和分担责任。

权力的分散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现实，然而，世界是否必然要走向失序？难道国际社会不能及时应对、重新构建或者是补充秩序结构?

中国作为崛起性力量，已经认识到外界对中国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期待和关切，那么，中国是否要发起挑战，是否必然走向与美国争夺世界权力?

世界常听到中国领导人讲，中国是“国际秩序”的一部分。需要澄清的是，此处讲的“秩序”指的是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组成的“国际秩序”，也包括国际法原则。它或许与“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有重叠，但不完全重合。中国对这个由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有很强的归属感。中国当年参与其创立，现在是受益者、贡献者，也是改革者。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来讲，中国的意图“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

中国正在学习和适应伴随成长而来的不断高涨的国际期待，正更加主动地为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贡献力量。例如，中国启动了亚投行，英国也加入其中。中国还提出了能更好地连接亚欧大陆的“一带一路”倡议。再比如，在安全领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了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的整体安全理念。

目前的一大挑战是南海争议问题，中美双方陷入分歧的困境。

显然，美国更多是从地缘竞争的角度看待和处置与中国在南海的分歧，从学理的角度讲，美国这样表现有其战略文化根源。在座各位对地缘政治学并不陌生，是英国议员和学者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20世纪初最早提出“中心地理”学说（Heartland Theory），主张“谁控制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谁就掌握了世界”，这个思想影响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地缘政治思维，乃至其后的战争与争夺。

当美国上升到称霸世界的地位之后，将重点转向海洋，美国学者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提出“边缘地带”理论，主张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也就掌握了世界的命运。

我回顾这一段是试图理解，美国的霸权战略基于对海上要冲的控制，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海上行为天生敏感，为什么对中国在南海扩建岛礁如此紧张。

事实上，南海总面积达350多万平方公里，而南沙群岛所有岛礁面积加起来不到20平方公里，而且远离国际航道。美国媒体无限放大中国的岛礁建设，让中国看起来有地缘政治的野心，我在美国常听到秉承“现实主义”理念的人预测，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美中冲突不可避免。

然而对中国而言，尤其是中国民众，南海问题的核心是围绕处于南海四个群岛最南面的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和相关海域的争议。中国民众坚信，中国自古以来就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

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治权“二战”后被日本交还给中国，一直得到外界尊重，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海洋勘测等事项都是向中方申请的。冷战时期有东南亚国家开始侵占南沙岛礁，甚至声称发现了“新领土”。然而，“二战”以后地球上哪里还有新领土可以被“发现”？后来在南海发现的油气资源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周边国家改善关系，经过多年努力，与存在争议的国家达成共识，我们决定通过双边谈判和平解决问题，解决之前搁置问题并且寻求共同开发。这个分歧没有影响东亚地区成功地走

向多边合作。《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简称《宣言》）的签署为管控好争议提供了制度框架。

然而，令中国苦恼的是周边个别国家没有遵守《宣言》的精神，试图把对中国岛礁的占领永久化和合法化，包括扩建设施和划分附近海域。中国在忍耐多年、劝说无果后，采取了应对和强化在南海存在的举措，包括更加严格地警戒和扩建岛礁，改善岛上设施。

而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突出军事安全色彩，更多强调盟国利益，给南海地区领土争议增加了新的维度。尤其美国不断派军舰军机靠近中国岛礁，甚至进入几海里内，构成对中国军事和安全上的威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美国正在支持一些国家损害中国利益。

行动引发新的行动，误判导致相应反应。要走出因南海问题形成的安全困境，中美需要澄清彼此意图，避免误判。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目标首先是维护主权权益，观察中国不能忽略历史维度。这个国家是在首都被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之下跌跌撞撞进入20世纪的，在其后的一个多世纪屡遭外敌入侵，中国人民对遭受强权欺凌的屈辱经历记忆深刻。也正是基于此，政府和人民始终对涉及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抱有极强的敏感性，绝不会允许历史遭遇哪怕在局部重演，也是为此，我们需要足够的军事防御能力。

第二，南海有重要国际航道，中国是主要使用者之一，希望它保持畅通，航行自由。中国自己也需要提高在南海提供公共服务能力，三座大型灯塔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同时我们也有海洋监测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计划。

第三，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的共同利益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没有旨在谋求地区霸权的动机和设计。中国也正同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宣言》，加紧磋商“南海行为准则”，共同构建地区规则。

第四，美国在南海问题中不是争议方。从根本上讲，中美都需要南海和平和保持航行自由，应该、也需要逐步走向合作。

我不认为中美应该进入“零和”的地缘竞争的状态，一旦开启，双方将难免陷入漫长的权力争斗，焉知其尽头不是“修昔底德陷阱”？

刚刚过去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纪念日，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做了重要讲话，提醒全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在讲话中，他也谈到外交政策和对国际秩序的看法，重申了中国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外交理念，表示中国愿意与世界一道，为构建公平的国际秩序努力。

借此，让我们回到秩序的话题。在考虑未来秩序时，也许我们需要超越现有概念，提出“全球秩序”这样一个更加宏观的概念，最大限度地容纳全球治理、大国协调、多边合作、南北对话等等，把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各种支柱和环节都包容进来，包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和关切，提供一个大家都能舒适地居于其中的秩序屋顶。

---

1. 2016年7月6日，傅莹应邀在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Chatham House）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提问。演讲全文首发于《中国人大》杂志2016年第14期。

全球格局与中国角色

守住21世纪的和平㊟

当今世界的许多挑战都关系到这个星球的共同利益。如果大家能够超越旧时代，用新的眼光看待彼此、信任彼此，就不难集中精力携手应对21世纪日益复杂的情况和问题。

自从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围绕如何维护和平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人类进入21世纪能否学会珍惜和平？大国在格局变革的进程中能否守住和平？这是当今世界关心的大问题。

英国剑桥大学的尼古拉斯·博伊尔教授，从国际关系500年的历史中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似乎每个世纪的第二个10年总有改变百年走向的大事发生，例如战争、冲突或者和平安排。按照这个规律，今天国际学界热议大国关系的走向就不足为奇了，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

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这个大国虽然在人口和地域上当之无愧，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整体实力上，与世界发达国家仍然有巨大的差距，自身发展也面临外界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中国在相当长时间都将聚焦于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富裕的努力奋斗中，我们需要、也必须保障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并将不断为此付出努力。这一点，我们要让外界更清楚地知道。

谈到中美关系，两国都明确表达了保持世界持久和平的政治意愿，并且正在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做出认真努力。双方通过多渠道对话在利益与矛盾中寻求平衡，毋庸讳言，这将是一个长期、艰苦的建立信任过程。冷战期间美国将投入的重点放在欧洲，“9·11”之后转向中东，现在正重新调整，要把重点放在亚洲。从时间上看，正是在东

亚经济蓬勃发展、合作热火朝天的时候，美国向这个地区调整了军事部署、加强盟友军事协作，恰好中国周边也开始发生各种事件。人们关心的是，这种投入能否更加顺应亚洲地区发展合作的大势?

美国教授梅尔文·莱弗勒写的《人心之争》一书，以详实的史料描绘了美苏在冷战中寻求缓和的四次重大时机，分析了彼此错过的原因。掩卷沉思，有两点体会：一是美、苏这两个大国虽然公开把对方的灭亡作为自己的政策目标，但实际上最牵扯它们精力的，却是如何防止发生正面冲突。二是，它们的对话始终不在一个频道上，当苏联絮絮叨叨回忆“二战”教训、热衷军备竞赛时，美国则紧张地防范对方威胁，两国从未真正建立信任，缓和只是手段。今日的言行将构成明日的历史，正所谓，史乃势使然。

进入21世纪，世界正发生新的变化，大国争霸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一些长期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入了工业化快轨，一些传统的发达国家难以摆脱金融和经济困境，双方差距有所减小。在崇尚“有资本就有权力”的西方，不少学者认为世界权力正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由此引发了对未来的新兴大国是否构成威胁、如何承担国际责任，甚至“世界领导权”能否和平转移的议论。

现实中，世界权力并没有出现单向转移，更可能的趋势是，影响国际治理和世界事务的权力将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传统中心地带，向曾长期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扩散。国际事务不再完全由几个中心国家决定，全球问题也难以由个别国家解决。世界权力的多元化正不可避免地加快形成。但是，和平年代发生的国际格局演变和国际治理方式的转换，将是更加缓慢和渐进的过程，在过渡时期，旧的框架如果及时改革和调整，还会长期发挥作用。

如此看来，确有必要重温博伊尔教授关于“每个世纪第二个10年”的那个判断。21世纪将是一个和平与合作的新世纪，还是要回到大国争夺甚至冲突的旧时代？如何回答这个大问题，无论是美国等发达

国家，还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都负有与自己地位相关联的历史责任。

实际上，当今的许多挑战都关系到这个星球的共同利益，例如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核武器的扩散、食品的保障和安全、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等。应对这些挑战时，大小国家，包括中国、美国和俄罗斯、欧盟等，都在一条船上。如果大家能够超越旧时代，用新的眼光看待彼此、信任彼此，就不难集中精力携手应对21世纪日益复杂的情况和问题。否则，难题只会更困难和更加复杂。

---

1. 本文于2013年5月28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第5版《名家笔谈》栏目。

百年后的回顾——反思两次世界大战㊟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5周年。百年沧海桑田，世界今非昔比。然而，人们对百年内这两场战争却难以忘却，世界许多国家举行回顾和研讨活动，国际史学界也出版了多部重量级著作。讲史离不开论今，人们聚焦“一战”“二战”，折射的是当代的疑虑：21世纪是否会发生新的战争？当今世界的战争风险源自何方？

一、帝国主义列强对世界权力的争夺只能是自掘坟墓

20世纪留给人类最深刻的教训是战争，尤其是帝国主义为争夺国际权力而发动的战争；留给人类最值得珍视的价值是和平，是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英勇斗争赢得的和平。

回顾“一战”历史教训，不应忘记的是，这场战争本质上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势力范围和殖民地而发生的利益冲突。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实现统一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需要通过地理扩张进行转嫁。垄断集团需要获取新的原料产地、工业产品销售市场和资本投放地，以实现利润的持续增长。

德意志帝国年仅29岁的皇帝威廉二世在1888年登基后，就显露出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抱负，他推行的具有强烈殖民扩张色彩的“世界政策”，激起了德国社会鼓动战争的情绪。面对已被欧洲几大老牌帝国瓜

分殆尽的世界，德国加紧扩充军备，企图通过战争改变格局。垄断资本阶层更是对夺取海外权益急不可耐，正如当年德国外交大臣皮洛夫所言，“让别的国家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也要求阳光下的地盘”。

事实上，德国、日本、美国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早在19世纪末就已加入争夺海外殖民地的列强行列，德国在世纪之交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侵略战争中还扮演了统领者的角色。关于这场战争的后果，德国学者迪特尔·拉夫在《德意志史》中写到：“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后，中国负担了巨大的战争赔款，王朝再没能从这场大劫中恢复过来。”至“一战”爆发前夕，德国已攫取了29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在新帝国中获利最多。然而，当时大英帝国已拥有超过本土面积110倍、面积达335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法国也占据了106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相比之下，德国虽然经济、军事实力已超越英、法，但殖民所获却小巫见大巫，对“残汤剩羹”自然不满足。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贪婪的本性敲打着战争的鼓点。

1914年6月28日，在巴尔干小城萨拉热窝，奥匈帝国皇储被塞尔维亚青年刺杀，由此点燃了“一战”战火，5周内，整个欧洲陷入全面战争。触发战争的事件或许有偶然性，但矛盾的积累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场新老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有其必然性。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史学界更看重引发战争各种事件的因果关系，却忽略了帝国主义战争背后的经济扩张需求。

“一战”是第一次被称为“世界大战”的战争，至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双方阵亡军人达900万人，受伤人数可能有两倍多。此外，还有大量平民伤亡，甚至有大批人死于饥饿和病疫。在欧洲许多小镇都能看到纪念“一战”亡者的石碑，上面刻着的冰冷名字记录着无数家庭失去的儿子、丈夫或父亲。这是历史上人类第一次自己造成如此惨重的祸害。

战争的结局是战争发动者没有预见到的。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都走向崩溃，“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得以建立。英法等战胜国虽对战败国进行了严厉制裁，但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均未对战争罪责和极端思想进行彻底清算，战后对政治疆界的划分也埋下许多至今仍不时发酵的纷争种子。战败后的德国没有认输，也不甘心接受《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惩罚，不到1/4个世纪后，当西方遭逢经济大萧条之际，“一战”后脆弱的欧亚格局再次面临挑战。诚如法国元帅福煦在听到《凡尔赛和约》签字的消息后所说，“这不是和平，而是20年休战”。

1939年，纳粹德国发动了声称要谋求“生存空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亚洲也早就点燃了扩张和侵略的战火。在这样一场被描绘为“侵略者从灰烬中爬出来”的战争中，被侵略国家进行了英勇抵抗。“二战”的结束使帝国主义国家构建的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日本侵占亚洲国家和争夺世界权力的军国主义野心也被彻底粉碎。“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为世界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也是帝国主义发动的不义战争中的觉醒者和奋起反抗者，正是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国际格局动荡和殖民体系瓦解，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摆脱外侮、结束内乱的重要机会。1919年巴黎和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使位居战胜国行列的中国蒙受了战败国般的屈辱，激起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慨和对当政者投机、软弱的强烈不满。孜孜以求寻找救国之途的志士仁人对西方列强彻底丢掉了幻想。

“五四运动”形成的反帝爱国热潮，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思想的大门，中国的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航程。中国人民结成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全国军民浴

血奋战、坚韧不屈，最后战胜了凶残的侵略者。经过抗日战争锤炼的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于广大民众之中，坚决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最终赢得解放战争胜利，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战”后的百年见证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向民族独立、繁荣富强的艰苦努力和伟大成就。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望，而且从未如此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梦”，展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繁荣发展的光辉前景。

二、超越战争与革命的旧时代、建设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超越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旧时代。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扩张需求刺激下发动战争的冲动，曾是旧时代的重要特征。而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为人类和平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高科技的发展、国际道义理念的普及等因素，都在制约大国之间相互动用战争手段的意愿和条件，世界性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做出判断，提出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此后出现的经济全球化印证了他的敏锐眼光。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推进，贸易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不断递进，大部分生产要素都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战争和地理扩张不再是获取利润增长的主要和适宜方式。冷战后，世界因政治集团对抗而形成的分割被打破了。过去，世界主要

资金、技术乃至人才和经验都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中心地带，而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些要素开始向更广阔的地区扩散。

中国不仅预见到时代的变革，而且最先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通过改革开放，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纳国际资金、技术和利用全球市场的领先国家，开放的政策也让国际资本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取了巨大利益，深化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的成功为全球持续增长提供了新动力，也为世界稳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参与到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浪潮中，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显著增强。

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几十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也充满活力。2012年下半年，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度达到90%，目前也在50%以上。根据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数据，公元1000年至1820年的全球经济重心在东方，之后用了90多年时间转向西方，在整个20世纪，全球经济重心都处在美国主导的西方发达世界。但在21世纪头10年的短短时间内，世界经济重心又向东方快速回移。这说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跟上了时代潮流，行进在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成为建设和平发展的新世纪的重要力量。

然而，时代的转换不像翻书页一样简单，时代的逆流仍在一些地区涌动。数据显示，冷战后全球武装冲突和战争数量虽有下降，但导致较多人员伤亡的地区冲突和一定规模的战争仍时有发生。21世纪走向和平的路途仍充满曲折，和平时代的光明仍不时被强权的阴霾遮蔽。最突出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后，一直没能摆脱“赢者通吃”的霸权惯性思维。冷战后许多涉及国际介入的国内冲突，都与西方输出其政治模式有关。西方对全球化的希冀不仅在经济层面，更企图实现全球政治西方化。

20多年来，西方在全球范围不断强势推进自身的利益和理念，动辄使用武力，甚至编造发动战争的“借口”。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

相继陷入动荡，有的国家至今看不到实现稳定的前景。形形色色的“革命”从中亚扩展到中东，导致一些国家陷入长期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新一轮地缘争夺正在各种政治辞藻的包装下推进着。这一切无不彰显出后冷战政治冲击波的印记。冷战历时40多年，理论上讲，20多年前就终结了，但事实上，这个结束的过程至今未画上句号，冷战的阴影并没有完全消除。当前伊拉克面临分裂的严峻形势，最恰当地说明了在政治制度上强加于他国带来的严重后果。

显然，在这些方面，美国没能跟上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硬、软实力都受到很大损耗。不过，美国在综合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上，仍拥有相当优势，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谈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谈到21世纪能否不再发生大的战争，人们自然首先会关注美国的政策选择。目前美国国内对其国际政策有许多反思和讨论。未来美国如何调整其政策，能否学会通过与他国建立信任与合作来处理国际事务，如何与其他大国乃至国际社会互动，将对21世纪的世界局势走向产生关键影响。

三、中国是新时代繁荣的贡献者、和平的守护者

当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时候，将给世界带来什么？中国向世界要什么？能为世界做什么？中国是否愿意与各国一道去制约战争，守卫21世纪的和平？这些都是国际社会关心的重大问题，对中国也至关重要，需要中国以自身的行动去回答。

在纪念“一战”的历史书中，剑桥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战争》一书引人注目，视角独特。它没有重复人们熟知的事件和过程，而是细致地描绘了战前10年在维也

纳、柏林、圣彼得堡、巴黎、伦敦和贝尔格莱德等决策圈内的一系列偶然言论和行为，以及引发这些偶然事件的偶然因素。作者认为，在特定历史阶段，重要国家对一些问题梦游般地不经意处理，相互误解和无意中释放的信号叠加起来，就可能将局势引向原本谁都无意走向的战争。

这部书一出版，就得到各种解读。西方学界把焦点放在当今世界经济最活跃、同时也出现许多矛盾的亚洲，试图寻找“亚洲的梦游者”——新的争夺和冲突的引发点，中国不幸又成为“躺枪者”。有观点认为，中国与历史上争夺国际权力的新兴强国有共性，如经济高速增长，军费持续增加，外交政策强势等，中国周边出现的争议热点也被类比为历史上新老强国之间的利益摩擦。这种观点的核心疑虑是：中国是否会与美国争夺世界主导权？是否会因矛盾处置不善而引发与他国的冲突？其实，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些观点和疑虑完全是本末倒置。正如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的，“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

确实，国际学界总有人误读中国，究其原因，源于西方传统的“国强必霸”逻辑：一个国家强盛起来后，必然寻求重新分割世界权力、取代现存强国地位，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扩张。他们把21世纪引发冲突的焦点放在亚洲，尤其关注快速发展的中国。这个观点在美国很有市场。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美国陷入对自身是否会衰落、中国是否会与自己争夺世界权力的焦虑中，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表现出“惊回首”的错愕。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约9.8万亿美元，超出排名第二的日本5.1万亿美元，当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2010年，美国仍居第一，但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位。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9.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多，且仍保持上升势头。

亚洲的强劲增长对美国有巨大的吸引力，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显示出美国强化对亚洲掌控力的愿望。美国突出军事重返、强调军事同盟作用，与亚洲聚焦经济发展的主基调并不合拍。自美国“重返亚太”以来，太平洋也不那么太平了。2012年4月，菲律宾派军舰到中国黄岩岛袭扰我国渔民，同年9月，日本野田政府宣布把与中国有争议的钓鱼岛“国有化”；2014年5月又发生越南动用大量舰船干扰中企南海钻井平台作业。美国时隐时现的支持让这些挑衅者更加有恃无恐。而中国针对这些挑衅采取的维护自身权益的反制行动，却被渲染为“中国威胁”和“外交强势”。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领导人没有表现出妥善处理钓鱼岛争议的意愿，反而借此虚构中国对日本构成国家层面的威胁，恐吓国内民众、争取美国支持，目的是实现突破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这种错误态度和危险倾向倒让人回想起“一战”后德国不服战败结果，重新动员起军国主义的政治气氛。“二战”后的亚洲受到冷战的影响，对日本的战争罪责清算不彻底，导致日本国内至今仍存在严重的历史认识问题，令人对其未来走向存疑。

在历史问题上，中国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肃立场，坚决反对任何否定历史、制造矛盾的做法，不能允许个别人和个别国家不负责任的做法改变地区和平发展的大势。中国须与亚太各国人民建立并维护共同认识和立场，以最坚决的态度制止日本个别势力的错误倾向，绝不给侵略者再次从灰烬中爬出来的机会。日本国内维护和平的力量也不会无限度容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

无论域外力量如何解读或者利用那些发生在中国周边的个案，中国始终保持了战略定力，一方面对挑衅予以严肃有力回应，绝不手软，并有效把握住了矛盾的张力，另一方面坚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政方针毫不动摇。当今亚洲的主题仍然是各国人民要和平、谋发展、求合作，亚洲形势的基本特点仍然是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

多数国家与中国一样，都把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和解决民生等方面。亚洲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

中国既是亚洲稳定和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也是受益者。中国对亚洲保持和平和建设繁荣负有重要责任，不会让自己的方向受到干扰。中国不是戴着盔甲融入世界的，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也不是靠炮舰打开的，中国是第一个通过和平发展成功走上国际舞台的大国，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方向。正如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时指出的，“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

随着自身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也在不断增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投入。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些都更加贴近亚洲各国的根本需求和利益汇合点，是中国发挥自身优势设计的重要公共产品。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着眼于将两国关系引向和平合作的轨道。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构架，支持其保持包容性和协商性。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增强自身保卫和平的军事能力，在当今国际环境下，和平和安全的建立和维持仍需要实力来保障。

“温故而知新”，回顾历史的目的是更好地认识现实、面对未来。21世纪最大的事件是中国将成长为世界大国，成为影响世界局势的重要变量。中国第一次登上了世界事务的中心舞台，第一次不仅有了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能力，而且要为创新国际秩序和规范承担责任。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会更加地区化和国际化，需要逐步将自身经济实力转换成为积极有效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增强维护共同利益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中国也需要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大国和周边国家及时进

行国际沟通，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国情和政策的了解，避免自身形象和观点被塑造、被误读，创建好的合作气氛。

回顾5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人类还没有整个世纪不陷入战争的经历。为了让人类在21世纪切实走出旧时代战争与冲突的怪圈，中国应发挥自己的作用、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这对中国自身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必须、也必然是21世纪繁荣的建设者和和平的守卫者。正如习近平主席2014年7月在巴西议会演讲中重申的，中国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愿意同各国一起维护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

回顾“一战”“二战”给人类带来的深刻教训之际，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能够在全球确立更加鲜明的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共同立场，如何能够在国与国之间树立更加公正、公平和公道的交往原则，如何使国际法、国际准则和国际机制等公器切实为人类共同利益服务。这些都是新时代必须解决的大问题，也是中国为世界和平有所担当的着力之处。中国需要尽快学习和提高自身能力和国际意识，未来中国参加建设的新格局应是超越旧理念和多级的，应能尊重和包容各方利益，通过大国间和国际社会最广泛的理解与合作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应能更加有效约束大国间的矛盾和分歧，制约单方面动用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的做法，应能团结世界各国人民，确保21世纪成为人类共同享有、共同建设的和平合作新世纪。

---

1. 本文发表于《求是》杂志2014年第17期。

在世界变局中构建中国责任㊟

中国进入了物质消费的时代，致富和快乐几乎成为普通家庭的中心话题。有人用“小时代”来定义今天的中国，一个相对富裕和轻松的时代，衣食无忧。从网络话题中可以发现，年轻人忧的是：跌倒的老人扶不扶？过年是回到自己的父母家，还是去公公婆婆家？当然，我们不是没有宏大的课题，2015年11月底在北京举行了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议题是如何在5年内让7000万生活在每年2300元人民币贫困线下的人摆脱贫困，中央为此做出全面部署，包括扶助生产、医疗和教育资源的倾斜等等。

同时，我们从电视上可以看到，世界仍然有战场的满目疮痍，仍然有难民的流离失所，还有大规模恐怖袭击带来的伤害和恐惧。我们不能不深切体会到，和平与稳定是多么宝贵。中国之所以能够快步成长，之所以今天人民能喜之所喜、忧之所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国家一直保障了一个好的政治和安全环境。30多年前邓小平先生对世界大势做出重要判断，人类进入和平发展的年代，不能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

2015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又是“一战”百年后，新的一百年的起始之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目睹了两场热战和一场冷战，经历了战争、冲突和国家间无休止的争斗，教训是深刻的。站在新的历史端点，人们需要思考的是，世界能不能把持住和平与发展的大势？抑或是，任由动荡和冲突把人类拉回到黑暗中去？

在即将过去的2015年，各种矛盾都被释放出来，纷纷乱乱的事件昭示着世界的变化。也许，可以用“分化”二字描绘今天不平静的世界，在国际政治中，对抗因素又在生成或者是突出起来。

首先，恐怖主义对文明世界的挑战成为年末最引人注目的全球性安全问题，各国人民对非传统安全作为当今首要威胁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记得2001年“9·11”事件发生时，我们用“大象无形”描绘恐怖主义，14年后的今天，恐怖主义不仅更加强大，而且正在成为有形的威胁，而国际社会仍然无法在如何应对上形成有效的抵抗合力。就拿叙利亚危机来说，目前的严峻局面里面掺杂了太多的复杂因素，有大国竞争和干预的后果，也有宗教分歧和部族仇恨的影响，搅成一团乱麻，让人无处下脚。最近出席国际论坛时常听大家议论，国际社会反恐的方式到底对不对？我国舆论场也在议论，中国要不要和如何介入？事实上中方为推动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做了不少外交努力，日内瓦会议就是中国最早提议的。问题在于，国际社会能否看清世界政治变化的主线？能否在共同维护世界安全上形成共识？

第二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战略竞争又突出起来，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的利益分化大于聚合。例如，美欧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较量，再次构成国际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这在乌克兰危机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当时有人甚至提出“是否冷战归来”的问题。再比如，在亚太地区，美国介入地区纠纷和强化军事同盟，表现出引入新的地缘竞争的意图。美国在亚太的核心关切是“权力转移”，担心被中国“挤出去”，所以从地缘政治出发，开始介入中国与邻国的争端，由此引发领土主权之争转变为战略竞争的风险。美国在南海对中国岛礁采取靠近和飞越行动，这并不符合中美在南海保持和平稳定的共同利益，难道不是新的安全之患？

当今世界的“大国之争”，更像是冷战漫长终结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个新旧秩序交替的时期，总有人试图用旧思维和旧方式处理新问题，把旧的问题幽灵化，把新的问题古典化。如此纠结，如何能在面临更大的更真实的人类共同挑战之际，形成抵抗的合力？

第三是在经济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增长的分化与合作的分化。2015年美国经济复苏成效显著，数据显示，美国的季度增长率保持在2%~3%的水平，失业率回落，并继续引领创新，在西方世界一枝独秀。但国际上普遍注意到的是，美国这个最大的经济体向好，未能带动全球复苏，人们对美联储一旦加息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忧心忡忡，一直等着这只“靴子”何时落下来。有文章认为，美国的复苏是“吸入性”的，以欧洲和新兴市场衰退和资本抽逃为成本，事实上会削弱全球复苏的潜力。

与此同时，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名存实亡，美国为了维护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主导权，积极促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在没有吸纳所有主要经济体参与的情况下，另行确立新的规则体系。这不能不令人怀疑美国是在重新“筑墙”，而不是“拆墙”。那么，未来全球经济秩序是否会朝着集团化、排他性的方向发展呢?

第四是在人文层面，全球化为国际社会带来了交往的自由和便利，但现在这种开放受到质疑，文明分化与文明交融两种趋势都有。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数据，目前每年全球出国旅游的人达到11.38亿人次，中国2014年出国旅行者就超过1亿人次。这么多人在世界上走动，如何保障他们的安全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大难题。发达国家长期高举人权价值观的旗帜，这也一直是他们在难民和移民问题上的核心标准。而面对恐怖主义、极端势力的威胁，这些观念面临颠覆，欧洲人也在反思，能否继续兑现其标榜的价值。但如果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交流之门纷纷关上，如果“逆全球化”成为主流，世界是否会再度被分割？那样的世界能更安全吗?

以上四个方面的变化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动态，或者说是分化，如果时间充裕，这个单子还可以罗列下去。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入一个全速发展的历史阶段，资本、技术、人员、劳务从过去以西方国家为核心的中心发达地区，向全世界更加广泛的地区扩散。中国借助全球化的浪潮，实现了改革开放的目标，实现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全球化对传统结构带来冲击，有人称之为现代碎片化现象，包括热点分布的碎片化、信息传播的碎片化、人类认知的碎片化等等。“碎片化危机”成为国际关注的重大课题之一。

这背后的深层问题恐怕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战后世界秩序出现问题。必须承认，这个秩序曾经推动了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但是，面对新兴国家的崛起和各种新老问题的纠结，它未能及时调整，既不能提供完整、平衡的利益覆盖和权重分配，也缺乏有效的治理和解决办法。就像一个长大了的人，还穿着小号衣服，处处难受。

美国，作为现行世界秩序最具实力的主导性国家，接连出现重大战略失误。2002年美国出兵伊拉克，导致一个国家结构的垮塌，至今处于无序状况。2010年突尼斯政局变动后，西方开始鼓励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打开潘多拉魔盒，至今余火未尽。中东旧的秩序不断被打破，新的却不能建立起来。2007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更是导致西方世界全面陷入困境。美国有人称之为“战略灾难”。

现在，美国试图从错误中抽身，提出“重返亚太”，但又把防范的矛头指向中国，加剧了中美互不信任。这是否又是一次战略失误？是否会让两个大国错过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机会？这是一个应该风险共担的时代，重大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责任缺失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挑战。

当然，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国际社会已经开启了诸多探索。20国集团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行已经做出提高发展中国家投票份额的决定，IMF把人民币纳入了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体现出中国对当今世界新的担当。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投行将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弥补现行国际机制的不足。由东盟发起、包括中国在内16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也在加紧推进。

中国是当今世界的重要变量之一，我们已经超越了依靠外界带来的机遇闷头发展自己的时期，现在需要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更主动地构建自身发展所需的良好国际环境，尤其是需要开始思考，如何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前不久基辛格博士来北京，我应他的要求安排了一场与中国年轻人的对话。说到世界秩序变革问题时，大家纷纷对美国提出批评。基辛格耐心听完后，反问："年轻人，如果现在把领导这个世界的权力交给你，你对世界秩序的构想是怎样的？"大家没有答案，显然都没有想好。

我们需要有更多具体的思考，不仅有宏观的也包括微观的。当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提前落到中国人的肩头，当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未来最大机遇在中国并为此而调整自己时，中国能为解决全球难点提供什么方案？能为促进全球均衡增长提供什么样的改革理念？如何能让更多国家和人民感受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利好，从而真心实意地与我们携手前行？

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中国面临如何让外界更好地了解自己的难题，目前的沟通显然是不够的。世界现在很想听中国故事，窗口已经打开，我们需要提高这方面的意识和能力。归根结底要靠我们自己向世界讲清楚国家的抱负和人民的梦想。

---

1. 2015年12月12日，傅莹应邀出席"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演讲全文首发于财经网和澎湃网。2016年1月7日，《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该讲话节选，题为《中美不应错过机会》。

国际秩序与中国作为㊟

国际上常有人问：中国是否要挑战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领导地位？是否要另起炉灶创建一个并行的世界秩序？我们的回答是：当然不，中国是国际秩序的成员。但双方说的是同一个秩序吗？似乎此“秩序”非彼“秩序”。

所谓“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有三个支柱：一是美式价值观，也被视作“西方价值观”；二是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构成美国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安全基石；三是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这个“世界秩序”有其国际政治的历史渊源，也在现代世界发挥作用，而美国长期在这个秩序中居于领导地位，并因此获得利益。但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政治日益碎片化的今天，这一“世界秩序”面临越来越多的现实挑战，越来越难以提供全面、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政治层面，美国推广西方价值观的做法在很多地方遭遇水土不服，特别是在中东一些国家，旧的格局被打破，新的社会架构却迟迟建立不起来，导致严重的动荡，甚至外溢。在防务领域，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把盟友的安全利益凌驾于非盟友的安全利益之上，往往给地区热点问题增添新的复杂因素。在经济层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经济治理的缺陷，应运而生的二十国集团带动了全球治理改革进程。

在此背景下，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和世界影响力的上升，人们自然想知道中国持何立场。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我们支持现存国际秩序，不过中国人使用的词汇是“国际秩序”，而不是“世界秩序”，指的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机构。中国对现存

国际秩序有归属感，既是其创建者之一，也是获益者和贡献者，同时还是改革的参与者。

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讲时就指出："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

中国针对国际秩序有缺失的地方已经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我们提供给世界的重要新型公共产品。它们不是排他的而是包容的，不是谋求赢者通吃而是要实现合作共赢，它们的运作过程遵循国际公认的准则，充分吸取现行国际机制的经验和教训，当然也会更均衡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关切。

中国和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比如双方都支持联合国的作用，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需要与对方合作。2015年中美双边协议的率先达成为气候变化巴黎大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但中国不可能全盘接受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中国反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排斥和压制，我们主张共同安全，不赞成用排他性的集体防务安排再次割裂世界。

未来世界的权力将更为分散，面对的挑战也更加复杂，世界需要改变。是否可以考虑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秩序框架，就好比搭建一个共同的屋顶，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各方的利益诉求和治理观念。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坚定不移的。面对世界经济和全球安全的种种不确定性，我们不希望自己的注意力被过度分散，更不希望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发生逆转。当然，如果出现我们不能容忍的挑衅和威胁，中国现在有更多的手段和渠道去应对。

中国人讲“定力”，就是要有耐心，看准时机和条件再做判断。最重要的是办好自己的事，也就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增进人民福祉。随着自身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将能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同时，中国也要继续学习，并且更好地与世界沟通。

---

1. 2016年2月13日，傅莹应邀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并在“中国与国际秩序”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演讲节选于2016年2月1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第5版的《名家笔谈》栏目。

大国需要培育信任[注]

“世界秩序的何去何从”，这也是目前国际关系中讨论热烈但分歧比较大的问题，关键不仅在于对秩序的改革和调整缺乏共识，更重要的是大国之间缺乏信任。

纵观历史，信任一向是大国关系中的稀缺产品。当今世界虽然人类有了很多进步，但缺乏信任仍是大国合作的主要障碍。例如俄美之间，在冷战结束25年之际，很难说相互比过去更加信任多少。

中美关系也常受到信任问题困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与美国建立起广泛的经济合作关系。但最近在南海问题上发生的摩擦让彼此的战略矛盾凸显，让许多中国人意识到，尽管我们与美国已是不可分割的经贸伙伴，但在安全问题上两国还远不是伙伴。

中国人需要重新审视，美国宣称要继续领导百年的世界秩序，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美方要维系的是它独享领导权的“世界秩序”，在政治上秉持美式价值观，排斥其他意识形态；在安全上维护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不顾及同盟之外国家的安全需求。

在经济上界限不那么分明，这个秩序一方面推崇美元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也激励了经济全球化，促使世界经济体系全面敞开。现在在全球治理方面，联合国及相关机构和G20等体系发挥更多作用。

中国没有拟定一套战略来挑战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但这个秩序至少在政治和军事上不容纳中国，让中国很难认同和支持。

那么，美国能做出调整吗？我与很多美国学者交流，答案都是否定的。我记得问过米尔斯海默教授，他给予了否定的答案，并且说中国“要么屈服，要么挑战”。而他认为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谋求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必须准备应对。

中华民族当然不会屈从于任何国家，不仅是中国，其他新兴国家，例如俄罗斯、印度，也不会屈从。那么，这是非黑即白的选题吗？是否大国力量变化了就必然发生权力争斗，进而跌入“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人认同的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多个场合申明，中国“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希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可以注意到，中方使用的词是“国际秩序”，我们参与了它的创建和运作，是支持者和受益者。这个秩序与美国主张的“世界秩序”有重叠，但相互并不完全容纳。

今天的世界早已摆脱了大国集团政治的旋涡，世界的主题转向了发展与合作。全球化的大潮带动世界市场、资金、技术乃至资源在全世界更加自由地流动，中国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92年到2014年，世界经济规模从24.7万亿美元扩大到78万亿美元，全球贸易总额从5.1万亿美元扩大到23.8万亿美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6.97%

上升到61.4%。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极大地得益于世界大规模的经济增长。

中国有效地实现着自己的目标，对现行国际秩序框架应该是感到舒适的，但我们认为秩序的改革也是必要的。

需要认识到，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场景，无论目前存在的秩序是怎样的，显然都不足以为所有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有时甚至导致更多困难。

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多元而又复杂。例如，大国干预的做法激起更多矛盾，甚至向其他地区外溢，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被干预的国家陷入动荡，恐怖主义乘虚而入，人民流离失所，教训是深刻的。

全球化也暴露出缺乏治理的弊端，发展和财富的分配不均衡，资本的流动缺乏管理，区域一体化出现退潮。这意味着，初始阶段的全球化需要升级，现行国际秩序需要改进，以适应时代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但变革应该是渐进的。

习近平主席在多种场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新型全球伙伴关系”。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培育新的增长空间，用发展促进合作、繁荣和安全，这个倡议正在积蓄活力。俄罗斯倡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也是同方向的。目前美国似乎有些疑虑，将来若参与其中也能找到合作机会。

如果存在一个共同秩序，那么它应该是更具包容性的秩序理念和构架，最大限度容纳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各种支柱和环节，提供一个大家都能舒适于其中的“屋顶”。当然，这需要大国建立信任，也许听起来有些理想主义，但是毕竟许多国家都已经在开展合作以应对挑战，这个过程就能培养合作习惯，从而逐步培育起信任。

很多人问，中国逐渐登上世界舞台，想在世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中国对国际交往看重以下几个元素。

一是相互尊重，特别是在政治层面。这是国家间互信的基础，任何国家都不应把自己的价值强加于他人，各国根据国情探索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得到尊重。

二是共同安全。各国维护自身安全不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21世纪的世界不应再度陷入地缘战略竞争或者新的集团政治。

三是合作共赢。G20杭州峰会突出了包容性发展的议题，强调要“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普惠共享”。

世界期待中国承担更多责任，也希望更好地了解中国意图，我们需要更多地向世界说明自己，赢取信任，也需要不断向他国学习，以开放的心态去认识、接受和创建新的理念。

---

1. 2016年10月25日，傅莹应邀出席俄罗斯瓦尔代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于2004年成立，自成立以来，俄罗斯总统普京每年都通过瓦尔代论坛会晤一批世界著名学者、政治家和记者，与他们就俄罗斯的内政、外交等领域的时局问题交换意见。傅莹演讲全文由盘古智库首发，演讲节选刊登于《环球时报》2016年10月26日第4031期。

在充满不确定性形势下看经济全球化注

一、“黑天鹅”事件引发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

不知道历史将如何记载2016年。这一年发生了太多出人意料的事，有人称之为“黑天鹅”事件之年。2016年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获得通过震惊世界，被视为“黑天鹅”事件。脱欧显然不是英国政府的政策选择，而是民众的利益选择，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英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逐渐积累，认为自己的关切得不到关注，脱欧是一种情绪的表达。

2016年11月8日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出乎美国媒体的意料，被视为更大的“黑天鹅”事件，美国学者称之为政治大地震，是底层民众的一场革命，因为他们的疾苦得不到关注和解决。虽然媒体和精英都渲染特朗普多么不靠谱，但民众宁肯一试，因为他们已无所失。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最国际化和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美下届政府的选择和表现将具有世界性影响，这正是整个世界都在等待和观察的原因。在华盛顿，美国素来盛产思想和丰富政策建议的智库和学者们也都在“猜”，各种分析和预判都以“不确定”为基础，没人清楚未来这个政府会做什么。

二、中国的挑战和机会

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所谓的“中或最赢”不会从天而降，未来场景不容乐观，将是智慧和胆识的博弈。一位比较了解情况的美方人士说，未来的美国对华政策或将趋冷。特朗普在竞选中强调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让美国吃了大亏，他认为自己的观点契合选民情绪，亦即民意，因此上台后必须做些什么。

这可能意味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相当严峻。目前美方在贸易和汇率等方面对中国的种种不满正影响对华看法，如果导致新的政策，将对两国关系构成挑战。两国的有识之士都认为贸易战将两败俱伤，不大可能发生，但对可能出现的摩擦也不能太乐观。比如，美方是否会对双边贸易不平衡采取更激进的惩治措施？是否将在知识产权问题上采取更严厉的立场？在网络安全防范上是否更加严格？在南海是否加强军事活动？在朝核问题上是否对中国提出更多要求？

美国在对华关系上的负面言论对正在改革攻坚的中国不是什么好消息，但我们也没必要闻风起舞。美历届新总统上任都对中国有些严厉判断，经过实践中的磨合总会找到合作路径。中美关系已经长成参天大树，难以撼动，两国经济相互深度依存，美国人也承认，任何针对中国的制裁性举措都难避免导致“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结果。

奥巴马政府的8年，虽然两国都感到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毕竟取得了显著成果。过去4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会晤9次，双方达成很多共识，做成很多事情，包括在全球层面的一些领域实现合作，例如应对气候变化。201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5580多亿美元，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截至2015年底，中国企业在美累计直接投资466亿美元，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美国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四大目的地。

学者们建议中国经贸工商界准备好“工具箱”，对伤害中国利益的行为有所应对，既可运用国际国内法律和程序手段，也可采用经济手段。同时，也应拿出从积极角度解决问题的方案。例如美国最需要的是吸引投资创造就业，这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需求是顺势的。再如

美国迫切需要基础设施建设，在这方面没有国家比中国更具优势。但是，在美国关于中国的客观信息太少，尤其关于中国企业如何发展和如何开展国际合作，美国人了解得很有限，我们的工商和各界都需要更主动地传播自己的观点，不能任由谬误传播，干扰甚至破坏合作。

从广角度看，中美合作前景良好，但在局部和眼前可能挑战更多。根据高盛的分析，美国经济有望进一步复苏，尤其减税和加息等政策刺激、增加基建开支等有可能带动制造业和就业恢复。但美国和西方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克服起来不那么容易。美方总拿与中国经贸关系不公平说事，但美国人在中国投资建厂拿走利润的大头，这些钱哪去了，为什么没能解决工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劳动力升级问题？责怪中国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但显然，美国现在还无法面对更深层的属于资本主义制度财富分配不均的固有矛盾，只能在现有基础上修修补补。

能不能说，今后的美国内外政策将向“以经济为中心”回摆？甚至更具体而言，是以创造就业为中心，从过度扩张和战略透支向内顾调整；不是要与世界切断关系，而是更好地利用世界财富和市场为美国利益服务，解决贫困和就业问题。因此，美国变化的方向已经比较清楚，经济层面的博弈将是未来的焦点。不过2017年会发生什么、将产生什么影响，还要继续观察。

三、美国与全球化

在这样的变化的冲击下，国际层面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反对和放弃全球化的趋势给世界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是全球化的最主要倡导者，冷战之后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再到奥巴马都是全球化的主要推手，西方倡导的全球化包括：一是政治上推行“普世价值”和西方民主政

治，二是经济上推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系，试图实现全球在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按照西方模式标准化。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参加一个为发展中国家组织的以“美国安全政策”为主题的美国访谈旅行，日程包括走访美国国会、智库、院校和军工企业等。当时我的问题是“美国的世界战略目标是什么？”，过去是与苏联争霸，苏联垮台后美国追求什么？所到之处得到的回答都说是民主、人权和普世价值。这些属于软目标，而军队是硬力量，我想了解的是，美国强大的全球军事部署是服务于实现这样的软目标吗？印象是，许多美国人对此坚信不疑，虽然当时还说不大清楚如何做。

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确实一直在为这样的目标打仗，哪怕反恐战争期间也要改造别国政权。他们是否误读误判了世界大势呢，显然没有跟上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的中国GDP只有美国的1/9，十年后美国撤出伊拉克时，中国GDP已接近美国的一半。现在他们清醒了，奥巴马抱怨中国“搭了便车”，特朗普则明确讲不应浪费那么多钱到处打仗。

美国在全球构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系的过程中，资本的逐利行为导致制造业快速外流，冷战后一代人的时间里几乎掏空了美国的工业基础，基础设施年久失修，社会契约关系凋零。财富更快地集中到顶层的资本所有者手里，他们是全球化的鼓吹者，也是最大的获益者。富者更富，穷者就更穷了，受到剥夺和伤害的是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大多数美国普通人。欧洲类似，在部分欧洲国家青年人失业率持续处于高位。

现在的情况是西方的上层操弄了全球化，而社会底层的“革命者”却把打击目标对准了全球化和中国这样一些成功者。

四、中国与全球化

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农业经济体转变为工业化国家，实现6亿多人脱贫。这是因为中国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坚定目标，中国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经济全球化，断然拒绝政治西方化，巩固了三个自信，团结了广大人民。

美国很多人在问：中国是否想要填补美国退出全球化的领导空间？这个问题很难用“是”或“不是”回答，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话语陷阱。

30多年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国与国之间形成深厚的相互依存关系，历史不可能重新走过，全球化倒退和逆转都不大可能发生，美国可以不支持，但全球化不会止步不前。况且也没有替代方案，如果放弃全球化，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碎片化，是以邻为壑、保护主义盛行导致相互伤害。全球化不是错在方向上，而是存在缺乏管理的问题，这个弊端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导致了不平衡。理性的态度是予以改进和完善，如果把经济全球化的初始阶段视作1.0版，现在也许应考虑打造全球化的2.0版了。世界已在见证这样的“升级”。

首先，在新一轮技术革命驱动下，网络平台的发展和手机通讯、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更新催生新的生产和销售方式。例如2016年“双十一”网络购物节销售额达180亿美元，覆盖235个国家和地区。

其次，产业分工向发展中世界进一步扩展。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印度、越南等新兴国家甚至非洲开始承接更多制造业分工，它们构成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后劲。

同时，中国对全球化的弊端也有认识和体会，进入转型升级的艰难旅程。我们确实有条件也有必要在全球化未来发展上发挥更大作

用。中国的态度是鲜明的：不能开全球化的倒车。习近平主席在秘鲁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上积极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信号。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全面起步，这个进程将赋予中国参与、影响全球化进程更多资源和经验。

中国曾是世界上最闭塞和落后的国家之一，几次与世界发展的潮流失之交臂，能有今天的赶超，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邓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人经历了很多曲折，也在逆境中炼就了对信仰和目标的坚持。现在的世界更加复杂，我们需要冷静观察、站稳立场，积极主动应对挑战，积极主动抓住机遇，做世界中更加成功的中国。

---

1. 2016年12月11日，傅莹应邀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发表演讲，演讲全文经修改后首发于《环球时报》2016年12月19日第14版。

全球的变革与中国的角色㊟

2017年2月，我去德国出席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以下简称慕安会）时，再次感受到人们对世界变化的洞察与忧思，焦点是围绕国际秩序、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问题发生的变化，也关注世界变局中的中国之道。

一、世界赞叹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

2017年慕安会的主题是“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感叹，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在他职业生涯中前所未有，不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由表及里侵蚀着社会，加速西方的衰落。与会欧美人士明确感知到旧的国际秩序难以维系，需要确立新的秩序，却很难清晰判断世界将向何处去，会场内外可以感受到某种张皇和探求的情绪。

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中国，希望知道中国的观点。我在慕安会期间的交流和与青年领袖代表的座谈中，听到人们热议习近平主席2017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和日内瓦万国宫“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的演讲，认为是在一片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中给世界带来信心，宛若逆流中的砥柱，显示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者。他们建议中国细化主张，把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号召力转化成行动力，推动全球化走出逆境、走向完善。

我介绍了中国对全球治理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务实主张。2013年，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三年多来，这个倡议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中国同56个国家和区域合作组织发表了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文件，同11个沿线国签署自贸区协定，与56个沿线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截至2016年6月，中国企业在2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承建大型交通基础设施项目38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累计达511亿美元，在18个沿线国建设了52个经贸合作区，累计完成投资156亿美元。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自2016年1月启动以来已经有57个国家签署，累计发放17.3亿美元贷款，支持了7个国家的9个基建项目。2017年5月将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与各国共商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各国优势互补，带动区域新增长。

不少人对“中国决心”“中国速度”表示钦佩，更感叹中国推动全球化之实是他们未曾料到的，也很难从国际媒体报道中得到全面反映。他们建议中国更多向世界传递信息，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理念、目标、诚意和能力。

二、西方推动全球化方式出现偏差

国际秩序和中国新领导角色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但对什么是“秩序”、什么是“领导”，概念并不像字面那样清晰。

中国一向认为自己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创建者、受益者和贡献者，也是改革者。“国际秩序”指的是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等相关国际机制构成的国际框架。这个秩序最初是“二战”后由战胜国主导设计，基于民族国家理念和多边主义的“世界政府”理想而创建的，对保障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冷战后美苏两大集团隔绝的消融和多边主义的提升，使得这个国际框架有了更大的

发挥空间，它提供的基本规则体系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制度保障。随着资本、市场、技术、人才和产业从发达国家向更加广泛的区域扩散，在交通便捷和技术进步的带动下，经济全球化得以形成洪流。

美国作为冷战后独存的霸权，以胜利者自居，被建立“世界秩序”的幻想冲昏了头脑，有学者提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美国的“世界秩序”概念是一种美国领导下的单极霸权体系，而且不愿受到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的约束，尤其在安全等问题上经常绕开联合国及其倡导的国际关系准则，自行其是。这个“世界秩序”的内核是由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和共同价值，在观念上是排他性的，视美国及其盟友信奉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为优于且必然要取代其他的“山巅之城”，把小圈子的安全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之上。中国并不认同，也不见容于此。

冷战后国际形势发展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是经济全球化，美国和西方集团最初是其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新一个阶段的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科技和文明的进步，新兴国家的增长扩大了世界经济和市场的规模，各国都从中受益。然而，近年国际形势中的动荡因素上升。一方面，大国地缘战略矛盾回潮，中东等地区冲突后遗症严重，全球各种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挑战令现存国际秩序应对阙如。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世界经济进入结构性低迷，国与国之间增长不平衡和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地位下降，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兴起，西方国家许多民众质疑全球化的路是不是走错了，美国在全球化面前进退失据。

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就经济全球化而言，它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未有预设的治理，没能解决好对资本的管控和对蛋糕的合理分配问题。在热议的全球储蓄与消费失衡问题背后，是更深层次的失衡——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失衡。

政治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积极推进的全球化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全球西方化”，在自由主义旗号下大力输出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结果不仅导致一些国家陷入长期动荡，由此产生的难民潮也终为西方所负累，使改造者和被改造者都付出沉重代价。安全上则固守集体防务“小圈子”，不惜通过侵害别国安全来维护自己的绝对安全，而围绕同盟与非同盟利益冲突产生的对立和对抗，也给同盟体系带来很大损耗。

国际秩序和经济全球化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表明，全球治理体制已经站在一个历史拐点上，改革是大势所趋。推进变革须找准症结，在这方面，与其说现行国际秩序发生了失序，不如说这个秩序当中最强国的目标出现了错位；与其说经济全球化有了问题，不如说西方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方式出现了偏差。不能说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关系准则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未能得到认真履行。也不能说经济全球化是失败的，而只能说西方从主观角度出发为经济全球化设定政治目标是失败的。而新的全球性问题不断出现，需要新的思维和方式去应对和治理。

三、改革国际秩序不意味着另起炉灶

习近平主席以一个负责任大国最高领导人的姿态和远见，多次阐发中国对国际秩序之变和全球化挑战的看法，主张改进国际秩序、完善全球治理。

中国提出用发展的方式解决层出不穷的国际矛盾。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联合国发展峰会和2017年1月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讲话中指出，人类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也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要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必须攥紧发展这把钥匙”。

对于经济全球化，中国发出了这个时代急需的冷静、客观、建设性声音。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而其实质是包容和开放，不能一棍子打死，既要正视其存在的问题，也不能开倒车，要适应和引导好它，让它更有活力、更加包容和可持续，让各国人民共享好处。

习近平主席把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上升到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主张国际社会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做出努力，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其中，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沟通协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政治谈判是解决冲突的根本之道。

他还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比如四个“发展”：公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全面的发展，创新的发展；五个“坚持”：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共赢，坚持交流互鉴，坚持绿色低碳等等。

这些阐述都在促进国际关系理念的发展和理论的创新，意味着中国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并非另起炉灶，而是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四、中国需对“全球西方化”保持警惕

原则、方向、路径都已明确，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落实好。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必然是个复杂、曲折且漫长的过程，中国首先要走好自己的路，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以自身改革和开放的成功影响外部世界变革的方向。要秉承多边主义，积极有为地参与国

际机构运作，顺应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在自己有优势和条件且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领域，主动设计、提供新型公共产品，促进南北交流互鉴和合作。当前是立足于周边，脚踏实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引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亚太自贸区的谈判或可行性研究，着力打造周边、亚洲命运共同体，以亚太区域合作潮流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以亚太伙伴关系网络建设带动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建设。善加利用自身国际影响力的上升，积极开展大国协调，推动大国关系架构朝均衡稳定的方向调整，而不是再次滑入零和对抗的泥潭。秉持对话沟通、开放包容的精神，向世界解释好自己的主张，主动影响国际舆论，消减猜疑。

同时，中国需要继续以全面、开放的心态向世界学习。认识和顺应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在发展中大胆体验和学习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初，基于对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中国打开国门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借助经济全球化浪潮实现跨越式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没有困难和争论，也不是没有迟疑和退缩，但中国最终承受住了经济全球化倒逼改革的巨大压力，经过一轮又一轮不可谓不痛苦的调整，坚守住改革开放的航向，成功驾驭了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不仅自己取得成就，也为人类进步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对全球化有取有舍，尤其对西方强行输出价值观、主张所谓“全球西方化”保持警惕，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保证了内政稳定和政策延续。这些历史经验，要在引导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中坚守。

五、中国清醒看待“全球领导者”光环

现在一个颇有市场的观点是，美国要从“领导席”上“退出”了，中国将填补“权力真空”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我与各国政学界人士探

讨国际秩序时，他们也常使用“领导作用”这个词描绘中国，认为中国取代美国在越来越多的国际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是迟早的事。

“世界领导者”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对美国国际权力的定义，现代意义上的“美国领导”源自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霸权稳定论”，即国际体系需要一支主导性力量，能够管理、规范国际体系其他成员的互动行为。美国在“二战”中赢得世界强国的地位，冷战中扮演了西方领导者的角色，冷战后一直努力成为“世界领导者”。1997年白宫公布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扉页上写着“为了更加安全、更加繁荣的明天，今天必须领导世界”，这是美国对自己世界角色的权威总结。奉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奥巴马政府极度强调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将其作为贯穿始终的执政理念。即便是试图颠覆奥巴马外交政策的特朗普总统也不否认美国的“世界领导者”作用，而是主张先以“美国优先”，恢复实力，再重担“领导世界”的责任。

必须看到，美国中意的所谓“世界领导者”地位以“上帝视角”俯瞰世界，背后隐含着的是霸权国争取安全最大化的现实主义信条。美国赖以维系“世界领导者”地位的支柱是：干预全球局势的超强军力和盟友体系；支撑世界经济运转的雄厚实力和广阔市场乃至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西方标榜的“普世价值体系”。如前所述，美国在斗垮苏联这个主要敌手之后，心态膨胀，试图领导西方改造世界，走错了路，给世界带来混乱，自己也付出沉重代价。如果说奥巴马执政期间已有反思，强调伙伴协商、慎用武力以恢复“软权力”，那么特朗普当政后这种反思更加深入，上升到美国要不要替别国承担那么多责任、要不要四处为敌的高度。世界应该欢迎美国对其国际目标的反思和调整，但美国全球战略的惯性实在太强了，地缘竞争、领导世界的诱惑也实在太大了，很难说就一定会改弦易张。美国不是第一次陷入困境，未来如何调整尚待观察。

既然是追求国际权力的最大化，就会不由自主地压制现实和潜在的竞争对手。显然，这种范式不符合中国的外交哲学和外交实践，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国际目标。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主张国际社会成员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相待。中国不是美国，不可能追求美式霸权。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仍是发展中国家，自身面临的瓶颈问题还有很多，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需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而且，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国家的长久大计。说一千道一万，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只有把自己的发展道路探索成功，才能对世界各国的改革发展产生持续的、强有力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界定中国的世界作用呢？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主席还多次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实际上也是在提醒我们面对“全球领导者”这样的光环保持头脑清醒和心态冷静。中国再怎么强大也不可能统揽天下事，这个世界上错综复杂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各国商量着办。毋庸置疑，中国对国际秩序有自己的追求，肯定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事实上已经在这样做了。比如，中国作为东道国主动设置议题，推动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就建立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达成共识，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向前迈出新步伐。再比如，2016年9月3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巴黎协定》，习近平主席在杭州亲自将批准文书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在应对气候变化上领世界风气之先。

六、推动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秩序

安全威胁的复杂化是当今世界的一大挑战。像中国这样一个身处复杂地缘环境中的大国，不会推卸自己肩头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的责任。回顾历史可以看出，自17世纪民族国家在欧洲兴起以来，人类从未实现普遍持久和平，一个又一个世纪见证的是权力争斗和血腥冲突，国际政治舞台上一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样的剧本不应再重复了。中国是要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将要开创全球性大国和平崛起的历史先河，因而有责任、有必要构建这样的能力，去推动整个世界沿着和平发展的路径走下去。正像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要“积极提供解决全球性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建设性方案”。

在未来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全球治理的构建和完善过程中，中国与美国之间权力和利益的平衡乃至观念上的协调是需要处理好的一对矛盾。两国在政治制度和国际关系理念上有比较大的差异，中国对美国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同，但双方在很多领域也有共同利益和基本共识，是需要也是可以合作的。中国应该能在自己认同和具有能力的领域逐步增加投入，体现大国担当，让变革水到渠成。

全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外延，参与国际治理需要以良好的国内治理作为基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对内强调发展、进步、公平、法治，对外促进和平、合作、公正、共赢。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实现和平崛起，同时反哺经济全球化进程，推进国际秩序的合理变革，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不会也没有必要回到大国地缘战略争夺、列强争霸的老路上去。长远看，中国应该有兴趣、有能力、有魄力推动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秩序框架，好比搭建一个能为大家遮风挡雨的共同屋顶，最大限度地容纳各方利益诉求和治理观念。

---

1. 本文作为《参考消息》“两会专题：中国走近世界中心纵横谈”特别约稿，发表于《参考消息》2017年3月9日第11版。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圆满闭幕。论坛的成功举行，使国际社会更加广泛地了解了中国的外交理念和诉求，在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必将产生深远影响。习近平主席在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指出，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这充分表明，“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探索与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主张和理念，提倡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2017年1月在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发表主旨演讲时谈到，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新型国际秩序的包容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对21世纪世界发展中各种新要素的思考，本着回答“人类向何处去”这一哲学和历史命题的担当，从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的角度，针对世界格局和全球治理的发展变迁提出的愿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总体上保持了和平与发展，其主要保障因素是国际秩序的构建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挑战的增多和国际行为体日趋多元化，现行国际秩序无法有效应对各种问题，安全失序和发展失衡的风险越来越大，全球治理呼唤改革与创新。

中国所认可的现行国际秩序，是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相关国际机制构成的国际框架。联合国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主导设计的，体现了民族国家理念和多边主义的“世界政府”理想，西方发达国家在培育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个国际秩序是历史的进步，它把国际关系纳入规则框架，尤其是强调对世界的金融、贸易和发展等问题在公认的规则基础上进行治理。

然而，这个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并非西方集团所推崇的“世界秩序”的全部。美国赢得冷战胜利后，从西方集团的领导者转身，自诩为世界的领导者。美国所领导的“世界秩序”是西方秩序的延伸，虽然它与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有重叠，但也有明显不同：它在安全上以军事同盟体系为支柱，将军事同盟体系成员的安全利益凌驾于非同盟国家的安全利益之上；在政治上则谋求按照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模式改造非西方成员。在这种宗教般的“使命感”推动下，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处理地区热点问题时一次又一次犯下错误，所引起的动荡贻害多方。美国对联合国也是可用则用，不可用则弃置一边。

中国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中国接受了发达国家倡导的经济全球化并投入其中，也基本上接受了传统的世界贸易和金融规则，并通过自身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不断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但中国在安全利益上受到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排斥，在价值观念上被视为“异类”，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对中国并不完全包容。对于西方国家所推动的政治和安全的全球化，中国保持了警惕和防范，努力维护自身的安全与稳定。近些年，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具备影响和推动现行秩序规则变革的能力，开始关注全球均衡发展等问题，关

注国际社会对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的合理需求。一些国家因此把中国看作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

国际秩序的演进总是起伏不断的，好的国际秩序应能包容所有成员方的利益。目前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虽然在效率和执行力上都不完美，但已是接近人类公平理想的国际框架。同时，这一国际秩序必须进行自我完善，需要激发其改革的内生动力。中国并不想在现行国际秩序之外另搞一套，而是希望看到一个共同的“世界屋顶”，这个“世界屋顶”足够宽广，尊重多样性，包容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国家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这种包容性的最佳诠释。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完善和发展，需要既有沿袭也有创新，既有解构也有建构。我们要不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注入具有感召力和可操作性的内涵，使之切实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促进国际社会以发展和合作的方式迎接挑战、处理危机、解决问题，科学建构新型国际秩序。

二、以对话协商、互利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难题

合作安全的观念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其本质是非扩张和求稳定、基于道德和道义的政治理念，例如心怀天下、崇尚和平、注重防御、文武并用、先礼后兵等观念。现代中国外交讲究守护根本利益，以对话协商、互利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难题，主张即便战争不可避免也要有充分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合作安全更是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的回应。当前，人类已进入一个安全挑战多元化的时代。随着文明的进步、利益的交融和多边安全机制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大国争斗、集团对抗受到制约，爆

发大规模地区战争的风险总体可控。能改变各国战略安全议程并考验国际治理机制的，是恐怖主义与极端势力的跨境挑战和网络安全这样的新型挑战。当人类面临的安全挑战突破主权边界、以非传统方式在全球范围扩散时，任何一国无论实力多么强大都难以独自应对。因此，必须打破传统安全观念的藩篱，突破冷战零和思维的束缚，基于共同安全利益，以安全的合作求得合作的安全。

合作安全是相对于美国领导下的军事同盟体系所信奉的集体安全观念而言的。集体安全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提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盛起来的，有效地维系了集团成员的安全与防务。但美国领导的同盟协作模式本质上基于零和思维，它无限扩大成员国的安全利益，挤压非成员国的安全需要，追求自己的绝对安全，不惜削弱甚至剥夺对手乃至别国的安全，也就不可能带来人类社会的普遍安全。这种安全模式的另一个弊端是，它以同盟协约的形式存在，事实上把盟国间的安全利益和对外战略进行绑定，双方的决策空间都会受到限制。合作安全观念则超越集体安全观念，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敌我友划线，站在维护全人类共同安全利益的高度，其历史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亚太地区，合作安全的实践场非东北亚莫属。过去十几年，朝鲜半岛核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美国与朝鲜之间极度不互信，多边外交谈判几次达成的协议都没有得到全面执行，朝鲜不断试核试导，美韩连年在半岛举行针对朝鲜的大规模军演，形成相互刺激、螺旋下降的恶性循环，局面徘徊在失控和爆发冲突的边缘。为了破解难题，中方提出“双轨并行”和“双暂停”建议：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演，重回谈判桌前，之后，将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结合起来，同步、对等地解决各方关切，最终找到解决半岛安全问题的根本之策。目的是先暂时摆脱安全困境，再寻找实现共同安全的路径。有鉴于朝核危机反反复复的教训，应在采用外交手段稳定局面的同时，努力引导各方进入合作安全的轨道，在促朝弃核的同时，

通过经济层面的运筹、双边和区域多边手段的并用，把朝鲜的注意力吸引到改善民生、参与区域合作上来。20世纪90年代，关于“东北亚经济圈”的探讨兴起一时，朝鲜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21世纪初，开城工业园为改善半岛南北关系做过成功的试验，惠及南北。新形势下，东北亚合作蓝图需要新版本，共享发展应该成为解决安全问题的新思路。

三、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发展是安全的必要条件。很难想象，一个极度贫困落后、内部发展失衡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实现长治久安，人类历史上不胜枚举的教训告诉我们，发展的失衡正是各种极端思潮冒头的土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鼓励全球和区域合作向发展中国家倾斜，最大限度地解决南北之间和地区内部发展失衡的问题，为世界经济全面可持续增长提供新动力。

亚欧大陆的中心和南部边缘地带曾有过辉煌的古代文明，现在大多沦为不发达和欠发达地带，构成亚欧发展的“洼地”。多年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等对这里的发展给予了关注，但这些机构提供援助的政治门槛高、审批效率低、到位资金有限。2013年，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以周边为主要方向，着力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亚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新型公共产品。习近平主席2016年8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他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

讲中进一步强调，中国将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持续发展，为"一带一路"注入强大动力，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满足各国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旨在激活沿线国家的增长潜能，这无疑有利于稳定世界经济局势、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估计：到205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望达到80%以上。说一千道一万，中国就是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使各方共同努力把亚欧非大陆的发展"洼地"填起来，开创一个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新时代。

四、在政治包容的基础上促进不同制度模式交流互鉴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政治包容。世界上的国家林林总总，不同国家和民族在探索形成更好社会制度和文明范式的道路上，都在进行自己的尝试，没有哪一种道路或模式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要义就在于"百舸争流"，允许各国以不同方式和路径迈向文明、民主、繁荣的共同目标。

不同制度模式的国家相处，必须相互尊重，在此基础上才能开诚布公地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支撑起人类文明的大厦。为确立符合自身国情的制度，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在积极学习借鉴、反复试验实践，经历过许多挫折，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敢于学习，也敢于坚持自我。举一个与我在全国人大工作直接相关的

例子。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国的司法制度建设自此进入民法典时代。民法典是实行大陆法系国家司法制度成熟的重要标志。而中国的民法典编纂工作一路走来，历经坎坷，参考借鉴了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民法典制定，同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国情，植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实践和人民的利益诉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制定，是一个集百家之长、吸纳人类文明进步成果并将中国特有的时代精神融汇于其中的过程。可见，中国从来没有停止对人类文明先进成果的借鉴，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在不断学习中完善发展道路。中国已经找到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将不断用自己的实践点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路的火炬。

---

1. 本文于2017年5月16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第8版。

中美关系

中美要培养在国际事务中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对做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来说，可谓生逢其时。现在中国对外交往十分活跃，习近平主席刚刚结束对拉美五国的访问，达成许多富有长久影响和深远意义的协议和共识。近两年中国在周邻和国际上提出许多重大倡议、建议，乃至理论和观念，展现出一个成长中大国的视野和追求。

今天这个研讨会的重点之一是发布2014年版《美国蓝皮书》，我周末看了一遍，感觉内容相当丰富，是在大量事实和数据基础上形成的冷静和客观的看法和结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学界对美国和对中美关系看法之集大成。我从中很受益，所以首先对这本书的发表表示祝贺。

在当今网络和信息的时代，资讯的传播更加便捷，为更广大的人群了解世界提供了可能。但是，网络也容易刺激浮躁和冲动情绪。所以，我们更加需要那些心静如水的学者坚持严肃和严谨的调查研究，言之有物，言之有理，为中国社会负责任的思考提供基础和营养。

当前，在国际关系研究上有两个大课题：一是如何看美国，焦点是看美国如何适应新的、更加多元的国际环境，如何调整和选择政策；二是如何看中国，焦点是作为一个主要的新变量，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的走向。因而，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美国这个最强的发达国家将如何相处？这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界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不久前，我在纽约开会，有幸向基辛格博士请教这些问题，他认为，美国处于不寻常的时期，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美国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外交政策也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上。

我将美国对新时期的不适应归结为“焦虑”。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美国陷入对自身是否会衰弱、中国是否会与自己争夺世界权力的焦虑之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令许多美国人有“惊回首”一般的错愕感。在2000年的时候，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值为9.9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30.8%，比排在后面的四个国家——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还要多。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名是第六位，1.2万亿美元，只是美国的1/9。

进入21世纪后的十多年间，中国保持快速发展的步伐，没有严重内乱，也没有卷入大规模的外部纷争。201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额达到9.4万亿美元，比美国的一半还多。

从更广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成长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一个重要变化——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范畴。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原来集中在拥有10亿人口的西方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向更广阔的地区扩散，许多发展中国家有效利用了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经济充满活力。2012年下半年，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度达到90%，目前也在50%以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跟上了时代潮流，行进在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成为建设和平繁荣新世纪的重要力量。

当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时候，将为世界带来什么？中国向世界要什么？能为世界做什么？中国是否能与各国一道制约战争，守卫21世纪的和平？这是我参加国际研讨会时经常听到的问题。

西方学界有人把焦点放在当今世界经济最活跃、同时也出现许多矛盾的亚洲，试图寻找新的权力争夺和冲突的爆发点。有观点认为，中国与历史上争夺国际权力的新生强国有共性，中国周边出现的争议热点也被类比为历史上新老强国之间的利益摩擦。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些观点和疑虑是本末倒置。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就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

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

国际学界为什么总有人误读中国？原因之一恐怕是源于西方传统的逻辑，即：一个国家强盛起来后，必然寻求重新划分世界权力、试图取代现存强国的地位。这个观点在美国也很有市场。每当我介绍中国刚刚初步解决温饱问题，还有许多贫困人口，发展也面临许多严峻挑战时，美国学者告诉我，美国的普通老百姓并不了解中国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也不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美国人看到的是中国人越来越有钱，觉得中国变得更加富裕和强大，会越来越像美国。

诚然，新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环境对中国也是挑战。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处于边缘地位到进入国际事务的中心舞台，中国自身的利益也不再局限于国界之内，而是延展到周邻地区和全球。中国也在努力适应新的地位，增强国际意识，担当国际责任，促进外界对中国的了解。社科院发表的2014版《美国蓝皮书》正是这样一个向外界比较全面阐述中国观点的作品。

确实，中国与美国政治、文化差异很大，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很大，在对国际事务的政治思维上我们有很多不同之处。例如，中方对美国主张政治同化、对差异缺乏理解和尊重的观点难以认同。在缩小发展差距问题上，中国希望美国能有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在处理当今世界事务中的矛盾和分歧时，美国的习惯思维是要其他国家“跟我走，帮我忙”，这让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感觉困惑和难以接受。

同时，中美现在是全球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之间合作之广泛超越了过去的任何时期。两国建立了90多个政府间对话机制，学术对话更加丰富。两国人员往来每年超过400万人次。

在国际方面，我们都表达了希望世界保持和平的愿望，我们都需要世界经济稳步发展，也都支持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原则。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们都尊重和支持联合国所代表的多边合作框架。美国参与制定了很多现行国际规则，是受益者，中国也是现行国际体系的成员和受益者。同时，国际治理和规则的改革没有中国和美国的积极推动将难以实现。

显然，中美关系具有双重性的特点，这也决定了这是一对复杂和不容易驾驭的双边关系，有时水火不容，有时又水乳交融。而中美关系处理不好，必然危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两国相互理解和信任的缺失则会使许多问题和矛盾放大化，对两国关系造成更多的干扰。例如，尽管美国官方多次阐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的并不是要遏制中国，但给许多中国人的感觉是，自此太平洋不那么太平了。我最近与美国一些议员交谈，感觉相互之间是有不少误解的。

在2014年7月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如何判断彼此战略意图，将直接影响双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发展什么样的关系。不能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犯错误，否则就会一错皆错”。他说，“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着眼于将两国关系引向和平合作的轨道：“关键是我们要共同解决问题，而不能被问题牵着鼻子走”。确实，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两国各界通过对每一件事情的耐心和妥善处置，通过年复一年地增进相互了解去实现，当前重要的是认真考虑能在一起做些什么。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对中美双方都是新课题。美国国际合作经验很丰富，但是中国与美国所熟悉的传统伙伴很不同。21世纪的中美跨太平洋合作关系应该是平等和双方都有需求的合作，不仅要双方都主动推进，还需要双方都能够妥协，能够照顾对方。关键是不能一方总是

要求另外一方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应该是都有进有退，真正平等合作。特别是双方需要更好地沟通，不仅是在战略层面，还包括与彼此民众之间的沟通，以利于消除误会，要培养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

1. 2014年8月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当前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与中美关系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美国蓝皮书（2014）》发布会在京举行。傅莹应邀与会并发表讲话。讲话全文收录于《美国研究》2014年第5期。

探索中美之间的相处之道[注]

探索中美之间的相处之道一直是两国学界关注的重点。我们需要关心美国的发展与变化，了解其中的事实和原委，寻找推动合作和处理分歧的答案。同时也需要跟上世界的发展与变化，研究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领域，提出创新性的应对，甚至是主动影响的手段和办法。我想这正是《美国研究报告（2015）》想告诉我们的，我对这个蓝皮书的发布表示祝贺，对所有参与和做出贡献的学者和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2015年5月中旬我刚访问了美国，见了几位参众议员和资深教授，接触了7家智库，还与一些媒体人座谈。总的感觉，美国对华看法比较多元，释放的信号相当复杂。观点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悲观派”，我最有意思的经历是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激烈的谈话，他表达了对未来中美关系最严峻的看法，强调只要中国按照现在的速度成长下去，中美对抗甚至是冲突难以避免。他认为中国正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当今世界秩序，使之符合自身利益。美国与其等待未来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无法控制，不如现在就联合起来应对。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中国可以等待，但我们不行。”不过，他的观点在美国属于极端的，不少人让我不要太关注如此脱离现实的言论。

第二类是“乐观派”，主要集中在经济、金融和科技领域，他们对与中国合作期待很高，认为一个成长起来的中国能带来更多机会，能为双方创造共赢的结果。他们提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30%以上，中国经济保持增长和中美合作对于美国、对于世界都至关重要。如果中国能成功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将为各大贸易国和跨国公司提供巨大机会，而作为中国主要合作伙伴的美国企业将获益良多。

第三类可以称为“谨慎派”或者“焦虑派”，这好像是当前美国智库在对华看法上的主导性情绪。许多人坦诚地表达了对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担忧，但并未得出过于极端的结论。美国所有智库和媒体都在激烈地讨论中国在南海扩建岛礁的意图，他们关注的焦点似乎不在于领土的归属，而是担心中国试图把美国的势力赶出亚洲，因而主张美国要坚决顶住中国的扩张。在这个气氛之中，有些常年关注中美关系的资深人士也开始担心：大国滑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是否会重现?

在美国智库和媒体看来，正是因为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才会无论做什么都会引发关注和疑虑。也许这也是为什么，中美双方在南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高科技和军事问题等领域出现的分歧和问题，都容易被放大和政治化。

我再次见到基辛格博士，他在谈话中坚信美中两国合作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主张多沟通，真诚合作。对于未来秩序，他认为世界进入一个共同秩序的前景是存在的，但是会很艰难。

围绕这个情况，我与中国学者也交换了意见，大家的观察是，在这些表面现象之下，存在美国对中国深层次的失望：一是美方所期待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必将带来政治制度变革”的情况没有发生，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没有出现，相反，中国取得的成功和增强的自信使中国道路更加不可逆转。二是融入国际体系之后的中国，并没有成为屈服于美国意志和利益需求的辅从，而是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设计和塑造国际和地区事务的方向。三是中国经济进入改革的深水区，美国一些大企业长期在中国获得高额利润的好景不再，它们有些不适应甚至抱怨。

正是这种焦虑和矛盾的心态，使美国对中国在气候变化、海上搜救与护航、全球经济治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总是在支持、认可与怀疑、阻碍之间摇摆，对中国成长的正面和建设性效应喜忧参半。例如中国倡导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亚投行”以来，美方释放的信号十分混沌。但是形势比人强，这次我在美国听到的各方结论相当一致，都认为美国没有理由不积极支持和参与其中。

确实，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大国之间通过协商而不是战争而建立起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和秩序，好像还没有先例。是否美国还是习惯并且希望继续以“我主、他辅”的方式领导世界？近年美国领导人和学界一再强调，必须保持对世界的领导地位。我在想，美国对“领导权”问题的焦虑，是否源于对自身处境和世界变化的不适应？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出现的起伏是否也折射了这个变化？

例如，在亚太安全问题上，美国强调同盟体系，但是美国统领的军事同盟不涵盖所有亚太国家，仅仅依靠同盟这个小圈子、只保障同盟成员的安全利益，如何能维护亚太整体的和平与秩序？如果把自己和小圈子的安全利益凌驾于亚太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之上，如果以为对小圈子的领导地位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是难以为其他国家所接受的。所以，并非中国或者哪个国家在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而是美国自己需要走出旧的理念和习惯，需要考虑基辛格博士所谈到的，如何构建一个共同分担责任的世界秩序，需要克服现有的所谓“安全秩序”缺乏包容性这一缺陷。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核心就是希望中国和美国这两个重要的大国避免陷入大国竞争冲突的老路，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新路，也为世界大国的相处之道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虽然中美之间的分歧总在干扰合作，但并未改变两国全方位交往与合作的大局。中美可以说是当今世界合作面最广泛、最深

入的两个大国，2014年双边贸易额高达5550多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1200亿美元，两国间航空旅客达到613万人次，预期这个数字将以15%的速度继续增长。（1981年1月7日开辟了第一条中美航线）。

2014年11月两国签证延至10年的新政策，大大带动了人员往来，中国人赴美旅游和留学呈现新一轮热潮。据说美国使馆平均每个工作日办理的签证增加了50%，全年向中国公民发放的签证可能达到260万。（可以想见，美国驻华使馆签证官是多么辛苦。）

由此可见，中美两国在现实生活中的交往与合作是十分活跃的，并不能支撑对两国关系悲观的看法。

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世界的1/3，我们的合作对当今世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两国关系中的风吹草动都会牵动世界的目光。

2015年9月将见证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第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双方提前7个月对外公布消息，也体现了重视和对访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对关心中美关系的学界人士来说，重要的是把握住大方向，做些扎扎实实的研究，努力回答影响两国关系的大问题，增加“确定性”，减少“摇摆性”。

在诸多需要考虑的问题中，我觉得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第一，中美需要开展更加有效的沟通。目前来看，一旦发生分歧，双方都难以说服对方，有点各说各话，或许有必要及时在不同层次把政策和战略意图阐述得更加清晰。两国官方和民间对话的渠道很多，需要提高对话的效果。我自己的体会是，彼此在宣介自己立场和主张的同时，也要倾听对方观点，最好每次都能有些共识，而且坚持下去，不轻易动摇。考虑到中美关系早已超越了双边范畴，两国不仅

需要讨论双边问题，还需要围绕地区和国际问题开展有效对话，减少误解和误判。

同时，也要让两国民众更多地了解这些对话的内容和结果，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对双方对话的深入和政策的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双方在民间和媒体层面不断累积对立和对抗的情绪，对两国不同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也不可能不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是要避免相互刺激的言论和行为，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加强对风险的管理，防止危机的发生和失控。正如最近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谈到的，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登上美国海军P-8A巡逻机，在中国南沙群岛工程上空进行侦察照相的行为，是很危险的。需要看到，这类“走边缘”的做法很容易给中美关系增添危险因素。

美国对中国在南海的意图充满疑虑，而在中国人看来，美国这些年在南海问题上一直表现出强力介入的姿态，像一只冲进瓷器店的鹰，将这个地区好不容易形成的对话和搁置争议的格局搅乱了。美方学界一向不赞成把亚太出现的紧张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相联系，我们也希望这不是美国的意图，毕竟，冷战后的美国偏向于使用军事和胁迫手段解决世界上的各种问题，已经导致更多的混乱和贫困。

在全球层面，美国政府为了吸取教训采取了相对务实和慎用武力的做法，但是美国学者普遍认为效果不彰，需要重新调整，有人主张回归强硬路线。我想知道的是，这是否意味着美国要在亚太地区采用已经在中东被证明错误的方式？难道，美国不应寻求新的更加符合时代进程的方式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交往？在这些问题上，中美需要更好地沟通，包括两国学界也需要多讨论，更好地了解彼此。

第三，对中国来说，我们需要更快地适应新型大国的地位，学会及时和清楚地向世界阐明自己的想法和意图。

当然，中国现在还处于大而不强、将强未强的阶段，我们正在学习成为全球性的大国。现在经常听到美国或者是欧洲人在一些国际问题上要求中国发挥领导作用。“领导作用”这个词在中国人听起来，既新奇又陌生，要在世界的中央舞台长袖善舞肯定是需要时间的，而我们自身的发展和改革也正在进入难度很大的攻坚阶段，关键还是要把自己的事办好。

作为一个学习中的大国，中国人需要多几分冷静和耐心，多几分宽容。我们也可以从对美国这个有经验的大国的观察中学习，趋利避害。我国学界对美国的研究需要更加深入，美国对华政策似乎不是单一的线性逻辑，有时候会是多重逻辑的叠加。我注意到最近美国智库界普遍主张重审对华政策，中方需要对此重视，更加积极主动地说明自己的意图和政策，多介绍中国的观点，避免美方在不完整、不准确的信息基础上对中国做出判断。

学界需要围绕双方的合作关系加强理论建设。四十多年来中美合作的实践往往走在理论构建和政策研究的前头，这个状况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现在人们已经广泛认识到，随着形势的变化，中美合作的重点、排序、形态与范畴都在发生变化，相互期待的落差也在扩大，需要突破旧观念，更加主动地为克服困难、保持和加强合作设计路径。学界应当有所超越，辅助两国决策者为中美合作规划路线图。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美建交35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和世界。

我相信，《美国研究报告（2015）》将对我们加深对美国的了解发挥重要的作用，对即将到来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和人文对话，乃至秋天的中美高层会晤，都是很好的参考。希望学界和智库界人士能够不断提供更多更好的智库产品，服务于国家发展和对外决策的需要。

---

1. 2015年6月4日，傅莹出席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报告（2015）》发布会并发表演讲。演讲全文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10日第749期。

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理解与误解㊟

有次我应邀在北京一个国际论坛做晚餐演讲，提问环节有人问：美国有哪些方面让中国人感到不好或者不喜欢？在场都是熟人，我就实话实说：主要是不喜欢美国人颐指气使、居高临下地教训人吧。令我多少有些诧异的是，在座许多美国人很惊讶有人这样看美国。世上有些事儿，对有的人如此显而易见，却会让另外一些人出乎意料。

后来，我给多个微信群发去这个问题，征询意见，得到内容丰富的反馈。有人写了很长的评论，也有人表达了淳朴的想法，例如Peggy（佩吉），一位母亲：美国人对饮食太不严肃，许多餐厅尽是油炸和咸味食品。好，小学生：美国的动画片很好看，美国的父母给孩子自由，想做什么做什么。辉，中国西部的生意人：对美国印象最深的是高速公路没有收费站，生活多么简单幸福。

在所收集的评价中，既有喜爱和赞美，也有尖锐的批评，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美国的成就和美国人的优点得到很高评价。锐，资深媒体人：美国拥有发达的服务业，商业管理水平高，电影制作和高等教育体系都是一流的。林，学者：美国的危机管理、投资管理、社会分工和协调、标准化和规范化程度都令人称道。侯，母亲：美国人热情、幽默、具有人文情怀，对大自然和生命充满尊重与热爱，富有探索精神。海，资深外交官：美国具有强大的开拓创新能力，科技和商业人才辈出，引领并改变世界。似乎让美国独霸世界不行，没了美国也不行。思、勇和昆，都是大学教授：喜欢美国的法治、平等精神、大熔炉文化的包容性和敢为天下先的气魄。钧，学者：美国人总是觉得做得还不够好，不断奋斗。敏，海外华人：中国人会永远铭记抗战中来自太平洋彼岸的支持。

另一方面，不少人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做法持保留意见，首先是美国人对中国缺乏了解。

澜，媒体人：中国这么大，而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关注点翻来覆去只有那么几个议题和个别人，使得美国民众获得的中国信息比较片面。薇，女记者：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不喜欢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把中国看成“铁板一块”，实际上中国社会是非常丰富和多元的。许，浙江生意人：不喜欢美国动不动就对中国的内政、人权指手画脚，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和发展历史都有很大差别。华，退休干部：美国对中国的偏见和批评会刺激对美反感和一些民族情绪的上升。姚，博士生：美国不把中国当成真正的伙伴，在出口上有许多限制，总是在猜忌中国。王，年轻公务员：在美国的概念中，世界只有两种人，美国公民和非美国公民，对美国公民无罪推定，对非美国公民有罪推定。

再者是许多人认为美国言行不一致，希望美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发展上承担更多责任。郭，年轻创业者：美国人非常自大，认为自己总是正确。米莎，资深外交官：美国唯我独尊，凡不听我的、不与我为伍的、不符合我利益的，都坚决打压。陈，退役将军：美国思维固化，凡是盟国做的都是对的，坚定支持；凡是国会通不过的，任何国际承诺都无效。虹和英，公务员：中国人崇尚谦虚礼让，好面子，不喜欢美国人居高临下那一套。普、明、雷，年轻外交官：美国人说一套做一套，对国内是一套，对国外又是一套。一方面在其他国家鼓吹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大搞强权政治。杨，生于1999年的高中生：美国电影中暴力和血腥的场景太多，不尊重人的生命，与它宣扬的价值观不同。郑，大学教授：美国既要保持其全球领导地位，又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相应的全球责任。吴，大学讲师：喜欢美国人，有很多美国朋友，但不喜欢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政策和行为，过于进攻性。广，退休体育界人士：美国坚信“强权就是真理”，这某种程度上增添了国际矛盾和冲突。

尽管我的微信朋友圈未必能包括中国社会所有阶层的人士，但从这样一个简单的调查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具有很强的多元性。我相信，如果同样的调查在美国进行，也会收获“对华认知”的多元意见。这就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彼此的了解究竟有多深？能否与两国不断扩大的双边关系及其对世界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相匹配？

我观察，中国人对美国的赞赏可能主要是冲着美国的发展经验去的，在肯定美国的同时也把自己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希冀寄于其中。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引进了大量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一进程没有也不会终结。与此同时，中国人对美国的不喜欢往往与两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有关，恐怕也是所谓中美“战略互疑”的重要原因。

这种结构性矛盾最突出的表现是美国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成见和否定，会影响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判断。各国文化传统和政治经历不同，容易从自己的角度去考察和判断对方。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中国注重集体利益，缺乏民主和人权，因而“不正确”。而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美国人推崇自己的价值观，倾向于在其他国家搞政治演变，需要保持警惕。这类简单化的观念使两国相互间的看法大相径庭，也影响到对彼此和对许多问题的看法。

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作为英文翻译陪同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代表团去上海访问，参观游览中，一位外宾与我聊起来，说：你是否认识到中国人缺少自由、没有人权？你看，上海这么好，你很喜欢，但是你不能搬到上海来居住，中国人没有迁徙自由。我当时似懂非懂，晚上回去琢磨。第二天又碰到他时，我说，你讲得对，我是不能搬到上海来住，因为我们吃饭是凭粮票的，我的粮票只能在北京使用，换成上海粮票不那么容易。另外，来上海的火车票也比较贵。

不过这个情况很快就改变了，中国最后印刷的粮票是在1993年，当时粮食供应已经非常充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大部分年轻人成长时已不再遭受饥饿的困扰，他们学习和了解世界的空间和维度都很不同，行动和迁徙更加自由。当然，想去美国时办理签证还是要排长队的。2014年底美方对中国人赴美签证延期10年的新政策，推动了赴美旅游和留学的新热潮。

我从这件事学到的是，凡事都有缘由，也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调整，不能随意地政治化。“自由”是个伟大的词汇，但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和人权正在扩大，当然可以，也会更好。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的所有立法和法规都要符合宪法的规定。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讲话传播范围很广。最近常听到美国人对中国涉及网络问题的批评，甚至使用“网络盗窃”这样很难听的字眼。我也是网络使用者，不了解美国人的指控有什么技术依据、动机和逻辑，但是我和许多网民联想到的是：中国的网络用户是否安全？《中国日报》就曾经报道，根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的抽样检测发现，2014年60天内源自美国的2077台木马或者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1.18万多台主机。目前中国的基础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广泛使用美国的软件设备、产品和服务。如果美国把中国视为网络的防范对象而不是合作伙伴，那么，中国广泛使用美国软件是否安全？所以，我认为美国应该慎用指责和敌对的语言，因为这是要产生后果的。而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中美其实有着很大的合作空间。

事实上，中美两国人民在价值理念上并非完全没有共同点，例如都希望国家强大，都重视家庭，有爱国主义精神，崇尚英雄，注重专业精神等。两国人民都追求世界和平，希望促进发展，中国重视民主

建设，并且在不断发展进步，虽然道路与美国有所不同。正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否则何以解释中国的活力，抑或美国的成功？

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的新因素源于美国感受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持批判态度，担心中国要挑战美国主导的规则和秩序，美八届政府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现在也面临一些质疑。我在美国参加研讨的时候，几乎无人不问南海问题，但是没有人能回答我提出的最简单的问题：南海有多大？美国人关心的也许并不是在争议岛礁归属上的是非，而是担心中国要把美国势力从亚洲赶出去。事实上中美在维护亚太的和平稳定与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上有共同利益，目前看这里的航行自由并没有什么问题。比较其他地区，亚洲在过去的20年保持了环境稳定和经济繁荣，这与中国坚持平等相待、和平合作的周边政策，以及中美合作而不是对抗有很大关系。中国不是有帝国扩张历史的国家，我们不认可搞强权政治和势力范围的逻辑，我们在周边坚持的是平等相待、和平合作的政策。

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70年前中美站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共同立场上。“二战”结束之后，当时的中国政府根据国际文书收复了南沙群岛，美国对南沙岛礁的归属应该是清楚的。即便一些现在与中国发生争议的国家，过去也曾经以外交照会和出版地图等方式承认中国的主权权益。

对于目前存在的争议，中方完全是出于维护周边和平稳定的愿望，同意以和平方式谈判解决，并且提出搁置争议和共同开发，但是中国不能放弃主权，人民也不会答应失去这些岛礁沙洲。2014年中国对在南沙的一些岛礁采取了吹填扩建，不仅将改善中国守礁人员的生存条件，而且增强了中国维护南海稳定、生产秩序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在中国，许多人对美国感到失望，认为后者不论是非曲直，总是在领土和海洋权益问题上与向中国发起挑战的邻国站在一起，人们担心美国是否要利用自己的盟国体系给中国制造麻烦？是否试图创建

遏制中国的包围圈？最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美国的空军飞机每年都在中国沿海进行逾千次抵近侦察?

美国对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投行的消极反应是一个更有意思的最新案例。这本来不应成为竞争点，但美国视之为在其主导的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之外构建新的秩序。中国的意图并非如此，而是在现存国际规则的框架内，提供一个新的公共产品，帮助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克服基础设施建设中面临的资金瓶颈。美国在亚投行问题上制造困难，强化了人们对美国企图遏制中国的担心，也让不赞成阴谋论的人感到困惑。中国的成长也伴随民族自豪感的提升，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则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和谐气氛。中美两国曾在金融危机中同舟共济。当前世界经济还远没有完全走出困境，中国经济进入艰难的结构调整和转型阶段，美国经济也在艰难复苏中，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事务中有需要也有可能实现全面合作，应共同应对挑战而不是拆台。

我认为中国与美国实力转换的规模和速度被夸大了，在中国，没人认为美国会垮台，美国的担忧更多源于对自己有可能走向衰弱的焦虑不安。中国人所追求的是在现存规则框架内获得与国家力量和利益相符合的话语权和空间，阻挡这个自然的进程是不明智的。中国和美国都是复杂的大国，场景也在不断变幻，很难简单地去评判对方。我们应做的是更加主动地塑造对彼此的认知，趋利避害，保持双边关系的活力和稳定。

当前中美关系处于重要的调整阶段，双方需要通过增加相互理解和人民往来，使彼此更加靠近。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广泛关系，例如，2014年两国间航空旅客达430万人次，接近于每周8万人次，预计今后将继续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到中国，有的美国人一踏上中国就不愿离开，在这里找到工作，居住生活，在电视节目上常能看到说流利汉语的美国年轻人。中美两国之间

的巨大合作与交流说明我们彼此相互吸引，一些误解也许会在相互更加了解之后逐渐发生变化。

许多中国人与美国人打交道之后，都有这么一种印象：美国人的对华认知往往脱离中国现实。中国有句古话，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现在既然美国人更加关心中国，也许可以尝试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也需要反思。美国是一个热衷于并很善于推介自己的国家，而中国在这方面并不那么擅长。所以，中国人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构建自己的叙事方式，让外界更多了解我们。

总而言之，中美对彼此的认知和战略选择并非单一的线性逻辑，而是要复杂得多。所以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我们致力于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不因政治问题或者孤立事件而受到干扰，一个建设性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中美两国人民更好地相互理解，中美两国加强合作，整个世界都会因此而受益。

---

1. 2015年9月9日，在美国赫芬顿网络平台《世界邮报》网站刊文，纵论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理解与误解。该文中译文由观察者网独家发布。9月11日，《人民日报》第5版《名家笔谈》栏目发表此文节选版，题为《中美增进了解与合作有益于世界》。

中美之间，重塑共识？注

来美国之前我做了一些调研，发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人们对中美关系的看法都比较多元和复杂。尤其在舆论中，南海问题似乎上升到中美之间地缘战略较量的高度，在一些人看来只能兵戎相见了。

然而，从现实生活的一端看中美关系，又是另外一副样子。

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三年六晤，议题广泛，两国经济合作不断深化，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依托，中国已成为美国单月最大贸易伙伴。2015年，中美之间旅游往来人数接近500万人次，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告诉我，平均每16分钟两国之间就会有一架飞机起飞，每周有500架这样的航班往来。即便是看起来气氛相对紧张的两国军方，也有更加频繁的对话与交往。在气候变化、核安保等跨国议题上，中美合作日益发挥全球引领作用。

那么，舆论和现实中的中美关系，哪个才是真实的？抑或都是真实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中美关系在变化，合作与竞争的因素都在增长，舆论与现实的落差，或许正说明两国需要重塑共识。我想借此机会对双方观点做个简单的归纳。

美学界的看法主要有三点。

首先，美学界有人开始质疑政府长期以来奉行的对华“建设性接触”政策。他们认为，过去八任总统坚持的对华政策都是基于一个假

设，即美国可以通过支持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催生政治变革。现在看来，美国预期的变化没有发生，他们因此判断建设性接触是“失败”的，呼吁重新制定对华战略。

其次，随着中国经济减速，美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在动摇，担心中国经济下行会拖累美经济复苏。大企业尽管对中国市场仍然充满期待，但也担心改革的“红利”在减退。

最后，美学界关注中国崛起后将在世界上发挥什么作用，有人认为中国要在亚太建立自己的“新霸权”，甚至试图取代美国充当世界“老大”。在中方看来，这种“焦虑感”反映出美方对可能丧失全球领导地位的恐惧。

当然，对中国未来作用的判断不乏客观、理性的声音。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未来作用既取决于自身文化，也取决于外部世界与中国的互动。

中国学者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也可以归纳为三点。

首先，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与对美开放同节奏的，对美政策目标与总体外交目标相一致，那就是：改善国际环境、发展自身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非为了输出价值观或寻求世界霸权。中国多年来的对美政策目标得到了实现，而美国也是其中的受益者。

其次，中国经济正经历重要转型，两国需要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进行合作。中国企业有兴趣和条件更多地进入美国市场，而政治互信的缺失阻碍了这方面的进展。2016年9月中国将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希望中美双方抓住契机，开辟两国共促全球均衡发展的新机遇。

最后，中国学界更多地是从国际秩序转换的角度思考中美关系的。不少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形态正在发生质变，不再是过去那种“弱

者与强者”的关系，但也未上升到“两强”阶段。同时，中美关系似乎正从“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向“合作可以成大事，相争也可能坏大事”方向转换。

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需要同时处理好两大难题：其一是如何在现存秩序内与美国共处，打破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的怪圈；其二是如何推动现存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但美方发出的信号常令人困惑。例如，中国在学习和适应新角色并努力发挥更大作用，包括尝试提供公共产品以补充、健全现存体系。而美国没有展现包容，而是对中国提出的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倡议做出拒绝、阻挠的姿态，宣称“21世纪的贸易规则不能由中国制定”等。这些都在刺激和影响着中国人对外部国际环境、中国未来角色和中美关系走向的判断。

中国学界最关注的是，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否会做出比较大的修正，日趋为所谓“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主导，从而在双方分歧和敏感问题上频繁引发交锋，在“相互刺激的循环”中越陷越深?

最近在南海出现的紧张局势集中地反映了当前面临的风险。中方尤其关注美国公开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向，学界议论美国是否在误判，播撒“自我实现预言”的种子？美国媒体和智库很多关于南海的文章中观点缺乏事实基础，例如，有文章认为是中国在挑起矛盾、扩大领土和权益索求，在欺负小国，一些文章甚至分不清西沙和南沙。

南海问题的本源是围绕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权益之争，是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间历史遗留的局部争议问题。南沙群岛隶属于中国，曾被日本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由中国收复。1947年，中国在地图上以断续线的方式标出南海诸岛的所有权。

美国对此应是了解和认可的，这也反映在直到1971年美国出版的一些百科全书和地图中。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邻国侵占了40多个岛礁，而那个时期关于在南沙勘测到资源前景的信息进而构成了新的刺激因素。但中国从未放弃收回领土和保护主权的努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与东盟由对话走向合作、共同建立地区规范。当时，南沙问题是绕不开的坎儿，在历经磋商之后，中国承认在南沙存在争议，而周边国家也认识到中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才是真正的出路。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签署。《宣言》规定，各方应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维护地区稳定，这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争议的扩大化。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中方恪守《宣言》，但东盟未能够制止一些成员国极具挑衅性的活动，包括对占据的岛礁扩建、改造升级等。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南海问题愈来愈热，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权益不断被挑战，一些国家试图将争议扩大化。在中国国内，民众的焦灼情绪也在不断上升。

2012年4月发生的黄岩岛事件可以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黄岩岛是中国海南省渔民的传统渔场，2012年4月10日，当12艘中国渔船在黄岩岛潟湖内例行作业时，被突然出现的菲律宾军舰堵截、干扰。消息一经传出，中国国内群情激愤，而菲方则不断刺激事态升温，拒绝与中方对话，于是中方决定对黄岩岛进行实际管控。菲律宾以谈判未果为由单方面提出仲裁申请，中方决定不参与。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能否阻止南海领土的进一步丧失？能否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推动争议的和平解决和保持地区稳定？审时度势，中国决定对所控制南沙岛礁进行改扩建，包括修建灯塔、设立自动气

象站、海洋观测中心、配备海洋科研设施等。中方这样做有利于完善岛礁功能，也增强了维护主权权益和维护地区稳定的能力。

美国构成南沙争议复杂化的新维度：“亚太再平衡”战略无论是在舆论上还是在行动上都越来越具有针对中国的色彩。在中国，人们普遍注意到美国拉偏架，甚至直接走向前台插手干预，是争议复杂化的背后推手。而这个原本是局部和可控的岛礁及其附近水域之争，正被美方推向两个大国的地缘战略之争。

东盟国家已开始认识到争议扩大化的风险，正加紧与中国围绕缓和紧张和防止新的单边挑衅进行磋商。结合文莱等东盟国家的建议，中国外长王毅系统提出了“双轨”思路，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这得到中国和东盟不少国家的认可和支持。

中国目的何在？美方认为中国在谋取亚太霸权，但在中方看来，这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中国在南海的利益诉求多少年来一以贯之，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维护地区和平安宁。要理解中国人需要回溯历史。尽管当今中国逐渐强大，但历史的屈辱仍历历在目，这个国家是在首都被外国列强武力侵占之下，跌跌撞撞地踏入20世纪门槛的。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屡遭外敌入侵、强权欺凌。也正是基于此，中国人民和政府始终对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极为敏感，绝不会允许那样的事哪怕是在局部重演。这是外界看待和判断中国时必须了解和考虑的。

今天的中国人民正在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创辉煌。为此，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尤其是稳定的周边环境。南海是世界最重要的国际航道之一，也是中国和许多亚洲国家与世界联系的生命线，必须确保这里的航行自由和安全。在这方面，中国需要与各方一道承担起责任。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共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在世界舞台上初露头角的中国不应复制美国霸权的模式，美国也需要适应和与中国这样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的国家相处，两国也许不是盟友，但也不应是敌人。

最后容我问一句：现在的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相互接纳、相互尊重、重塑共识的准备？我想用问号来结束演讲，谨以此向善于解决难题的斯坦福大学致敬。

---

1. 2016年5月11日，傅莹应美国斯坦福大学邀请，在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发表演讲。演讲全文后收录于《中国人大》杂志2016年第11期。

G20峰会前看中美合作与分歧㊟

G20领导人峰会将于9月4日至5日在杭州举行。中国作为主办方，将同其他与会各方一道，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以及“加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和“影响世界经济的其他突出问题”等重点议题展开讨论，为国际合作提示方向。

引人注目的是，本次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2013年以来的第八次会晤，这将是奥巴马八年任期内对中国的最后一次访问，人们关注这会对中美关系发展和两国在全球层面的协调与合作带来什么样的总结和具有哪些指向意义。而杭州正是44年前《中美上海公报》最后谈判的地点。

三个层面协调值得关注

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变革之际，中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两国在三个层面上的协调值得关注。

首先，中美能否释放更加明确的信号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

G20机制的创建本身就与中美共同意愿和主动协调息息相关，两国的紧密合作为机制的健全发挥了关键作用。2008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在构建全球应对危机的机制化努力中贡献突出，使

由美欧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动荡稳定下来，并带动世界经济逐渐复苏。

2009年G20第二次峰会在伦敦举行时我是中国驻英国大使。记得在那次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努力探索恢复全球信贷和就业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达成了筹集1.1万亿美元的扶持计划。中国承诺以购买IMF债券的方式出资500亿美元。这个标志性事件将中国推上了参与稳定全球金融大盘的位置。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并不稳固，新兴国家也相继遭遇困难。各国对拉动增长的手段有不同认识，有的主张有空间的国家运用财政政策以提振全球需求，也有的强调财政纪律和供给侧改革，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也不一致。新形势呼唤新共识，人们期待世界主要经济体在杭州峰会上商定采取什么样的财政、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中美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两国的政策协调对全球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中美能否为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多边共识确定基调，引人注目。2016年6月北京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已认识到结构性改革对保持两国乃至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中方承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美方承诺在货币政策正常化过程中充分考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外溢性影响，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其次，中美能否共同释放引领全球治理改革的信号?

近年中美关系的一个亮点是，双方协调合作的触角加快向全球层面延展。例如，两国率先就减排方案达成共识，为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奠定基础。再比如，两国共建核安保示范中心，为加强全球核安全合作提供了范例。中美还在塞拉利昂等非洲国家开展防治传染病和帮助改善公共卫生体系的合作。在反恐、防扩散、打击海

盗、禁毒等方面，中美合作取得实际成果，在伊核、朝核、阿富汗、苏丹等涉及国际安全的热点问题上，双方也有着比较有效的协调。即便在分歧明显的网络安全领域，中美也确立了《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指导原则》，建立起热线。

但中国作用的上升在美国受到一些猜忌。2010年G20首尔峰会就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方案达成原则共识，但美国国会拖延到2015年底才最终通过，使之获得正式生效。2015年10月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

中国的GDP自2010年达到世界第二位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能力和意识上升，尤其是在自己擅长的经济领域。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代表着21世纪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方向，中方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制，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新型公共产品。美方对此不大适应，视之为“二战”后美元主导的金融体系遭遇的最大挑战，采取了怀疑和抵触的态度，甚至游说盟友抵制。但随着中方的努力展现积极效应，美国智库较快调整看法，批评政府短视，未来中美开展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双方商定，要确保国际经济体系具有包容性、韧性且不断得到完善，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要在IMF机制下加强合作，并继续完善IMF的份额和治理结构。双方的新共识富有积极意义：“新机构以及未来将成立的机构，要成为国际金融框架的重要贡献者，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专业性、透明度、高效率和有效性的原则以及现有环境和治理的高标准相一致，进行恰当的设计和运营，同时认识到上述标准是在持续演进和改进的。”可以预期，在G20杭州峰会上，国际金融架构建设，特别是金融部门的改革，仍将是领导人共同审议的重要课题，有望就如何构建更有韧性的国家金融架构、建立开放和稳健的金融体系、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发展普

惠金融形成重要成果。中美两国透露的信息显示，双方在工作层的磋商和协调是很密切的。

中美需要超越利益和观念上的分歧，培育合作习惯，双方越来越认识到，虽然两国合作解决不了所有全球问题，但没有中美合作，任何全球性问题都难以获得好的解决。

最后，中美能否共同释放管控战略分歧和安全矛盾的信号?

奥巴马执政八年间，中美关系有起有伏，虽然屡生摩擦，但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守住了协调合作的主流。两国在经济和人文领域的交往更加全面，两军之间规范性对话得到完善，确立了《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等规范。尤其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与中国的合作将成为奥巴马政府的重要外交遗产。

奥巴马政府也给中美关系留下一些负面资产，让人们印象最深的，当属“亚太再平衡”战略突出军事部署和强化同盟体系，给中美之间带来新的战略互疑。美国强化排他性的同盟体系建设，同时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决定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纵容日本推行旨在摆脱战后束缚的“军事正常化”措施。这些重大信号不能不影响到中国人对美国战略意图的判断，加深了许多人对美欲对华遏制围堵的怀疑，推动中方考虑必要的战略应对。

过去四年，中方以两国元首2013年“庄园会晤”、2014年“瀛台夜话”和2015年“白宫秋叙”为主要节点，围绕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美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希望排除干扰培育互利双赢的合作模式。尽管美方对中方倡议存在疑虑，但双方“不对抗、不冲突、合作共赢”的意愿是相近的。随着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举行，中美关系将进入新的政治周期，两国高层战略对话更显重要。人们预期，中美元首杭州会晤将再次把正方向，实现管控矛盾和促进合作的目的，为中美关系的再起航奠定好的基础。

中美需要管控南海分歧

中美元首杭州会晤前的两国关系，经历了因南海仲裁案掀起的风波。问题是，美国与中国在南海争的到底是什么？双方能否找到一条相容的路径？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置将决定未来南海局势的方向。

美国介入南海事务最常用的说辞是维护航行自由。诚然，南海有重要的国际通道，航行自由对各国都重要，最重视南海航行自由的莫过于中国这个国际贸易和航运大国。但实际上美方关心的主要是非民用舰只的“航行自由”，中美对这方面的规则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有不同解读，特别是对在别国专属经济区内可以从事什么样的军事活动分歧较大。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珍视国家主权和安全，认为《公约》要求外国军舰和飞机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不能危及沿海国的安全，他国舰机在己方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应受到一定的限制等。而美国作为海洋强国，历来主张弱化沿海国的主权，强调自己的军队可以在他国专属经济区进行与公海相同的各种军事活动，包括进行各种军事检测活动和军事演习。

南海商业航行自由不存在问题，而在规则方面的分歧也不难通过沟通予以解决。但美国对规则的关注只是表象，根本问题还在于美国将与中国在南海的博弈上升到亚太主导权之争的高度，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待与中国的分歧和摩擦。美国自重返亚洲、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似乎就预设了中国崛起后会扩张的前景，不断强化防范部署，南海早已成为美国实施亚太战略的抓手。在预设的地缘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中方的任何举动都容易被解读成削弱美国战略优势的行动；而美方的针对性言论和动作也必然引发中方反弹。在这种“安全困境”下，中美在南海对抗升级甚至引发冲突的风险增加，国际社会对中美陷入地缘竞争的担忧加大。这个趋势也是中方需要警惕和制约的。

南海周边国家越来越认识到，紧张局势不会让任何一方获益，相反只会阻碍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合作的步伐。中国与东盟国家都希望尽快翻过南海仲裁案这一页，让地区局势回归安宁。近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委派前总统拉莫斯为“特使”为中菲关系破冰，我应邀在香港与他会面，感觉菲律宾新政府是有与中方改善关系、重启合作意愿的。中菲同为亚洲国家，相信只要有诚意，就不难找到克服困难、恢复友好合作关系的路径。

南海局势中的美国因素增加了不确定性，能否恢复平静也取决于中美采取什么态势，尤其当中国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与美方所谓的“最高利益”发生碰撞时，两国能否准确判断形势、厘清利害关系，找到协调彼此立场的恰当角度。中美在处置彼此关系上都面临新课题，美国缺乏与“非敌非友”大国友善相处的习惯，而中国也没有以世界大国的身份与世界超级大国互动的历史体验。双方都在摸索，彼此的言行也在塑造对方的言行，宜保持谦逊，更新思维，不能简单套用旧的观念和模式。

南海浩瀚辽阔，任何国家都难以实现完全排他性的控制，任何一方试图打造绝对排他性势力范围，结果只会导致地缘对抗甚至兵戎相见，可行之道恐怕还是力量、利益和规则的共存共融。中国作为南海最大的沿岸国和对南沙岛礁拥有主权的国家，应有自己合理的海洋权益，美方应予尊重，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解决分歧的努力不应受到干扰。同时，中美应在保持安宁和维护国际航道畅通方面寻求对话和理解。至于中美在海洋规则上的分歧，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对话与沟通，而非政治施压，或用武力进行危险的试探。目前双方都已表达了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争议的态度，在海上的行动亦是克制和有底线的，可见在保持和平稳定的大局上中美愿望是接近的，关键是在对具体利益分歧的处置上，需要有效沟通和防止误判。

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思维

大约2400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写出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描述了雅典人的崛起及其在斯巴达人心中引发的恐慌是如何使得战争在新兴国家和守成国家之间无法避免。1980年，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在一次演讲中首次使用“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用来警告美苏之间冲突的风险。2012年，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再次对这个历史隐喻进行了量化研究，并运用到对中美结构性矛盾的论述中。他和他的团队研究了人类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互动的16个案例，发现多数走向了战争，只有四例（包括美苏冷战）得以用非战争的方式处置利益冲突。这项研究似乎想证明大国实力增减的宿命式结局。

2015年12月我在新加坡与艾利森一起出席一个对话会，我们有机会讨论。我认为，中美若成为敌人，整个世界的命运都会改变，他对此完全认同，但对中美可能因台湾或南海问题爆发战争的前景感到担忧，认为若此，那将是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教科书级案例。也是在那次对话会上，艾利森在演讲中说，当今时代对美国来说，最优先的地缘战略挑战不是暴力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也不是冒进的俄罗斯，而是中国快速崛起带来的影响，而对中美关系内在风险的低估增加了这一风险爆发的可能性。

我在发言中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我认为，经济全球化、国际制度的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以及核威慑对战争的抑制作用决定了，当今世界已非“一战”“二战”和冷战时的世界，更非古代雅典和斯巴达在爱琴海争夺海权时那个孤立的小世界，难以简单化地谈论“修昔底德陷阱”是否会复制。需要考虑的是，在现代文明水平上，应如何更加智慧地处置国际关系中那些能引发大国矛盾、激化大国竞争和诱发大国冲突的更加复杂的因素。

如今，关于大国安全困境的焦点集中在中美身上。无论理论体系和预测模式有何不同，中美两国未来如何塑造彼此关系被公认为将界定21世纪世界的基本方向。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讲时指出，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奥巴马总统其后在华盛顿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中回应说，他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大国尤其是美中之间更要尽量避免冲突，相信两国有能力管控好分歧。

中国是成长中的大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美国则宣称要“继续领导世界百年”，与中国的矛盾是多重的。例如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候选人都夸大和渲染中美经贸领域的利益冲突，但毕竟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在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矛盾应是可控的。美国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排斥使双方分歧难以化解，但中国已强大到外力难以撼动其政权和制度，双方可以避免挑战彼此。目前比较突出的是在战略安全层面上双方信任赤字扩大，相互误判的风险上升，双方需要认真对待和坦诚探讨，争取构建起防范机制，防止滑向对抗和冲突。

美国一个挥之不去的担忧是中国要与之争夺秩序主导权。问题是中美对世界秩序/国际秩序的认识不同，因此需要厘清具体分歧是什么、如何解扣。美国试图维护的是“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由美式价值观、军事同盟体系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机制共同支撑。但中国至少在两个方面不被包容：一是西方对中国政治制度是排斥和压制的；二是美国领导的集体防务安排并不涵盖中国安全利益，且与中国的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南辕北辙。中国认同的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中国是其创建者之一，也是其获益者和贡献者。中美秩序观并非完全对立，对世界总体和平与发展的需求和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的需求是双方的交叠面。长远看，如果中美要防止落入大国为争夺秩序主导权而直接对撞的历史覆

辙，就需要在共识基础上最终搭建一个能见容于各方和全面包容各方利益的共同秩序屋顶。

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世界利益的多元化和格局调整，对中美引领变革提出要求。两国可以从共同利益最多的经济、金融等领域入手，通过推动全球治理等，带动国际协调与合作跟上全球化的步伐。

冷战后，以资本、技术和市场要素自由流动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各个角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曾主导和推动了全球化的快速扩展，新兴国家不仅从中获益，而且以自身的增长反哺了全球经济成长。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人类财富的增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从中获益。但全球化也日益暴露出弊端，例如导致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制度不健全、金融监管缺失等，广受诟病，助长了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

可以认为这一轮全球化是现代意义上的“1.0版”，处于初级阶段和缺乏管理。一段时间以来，逆全球化和逆区域化的趋势有较多表现，例如东亚一体化进程受到国家间矛盾的困扰，势头减缓；美国主导的TPP因缺乏包容性引发质疑；英国脱欧也给欧洲一体化提出挑战。从趋势上看，世界不可能从全球化倒退，但是其弊端也必须摒弃，全球化向“2.0版”的升级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尤其需要中美共同努力、砥砺引领，追求共赢而不是单赢，这样方能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努力。

对于中国而言，让世界充分理解自己的意图更加紧迫。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相比，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是一种“压缩型”的成长，但思维的进步和话语的更新难以简化或者压缩。我们需要加快更新理念和思维，构建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更有效的行为方式和话语系统，使外界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政策和以和平合作、共享共赢为目标的外交主张。

1. 此文发表于《参考消息》2016年8月31日第11版。

对话基辛格（一）：美国因高估中国而对华焦虑



美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兄弟伙伴

基辛格：你在美国访问，见了许多人，有什么感受?

傅莹：我的印象如果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焦虑”。21世纪的世界不同于美国熟悉的20世纪，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美国自身面临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应尽快适应变化了的世界，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必要时做些妥协。

基辛格：当前美国确实处于不寻常的时期。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美国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外交政策也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因此，这个新的世纪对各方都是挑战，不仅对于美国，对中国也是挑战，难道不是吗?

傅莹：中美面临的挑战还不太一样。美国的难题也许是要学习如何与平等伙伴相处。我观察，在美国的传统世界里面，国家关系只有两种，要么是俯首称臣、寻求帮助和支持的盟友，要么是需要对抗和打倒的敌人。美国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兄弟般的伙伴吧？美国有兄弟吗?

基辛格：（笑）没有吧，我还真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问题。你应该把这样的观点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看看和思考。

傅莹：我观察，在美国人的政治文化里面，没有与伙伴进行真正平等合作这一说，因此很不习惯面对像中国这样既不是盟友又不是敌人，只是希望成为伙伴、一个平等兄弟的国家。而根据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大国小国都应该兄弟般相处。

说到挑战，中国的困难在于，突然被推到一个更高的平台上，被各方赋予更高的期待，我们许多人对此还没有完全适应，就像上了舞台却背对观众的人，常常还以为自己仍然是看客。中国正在努力学会成为世界公民，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这需要时间。其实大部分中国人是处于刚刚实现温饱的水平，还有许多人没有完全脱离贫困。您不能想象，仅仅是20年前中国还是多么贫穷，我还记得那些年自己家里每个月发工资之前五六天的窘迫。现在的年青人虽然条件好于过去，但是在就业的起步阶段也是很艰辛的。所以，要普通人广泛地建立起国际意识、培养起分享和分担的能力，这个需要时间。当然中国已经开始有国际利益的观念，而且是非排他性的。

基辛格：美国的普通老百姓并不了解中国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也不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只是觉得中国老百姓越来越有钱，中国也变得更加富裕和强大，会越来越像美国。中国的年轻人和下一代人会认为现在拥有的一切理所当然，对国家和政府的期待也将越来越高。中日岛屿之争以及中国在南海与相关国家的领土争端近来升温，多数美国人认为，原因在于中国想要的越来越多。我个人认为中国没有取代美国的野心，只是希望获得应有的尊重，而且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裕和强大，这种获得尊重的愿望会更加强烈。

中美两国都有自身特殊性。我们这里有着“美国特例论”，认为自己独一无二，实力超群，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中国则有文化优越论，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很长时期以来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中华文化优于周边其他国家，因此要求别国俯首称臣。所以，中国未来到底会如何？许多人是持保留看法的。

大国之间战争的风险仍然存在

傅莹：古代中国人有中央之国的观念，以为自己就是天下之中心，应该说这主要是受地理知识所限，而不是基于强权的理念。中国人有文化自豪感，中华文化确实博大精深，但是谈不上想要统治整个世界，事实上中国人当时对外界知之甚少，也没有很大的兴趣，中国的国门是被帝国主义者强行打开的。中国没有扩张主义的文化传统。现在中国人关注的问题也还是相当基础性的，远没有达到美国的水平，还面临许多要解决的问题，不可能也没有意愿取代美国的地位。中国人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地球也承受不了这么多中国人都要像美国人那样住大房子、开大车。中国领导人都经受过基层的历练，很清楚国家和人民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正致力于解决面临的各种难题。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每一代人都有责任争取把一个更好、更安全的国家交给下一代。中国国内问题很多也很严峻，但总体上是可预测和有方案的，而在国际层面上，新问题也不断出现，这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来说是更大的挑战。当前中美是否共同面临一个重要抉择，是要将21世纪引向和平还是冲突？我们有没有能力保持和平？从有了国际关系历史以来，还没有哪个世纪摆脱过战争的困扰。

基辛格：有过，在1815年到1915年的100年间，世界没有发生大的战争，主要是因为，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主要国家领导人都希望和平相处，他们通过定期会晤、谈判等方式解决了战争风险，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你认为中美之间会爆发战争吗?

傅莹：理论上讲，大国之间再次发生世界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比较小了，各国经济高度依赖，必须考虑经济利益和代价。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家无须诉诸战争手段就可以获得资源、市场、资本和技术，已经不再有经济需求刺激下的战争冲动。此外，当今世界科技高度发达，大国之间战争的后果太不可测，甚至不需要热战，通过网络

战争就可以相互摧毁、让整个世界停摆。我觉得，现在的危险是仍然有人认为战争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选项。

基辛格：历史上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有经济上的需求。现在，虽然大国之间相互作战的可能性不大，但战争的风险仍然存在。回顾“一战”发生前10年的欧洲，虽然没有发生战争，但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大大小小的危机，人们对危机习以为常了，以至于往往忽略，不去认真处理。现在如果对危机处理不及时或者不恰当，也有可能失控，引发战争。当前引发战争的风险是，国家在发出威胁之后不知道如何下台阶。根据我的经验，有的国家正在美中之间玩游戏，美中双方都需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免被利用了。

中美之间很多问题源于认知偏差

傅莹：过去就有国家善于游走于大国之间，但是我觉得矛盾本身是可控的。倒是日本的安倍首相很值得警惕，他拿钓鱼岛争议做了一个大局，夸大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借此调整安全战略甚至修改宪法。美国如果看不清楚，因为是盟友而被卷进去，会对形势走向和各方判断有很大干扰，美国最近一些高层讲话比较情绪化、不慎重。我在美国这些天许多人都在质问海上问题，我做了解释，发现他们都没有认真去了解事实就下了结论。

当前中美关系确实处于微妙时期，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双方对彼此的认知存在很大差距。美国过高估计了中国，认为中国想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因而对中国焦虑。而中国人并不这么想，中国民众看到的是，美国在很多问题上都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当中国面临周边问题的挑战时，美国不分青红皂白总是指责中国，这导致民众对美国的反感情绪上升。特别是，在美国一些选举中，政客需要通过批判中

国而获得选民支持，这令中国人费解甚至不满。双方需要加强与对方民众的直接沟通。

基辛格：当前中美双方最重要的是要避免明显的冲突。在周边问题上，尽管中方很多时候是因为受到挑衅而不得不做出反应，但仍然要避免给外界造成威胁邻国的感觉。现在，中美两国面临的共同任务是，能否在一些问题上携手合作。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双方需要认真考虑能在一起做些什么。正如“二战”后的美欧之间通过真正的合作而拉紧了跨大西洋纽带，中美之间也可以通过合作来加强联系，例如可以在东北亚地区开展一些新的项目合作。当然这种合作也同样要避免使中国的邻国感到不安。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我认为双方可以做很多。

当今，人们都是从电视屏幕和网络上获取信息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当年从报纸和书本上获取信息的人们很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设法划清问题的界限和降低争议的热度。中美之间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能因这些问题而受到干扰。

此外，中美需要加强沟通，不仅是讨论眼前这些问题，还要就两国的战略考虑进行交流，清楚彼此的战略方向有利于双方展开进一步的合作。例如，美方并不需要用南海问题来威胁中国，现代的战略家不会考虑用距离中国几百英里的小岛来遏制中国。

傅莹：中美之间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源于认知上的偏差。因此，双方确实需要更好地沟通，不仅是在战略层面，还包括与对方民众的直接沟通，这将有助于消除误会，增加彼此理解，逐步建立信任，避免战略误判。我听到不少关于中美开展一些实际的合作来落实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我觉得，要想推动起有时代意义的合作，需要首先培养合作意识和精神。当年美欧的跨大西洋合作本质上是美国援助和扶持欧洲，而且有共同的对立面。21世纪的中美跨太平洋合作应该是平等

和双方都有需求的合作，不仅要双方都主动推进，还需要双方都能够妥协，能够照顾对方。我们可以找找共同利益的基线，尝试合作起来，关键是不能一方总是要求另一方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有进有退，真正的平等合作。

---

1. 2014年6月19日，傅莹在访美期间走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基辛格位于纽约的办公室与他进行了长达1个半小时的对话。对话节选由《赫芬顿邮报》的网络平台《世界邮报》刊登，其中译文刊登于《环球时报》2014年11月21日第14版。

对话基辛格（二）：中国的选择影响全球新秩序



美国民众普遍认为美国模式是唯一正确的

傅莹：您的新书《世界秩序》出版以来，受到广泛关注。想请教的是，您认为未来的世界秩序会是怎样的？将如何演变？美国相对实力会继续下降，用旧的方法应对国际事务难以为继，要想保持领导地位，美国将如何调整，又将如何影响秩序的变化？美国对中国这样一些后来者将采取什么姿态？主张开放性，还是排他性的新秩序？

基辛格：上次我们见面交谈，你从中国的角度谈问题对我很有启发，我想先听你说说，这个问题怎么看？

傅莹：未来世界秩序的演变会与中美有很大关联，两国如能开展广泛合作，将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体现和实践。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未来的世界秩序意味着什么影响？很希望倾听您的思考。

基辛格：我知道，美国外交界有很多人对我书中的观点并不认同，绝大部分美国民众坚持认为美国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就外交政策而言，他们普遍认为美国模式是唯一正确的。但我发现，现在我的观点在决策层受到越来越多认可，新书出版以来反响好于预期。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能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大都主张，当今国际体系应在较长时间里继续发挥作用。

坦率地说，对美中关系进行根本性的哲学评估只能留待下一任美国政府了，将来不管是共和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都要面对这个问

题，现政府仍会努力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在未来两年我们无法解决哲学性问题，但可以为此奠定基础。需要做两方面努力，一是要避免对抗，二是可以选择一两个大的题目开展合作。从美欧关系的经验看，战后美国在对欧关系上提出一系列重大倡议，包括建立多层次对话机制、实施马歇尔计划等，逐步形成了美欧紧密关系的纽带。如果能与中国也这样做就好了。

傅莹：我应邀参加过一些美欧论坛，观察到双方有很好的对话和商量习惯，建立起牢固的信任纽带，尤其有重大事件或出现分歧时，总能及时沟通，当然这有特定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中美之间情况不同，但也可搭建更多有效沟通的平台，扩大可视的合作，尤其在解决双边和世界重大难题上，中美应培养平心静气商议解决办法的习惯。

政治安全领域，美国仍在分“我们”和“他们”

傅莹：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用您的话讲，做哲学性展望，我的观察是，现存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在全球化过程中已经敞开，容纳了更多的国家，包括中国，这些新兴国家不仅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在参与其改革。但是在政治安全领域，对美国来说，仍然分割为“我们”和“他们”，“我们”是指与美国有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他们”是指同盟外的国家。这样划线表面上看对经济和贸易往来也许直接影响不大，但在安全方面，会让非同盟国家关注和警觉。

如果美国想继续领导世界，要问的是：“亚太再平衡”战略反复强调美日军事同盟是亚太安全的基石，而日本明确把中国作为威胁来源，美国是否考虑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外国家的感受？美国对未来做何打算，将采取更开放的态度，还是坚持对同盟体系外国家采取排斥立场？中国民众对美日同盟的看法越来越负面，这是否会把中国推向另外抱团的方向？这是美国必须面对的问题。

基辛格：从操作层面看，“再平衡”战略并没有给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部署带来实质性变化，也许增加一些军力，也是从中东撤军的结果。我在《世界秩序》中写到这样的观点，中国的战略是，将美国军力推向尽可能远离中国边界的地方，并且在开发这样的军事能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任何理性的政府都会这么做。

美中签署《上海公报》以来，美方一直明确表达了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亚洲和世界寻求霸权的立场。现在的问题是：两国如何在实现自己目标的同时，不给对方带来压力？也就是说，中国如何在满足合理安全需求的同时，不给外界要将美国赶出南海的印象？美国如何在不过度接近中国边界的情况下，满足自身安全需求？这在我看来是战略性难题，但我不认为美国试图将中国逼入墙角，剥夺中国行动自由。

冷战期间，美苏达成两项制度性安排，一是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热线电话，二是相互通报海上重大行动，双方遵循一定规则，避免迎头相撞。尽管用到热线情况不多，一旦用上就是真格的。如果中美能建立类似安排，出现危机时就管用了。

傅莹：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独立于美国的军队之一，也是长期受美国拒绝和排斥的结果。从美国对威胁评估的角度，您觉得中国军力在世界上排第几？美国不会侵略中国本土，中国也不会去攻占美国，关注中国威胁的依据是什么？

基辛格：在战略圈的讨论中，总是有对中国威胁的关注。我完全反对美中军事冲突，这对两国都将是灾难性的，我从未听到任何哪怕是观点极端的人，说过美国应当入侵中国。一般观点是，如果中国对邻国施加军事压力，美国必须介入，比如在南海。但从中国历史看，我不认为军事入侵是中国对待他国的方式。美国关于中国的辩论中，没人主张击败中国，也没有任何学派的观点认为美国应打击中国或在军事上削弱中国。

傅莹：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这是宪法规定的。正因如此，美国近期采取的行动和腔调使得其威胁意味更加浓厚。美国战略界人士对中国负面看法的主要原因，是认为中国在海上对邻国示强，中国人感受到的美国威胁也主要来自海上方向。尤其让很多中国人不满的是，近年每当邻国与中国出现纠纷，不管发生了什么，无论是非曲直，美国总是偏袒和支持向中国挑衅的一方。

基辛格：我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听到中方官员谈南海问题时说，如果这代人无法解决，就留给下一代人，这应该是官方立场。在此基础上，可以探讨如何就避免采取使局势恶化的行动和维持现状达成共识，当然还要界定现状是什么。其次，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把航行自由看作是中国给予美国的特殊待遇，中方如果能明确讲航行自由是一项国际权利，这两点将有助于拔掉南海问题这根刺儿，减少对美中关系的负面影响。

傅莹：公海的航行自由无疑是一个国际性原则。西太平洋航线的商业航行自由从未受到影响，近年航运价格一直低迷也说明，并不存在安全因素影响。中国是贸易大国，维护商业航道自由畅通对我们至关重要。据我观察，美国人频繁拿航行自由说事，指的是海军的航行自由吧?

基辛格：海军的行动自由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规定，这些适用于南海。

傅莹：这两方面分开来讲比较好，混到一起对外界是误导。如果两国海军能就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和海上的一些行为规范达成某种安排的话，会解决不少问题。

美方不能对中国“桌面上握手，桌底下踹脚”

基辛格：从哲学角度看，我们都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比如说中东问题，美国报纸都会说应该在美国领导下解决，而不会认为可以依据某些原则来解决。这是美国的惯性思维，必须调整，但需要时间。

傅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是否会逐步开放或者调整？

基辛格：不会，美国人习惯了，对他们来说，世界就该是这样组织的。外国人好像总以为，在美国的什么地方有个大方案，由政府来执行，实际上从来不是这样，美国政府的运作方式是，遇到问题就处理问题。中国人很不一样，你们的方式是概念化的，善于讲动机、讲思维方式，而我们这儿不考虑这些。

傅莹：中国需要积累国际经验，我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解释自己的做法方面可以进一步改善，需要更及时地向世界做出说明，减少误解、避免误读，因为那会留下被人利用的空间。

基辛格：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竞争很快就要开始了，共和党候选人很有可能对奥巴马与中方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提出批评。如果哪个候选人批评他对中国让步太多，你们不必太在意，竞选期间的言论不代表共同立场。

傅莹：我认为中方重视与美方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探讨并合作，但美方不能在“桌子上面跟中国握手，桌子下面对中国踹脚”。当今时代，外交政策的制定不仅是领导人和精英层的事，也有民众和媒体的参与，决策层不能不考虑他们的观点和意见。

基辛格：这是现代外交的一大难题，但是我这样讲是希望人们能理解美国内部有自己的困难。

傅莹：您怎么看中日关系？

基辛格：美国希望避免中日发生战争，虽然美日有同盟关系，但美不会鼓励日本采取任何导致战争的军事行动或者政策，据我所知，美国的政策里没有任何利用日本反对中国的成分，我们应该鼓励中国与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主张构建一个亚洲与太平洋共同体，各国都参与其中，美中进行协调合作。

傅莹：您设想的共同体与军事同盟是什么关系？中国领导人也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您的想法是否与此有交集？

基辛格：我讲的亚太共同体的实质是美中之间的谅解，也包含所有大国，这样就不必担心要面对类似于“一战”前的那种冲突局面。那个时代，国家按照势力均衡的原则选边站队。

我最担心、思考最多的，是当今世界秩序所发生的变化。19世纪以来世界秩序的中心在欧美，21世纪世界秩序的中心在亚太。亚洲最大的变量是中国在未来20年的持续增长，中国的选择将影响和改变世界。美国必须考虑还有多少时间、多少空间可以维持现存秩序，并且需要构思未来的世界秩序。

---

1. 2014年10月13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纽约布鲁克俱乐部邀请赴美出席亚洲协会对话会的傅莹代表团一行午餐，吴建民、黄仁伟、吕本富和戴庆利参加。双方围绕世界秩序和中美关系进行了对话。对话节选由《赫芬顿邮报》的网络平台《世界邮报》刊登，其中译文发表于《环球时报》2015年4月16日第3584期第14版。

对话基辛格（三）：世界秩序和中美关系注

傅莹：我读完了《世界秩序》一书。

基辛格：那下次我要考考你这本书的内容。

傅莹：我明天在芝加哥大学演讲，就准备从这本书讲起。主题是围绕秩序问题的争论，您书中提到，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同期，有若干不同的秩序并存，我就从这里展开，比较和介绍中国在1648、1919和1941年等时间段的情况，来说明中国的历史和在秩序问题上的视角。

基辛格：1648年欧洲发生了重大事件。

傅莹：1648年，中国清朝的新皇帝登基不久，大概三四年吧。

基辛格：我打赌那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超过了整个欧洲。人口也有很大规模了？

傅莹：人口到了5000万左右，增长比较快，一直相当繁华。但到了1840年，中国的宁静被鸦片战争打破了。

基辛格：确实如此，那是一个悲剧。

傅莹：我在演讲最后部分引用了您的话：基辛格《世界秩序》一书是以一种很有深意的设问方式结束的：我们走向何方？（Where do we go from here？）这个问题也适用于中美两国：接下来我们将怎么走？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我会说，对于未来的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中国国内也有讨论，我们的认识是：首先，在当今世界，彼此孤立的

秩序同时存在已经不太可能了；其次，通过战争实现“权力转移”也不大可能了；第三，世界上有许多全球化带来的新型挑战。结论是，也许应该构建新的全球秩序。

基辛格：你的看法十分深刻，我这么说是认真的，不是恭维，这也是我应该提出的问题，因为如你所说，我们有不同的秩序。不过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中有不同的秩序，就像主权国家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发挥作用一样；二是不会有秩序，而会有某种形式的混乱。

我还应该说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建立一个共同的秩序。这个目标要实现起来困难很大。我想，即便你认为理应是第三种可能性，但通往这个秩序的道路仍然需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类似于大西洋体系，但组成部分是不同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最初由宗教国家组成，以欧洲为基础，仅限于欧洲。新的体系将建立在单位体之上，例如中国，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它自身就是一个文明，再加上其他文明，例如伊斯兰文明，还有其他单位体。阻碍是：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伊斯兰秩序，伊斯兰世界仍在冲突当中，很难一下子进入到国际秩序中来。

傅莹：我对您说的太平洋共同体概念很感兴趣。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世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无论是对中国、美国还是对俄罗斯而言，现在世界的形势很不同了，面临许多不同的挑战，一些威胁超越了主权国家概念的范畴，像气候变化、“伊斯兰国”组织（ISIS），还有埃博拉病毒，等等。面对新问题、新课题，需要有新的超越国家的框架和共同认识，来开展合作加以应对。以埃博拉为例，各国开始时是各自为战的，中美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好的沟通，中国采取了非常积极主动的行动。下次再遇到此类问题，各国应有共同采取行动的意识。那么，您讲的秩序，是希望实现控制和领导其他国家的秩序，还是集体应对全球挑战的秩序？在过去，世界秩序是指如何在强

国之间建立规则，以相互约束，不发生战争，但现在光阻止战争已经不够了。

基辛格：这一点很深刻。中国现在怎么处理南海问题和朝核问题?

傅莹：这两个问题不一样。在南海问题上，目前中美之间出现的分歧根本上反映了我们之间存在不信任。中方担心美方在背后推动有关国家做出挑衅行为，美方则认为中国希望独家控制南海甚至西太平洋。如果美方对情况了解不够，会将认识建立在不完整的信息基础上，并据此得出结论。我们也需要对邻居了解得更加充分。应该控制住局势，防止恶化。我看到美国不少报道，感觉美方对南海问题是过度解读了。

基辛格：中国在南海争议地区修机场、建跑道，通过这种方式如何对世界和平、防止战争做出贡献?

傅莹：在南海进行搜救和处理突发情况时，有了跑道会方便许多，增强能力。

基辛格：当然有自身的需要，但不应在有争议地区修建。

傅莹：我们是在自己控制的礁盘上施工，不是到属于我们但是处于别国实际控制下的岛礁上搞建设。事实上，在过去，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都在争议岛礁上进行了施工，在南沙已经建成的跑道有不少，未曾见美国有什么关切，中国几乎是最后一个这么做的国家。中国人长期以来在南海岛礁值守的条件非常艰苦，几个人住在小棚屋里，要耐受高温和大浪，一次就驻守6个月甚至更久，中方需要改善条件。

我理解美方的想法，就是希望中方能与美方谈，告诉美方我们的计划，作为大国，应该相互知会，应该有更多的沟通。

基辛格：我个人认为，应该暂停目前的争议。各方应同意，试着在今后10到20年内，或者不管多长时间，保持现有局面不变，任何一方都不对对方采取挑衅行动。第二，达成一个自由航行协议，确认这是一项基本原则。第三，表示任何争端都是可以调解的。但目前，美国人认为你们试图接管整个地区，九段线内的所有海域，你们把九段线当作陆地边界一样对待，让人无法理解，美国人现在就是这么看的。而中方认为，美国试图把南海变成反华基地，以此，美国可以更加接近中国的重大利益。

那么，结果应该是什么呢？美国不应把南海作为美国的战略地区对待，中国不应把整个南海作为中国的地理领地对待。请记住，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但我认为当前的形势是危险的，因为我发现，跟我谈话的所有美国政治家都认为，中国想接管整个南海，而这将是中国走向帝国的开始。诚然，中国的历史理应受到严肃的尊重，但我不认为有可能把这一条适用于南海的所有地区和所有岛屿。我尚未对中国政府官员提及这一观点，或迟或早，我会就此问题发表公开讲话，但在此之前我希望同更多的中国人谈一谈。我认为，中美应该就南海达成共识，就像在台湾问题上达成共识一样。《中美上海公报》的重要性在于，我们避免了中美就台湾问题出现任何公开冲突。

傅莹：南海问题比较复杂。很多美国官员只看到眼前的局部情况，而不是从了解历史的全部内容来判断问题。如果美方真的关心，想要与中方进行认真的讨论，应该至少回到美方的档案中去，了解事情的缘由。现在双方在南海问题上没有共同的认知，无法进行严肃的讨论。

在中方研究界看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转变，试图捞取好处，甚至给中国制造麻烦。20世纪40年代，日本战败交出所有

占领的中国领土，西沙、南沙岛礁是交还中国的，美方应该了解也承认，南海岛礁属于中国。在50年代之后，美方也许更愿意视之属于台湾管辖。直到六七十年代，才有一些邻国开始占领一些岛礁，美方对这些情况也并非不掌握吧。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与东盟国家建立全面关系，围绕南沙问题进行过多轮的内部协商和谈判，中国做出了“承认存在争议”的重大让步，同时东盟国家也认识到和认同中国关于搁置争议、维护和平发展大局的主张，最终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多年来，中国同东盟国家一直避免在大会上公开争论分歧，重点推动全面合作，同时保持了私下讨论和协调涉及南海话题的方式，因为任何公开的争论都会引发公众反应。所以，在2010年之前，并不是世界上一个较为重大的问题。

应该说，是2010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之后，南海才成为一个所谓的重要问题广泛进入人们的视野，不是吗？为什么在此之前能够很好地控制问题，而之后成为热点问题？中国研究界的观察是，南海问题被变成了一个工具。

基辛格：我想这是因为在我的时代，中国没有对南海进行主张，没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

傅莹：中国从未放弃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主张，80年代为了阻止越南进一步扩占，中国还动用了海军，打过海战。只不过美国当时没有太在意吧？美国关心南海是否在重返亚太之后呢？

基辛格：不不不，这么说不对。70年代早期，我开始从事对华工作时就注意到南海，之后我继续密切关注。无人注意中国对南海提出主张，也许因为中国当时的思维是一个状态，而之后情况又在慢慢变化。我不认为南海问题与美国重返亚太有关，美国重返亚太的解释，是从阿富汗撤军，改变了美军在亚洲的力量分布。但美国在亚洲的军

力并未增加，只是比重上升了，而这则是因为美军从中东撤出了军事力量。美国没有把中国作为主要目标。对于南海问题，我对此没有解决办法，我认为应消除南海作为一个摩擦点的存在，理想的状况是，任何人不对南海提出新的主张。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应该保持中立立场，双方应同意在界定地区的航行自由，而不是把南海划定为国家边界，任何一方都不应采用任何行动，或者改变既有事实。我认为，美国应该持中立立场。你我都应同意，南海地区应有航行自由，而不是在所有岛屿都划出12海里领水，否则面积就太大了。当然中国会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

傅莹：中国90%的石油进口、80%的对外贸易都要经过西太平洋航线运输，这是中国的生命线，当然要确保航行自由，对日本等国也是如此。南海是开放的，航行自由没有问题。

基辛格：如果我们可以同意这是公海，而不是中国赐予的权利，那么公海上各方都应有航行自由，不是指中国允许的航行自由，而是指国际法规定的航行自由。如果可以这么定义的话，问题就可以解决了，美国要的是航行自由，不受别国干涉的权利，我们不想要，也不应有干涉中国航行自由的权利。

傅莹：习近平主席将对美进行访问。您认为哪些事情可能会使访问受到影响?

基辛格：我的印象是，美方对中国有巨大的善意。根据我对中国的经验，中国对美国也有一定的善意。

傅莹：我的印象是，美国目前各界释放的是不同的信号，这是暂时的情况，还是需要据此做出政策上的判断了？这个状况会持续多长时间?

基辛格：你们的问题在于，中国刚开始加入大国对话，试图思考清楚自己的国际地位是什么，中国的国力在上升，需要同时考虑其他国家了，中国过去不用考虑这些问题，不需要考虑别的国家怎么想。

从美国来讲，本届政府任期只有18个月了，在这个阶段，他们的思维也只有18个月，这是人性使然。美国对中国不缺少善意。但是美国总统候选人很多，他们要发表竞选演说。如果同共和党候选人，或者所有的候选人谈中国时，他们都会谈到北京的影响力问题，也会说些话。例如，我最近收到一个候选人竞选演说稿，其中体现的对华姿态就是非和解性的。尽管美方候选人的对华言论很难保证会怎么样，但不是恶意的，这是由初选的性质决定的。我并不喜欢这个情况，但你们可以确信，在美国有一大批人多年从事中国研究的，有几百人之多，他们将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中美关系。

美国人需要了解中国战略思考的方式。中国的历史有4000年，战略思考有2000年，可以说是有2000年的战略史，凡事喜欢进行长线思维。美国有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大洋作为天然屏障，不必这么做。对于中美双方所谈的战略，大部分美国人并不理解，尽管我做战略演讲时也有人认同我的观点。我正在考虑成立一家战略研究所。但你们从美国政府拿不到战略保证，你们可以拿到的是解决看得见问题的方案。习近平主席和其他几位领导人在会见我时，雄辩地说明了中国梦和到2020年、2040年世界将会成为什么样子。我认为应该让人们听到这些，即便他们不一定能理解或者实行。

傅莹：眼下，沈大伟的文章、兰普顿的演讲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报告都释放了消极的信号，引发对中美关系的关注。您对此感到担忧吗？兰普顿认为中美关系走到一个转折点。

基辛格：我不了解沈大伟，我知道兰普顿一直关注中国。在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认为中国也许正在走向四分五裂，中国领导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反对改革的势力也在

集结，可能会导致中国崩溃。第二种认为，中国除了被军事占领过，从未崩溃，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时期，出现过暂时的组织涣散，但是人民有着共同身份认同的中国从未在任何时间点上发生崩溃。因此，我认为中国将会有一段困难的时间，我更多担心的倒不是这些困难，而是民族主义因素的上升，会迫使中国领导人做一些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做的事情。我的外交方式是看一个国家对外的公开宣示，而不是去关注其内部情况。我想中国会度过这个阶段，中国将更为强大，美国应集中力量应对中国的成长，而不是崩溃。中国崩溃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不应做任何鼓励中国崩溃的事。

傅莹：这一点很重要。上次我们谈到了两国关系的公众角度。在中国，民众也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可以和美国合作，一种认为美国要搞垮中国。公众会从他们的角度看待和评论中美关系，而外交政策则是复杂的。外交现在任务更重了，对外宣讲也是外交的重要任务。您到中国来，就表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连贯性，应该对中国民众说更多的话。我和您的两次对话在中国发表以后，也促使人们思考，您的深思熟虑和直言不讳非常珍贵。在美国，中国人的声音太少了，直接说明中国的声音太少了，这方面只有官方的解释显然不够，应该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否则美方许多人会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做出结论。在中国，也有人对美国的言论和做法越来越反感。

基辛格：我不认为美国有一个长期的战略。大部分美国政界人士同我一样，都认为和中国发展战略合作关系是可取的，尽管有人认为我为中国说话太多。现在，美国在南海、丝绸之路等问题上有不同的声音。我一直说，中国有自己的做法，任何中国政府都会试图把美国的势力推得远远的，因为这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但这本身并不是坏的意图。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则是坏的意图。

傅莹：中国有哪些行为在您看来是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

基辛格：与其说争夺全球霸权，不如说中国是想把美国挤出亚洲，比如中国人讲，“亚洲是亚洲人民的亚洲”。

傅莹：我理解，这句话指的是亚洲人应当采用亚洲方式，就是采取谈的方式，而不是动辄诉诸武力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问题。关于中美关系，中国领导人提出，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基辛格：但这句话也可以解释为中国应该待在亚洲里面，而美国应该待在亚洲外面。我想我比较清晰地了解中国领导人这么说的含义和思考，我与中国领导人会面多次，我想他们对我是坦诚的。不过，坦率地说，我并不知道中国的意图所在，我不知道下一个10年会发生什么让我们担忧的事。在我看来，中美在解决具体问题上做得尚可，双方对长期关系都会说些合情合理的话，但在合作制定类似于中美关系5年规划等方面，则是一个最大的不足。在中国，具有同美国合作经验的人不多。

傅莹：中国有人认为美国在桌子下面纵容日本。日本试图在军事上更加自主和自由，安倍在历史问题上不反省也不道歉，在中国民间对此有很深的关切和担忧，认为美国在给日本松绑以实现自身目的。

基辛格：一国看待另一国时，容易把自己的思路往对方身上套，这是一个问题。中国人看美国的表态，会以为这反映了一个10年的长期计划，但通常不是这样，通常美国只是对某种情况做出回应，或者做出应急处置。

我想如果你我真正了解事情在往什么方向发展的话，我们都会拒绝受到“美国在挑拨别国”的这种想法的吸引。

傅莹：我认为中美需要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些问题。

基辛格：如果你看早前的档案，在周恩来和我们那个时代，对话有时候听起来像是讲时事课的大学教授在讨论国际政治的实质。中方经常这么做，而尼克松总统又是一个非常不一般的总统，他厌恶谈具体事务，总是说让我们看看应该朝着哪个方向走。我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时，我们提到的唯一具体问题是台湾，其他都是哲学问题，包括国际关系的本质。毛主席曾讲，天下大乱，形势大好。意思是什么？是说形势变化了，但我们可以试图达成某种协议。我认为同下一届美国政府做这件事情比同本届政府要容易，但我认为现在应该从本届政府试着做起，中美努力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从最容易的做起。我认为应该在本届政府开始去做。

傅莹：也就是说，中美双方就一系列问题对表，防止未来发生误解。有分歧也不要紧，可以预防问题的出现。讨论在具体领域开展合作，避免出现对立的关系。

基辛格：这是从未有过的形势。彼此作为对手如何与对方合作呢？我们需要对彼此加以定义。在1914年8月1日，如果那时的人们能够预见到1948年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就不会做那样的事情了。如果中美陷入冲突，需要知道中国如何定义“取胜”，取胜后能拿到什么。

傅莹：今天谈得时间不短了。咱们曾经约定，为您组织一个中国年轻学者参加的圆桌会，但每次您在北京时日程都太紧。中国正在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出现不少新一代的智库学者，非常勤奋，写东西很快，等到我们更好地组织起来，希望他们能到美国来，同您举行圆桌讨论。

基辛格：那太好了，如果你能把蒙古族的美食也带来就更好了。我对你表示感谢。

---

1. 2015年5月18日傅莹与基辛格在其位于纽约的办公室就世界秩序和中美关系进行对话。

对话基辛格（四）：关于世界秩序的讨论[注]

傅莹：基辛格博士，您是近代以来，西方世界里最早深入研究中国、以客观眼光看待中国的人。可以说您也是最能带着历史感看中国的人。我非常高兴能有今天这个机会主持与您的对话。我先来提第一个问题，然后请观众提问。

在2014年我们在纽约的一次谈话中，您曾告诉我，您现在思考最多的是，美国还有多少时间和空间来维持现存秩序，并构思未来的新秩序。

而您在书中也写道："重建国际体系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家才能的终极挑战。"

所以，您是否可以告诉我们，在您看来，当今世界的政治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和条件，做哪些事情，才能成功应对他们面临的"终极挑战"?

基辛格：首先，面对变化和挑战，每个国家都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我曾说过，历史好比是国家的特性，每个国家都倾向于将客观事实转化为主观体验。历史上的美国曾经孤立于世界（isolation），但是面对"一战""二战"这样势不可当的全球事件，美国开始调整自身并积极参与进来。

"二战"后，中国陷入内战，欧洲被毁坏，俄罗斯忙于重建，因此，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在国际上崛起并开始主导世界。当然，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必须做出调整，适应这种变化。

我不想告诉中国如何做。在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是地区朝贡体系的中心，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而这种情况现在也改变了。中美两国领导人都不能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还要看到国际社会的利益。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两国元首的共同声明非常积极，特别是在长期目标方面。我们也需要在中期目标方面进行积极合作。

傅莹：确实，对中美来说现在都面临着挑战。很多人认为，美国并没有准备好，对新的变化很焦虑，美国国内就如何应对像中国这样新崛起的国家还没有清晰一致的思路。

基辛格：但是有一条思路是清晰的，那就是中美应该和平解决分歧。

傅莹：我同意您的观点，我想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与世界接轨，理解世界，并让世界也理解中国。这里有一个认知的问题。当中国在捍卫自身利益，应对挑衅的时候，美国却认为中国是在挑战美国和世界。那么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让我们的利益在同一个屋檐下？中美怎样才能并肩携手？

基辛格：当然，每个国家都会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我的建议就是，可以找出具体问题中的分歧，坐下来共同商议，力图理解对方的利益，而不是运用武力。比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契机，每个国家都可以参与进来。看待这些事件时应该是“哪些国家可以参与”，而不是“哪个国家可以控制和主导”。又比如南海问题这种直接关系到安全的事件，应该用建设性的方式处理此类问题。

傅莹：非常赞同。我想对美国来说，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世界大国，它也必须认识到其他国家也有自己的安全利益。安全应当是国家间的共同利益，维护一国的安全不应当以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为代价。

基辛格：没有国家可以保证绝对安全，因为寻求绝对安全意味着绝对的不安全，但是如果安全问题可以协商，相关国家就会感觉到安全。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一些严肃的安全问题，如中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不同形式的问题，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威胁所有人。

观众提问：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有什么顾虑？又需要重点做些什么？

基辛格：美国国内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只说我的看法。我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两国应该以伙伴关系互相对待和互相学习。哈佛大学曾做过一个研究，显示过去15次新兴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有11次与守成大国发生了战争。我们有责任做出改变而不是重蹈覆辙。我曾多次提到，并向美国政府建议重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在我的书中也反复提及此概念。但是目前美国正是选举季，所以你们可能听到一些不同声音，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自我初次访华后，美国一共换了8届政府，而这8届政府都得出同一个结论，那就是，美国必须和中国合作。

观众提问：当今世界秩序正在经历解构与重塑的过程。在您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想象中，认为中美两国最大的分歧点是什么？

基辛格：第一，美国主要受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影响，秉承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我认为，未来很可能发生的问题在于，对欧洲地区很难下定义，因为一些国家会担心边界和重叠区域的问题，因此对这些有争议地区的外交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二，美国正在企图建立一个全球经济体系。我认为中国应该加入TPP，太平洋两岸应该作为一个共同体来解决问题。我们与中国领导人在环境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就网络安全问题开展对话，我们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有共同的关切，因此中美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紧

密合作。当然某些方面，分歧是存在的，在这些领域，我们应当告诉对方彼此的担忧是什么，而不是互相威胁。

傅莹：您在书中试图激励美国人思考未来秩序的问题。您用了“矛盾的超级大国”（ambivalent superpower）这个词来描述美国，认为美国总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徘徊，苦苦追问自己为解决世界上各种问题所做努力的道德价值何在。

基辛格：我曾与北京大学的学生对话。中国人似乎认为，美国的任何一个行动都是精心设计的、有预谋和为了达到特定目标的。但是，实际上美国自身很矛盾，你可以看到，美国在历史上反反复复，干涉，撤军，又干涉，又撤军，美国从来未有过全球性外交政策，这种反复也是体现之一，美国在试图管理和试图退出全球事务之间挣扎。这是美国的一个伤疤。我常常告诉美国的听众要有清晰的思路，一方面，我们不能主导一切，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参与到全球事务中去，历史很长，我们要有耐心。

傅莹：您曾问过我，中国是怎样看待美国的？我回答说，中国相信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各国应该像兄弟一样。您觉得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是不是也十分矛盾呢？有一些美国人跟我说，中国应该接受美国的领导，否则，美国应当针对中国制定新的大战略；但另外一些人却认同两国应该共同合作。那么您觉得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中国应该在世界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基辛格：我要告诉在场观众的是，傅莹女士每年都会来拜访我，每次她的问题都很有洞察力。为了确保我听进她的话，谈话后她都会送给我会谈纪要，这些纪要非常准确，我从来没有修改过它们。具体定义中国的角色非常难。中美两国领导人也会会面，并且互送文件，试图达成共识向各自国民展示。回顾过去45年，我们有丰硕的成果。

中国是一个有着伟大悠久历史的国家，有宝贵的经验。中美有不同的经验，但有一些问题同时影响着双方，因此中国的角色应该是与美国相互平等、彼此尊重的伙伴，可能会有分歧，但要在不影响全局的前提下解决分歧，我认为这是可以达到的。我见过5代中国领导人，我对此非常乐观，相信双方可以找到最终方案。

傅莹：目前，中国有很多学者也在积极地为世界秩序问题献计献策。

比如，今天也在场的阎学通教授对中国古代的传统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刻挖掘，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未来世界将是中美两极格局而非多极格局。

秦亚青教授试图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他强调关系本位和过程建构。

王缉思教授赞同您关于中美“共同演化”的观点，他认为，两国之间“互相尊重”的根本含义是，美国应尊重中国政府所维持的国内秩序，相应地，中国应尊重美国维持的国际秩序。

黄仁伟教授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将是未来世界秩序的核心，中美应共同发展更加稳定的双边关系。

我想问基辛格博士的是：中国人正在寻求未来世界秩序的理论基础，但中国并没有作为世界大国的历史经验，您在这方面对中国人有什么建议呢?

基辛格：我第一次来中国时，对中国哲学了解甚少，这些年我尝试学习，发现美中之间有一定的文化差异。美中都认为自己的文化是独一无二的，但是美国人相信，可以通过教化，比如传教，来改变其他国家的价值观，而中国人更相信以身作则，从未派传教士去外国。

中国人认为，如果你不理解中国文化，那就不算中国人。中国人寻求别人的尊重，美国人寻求别人的皈依。

美国历史上很少有人学习过中国的哲学思想，美国倾向于将所有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而中国倾向于将问题看作历史进程。这是我们必须应对的观念差异的挑战。

美国很多人称我为现实主义者，即使我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词。我学习过欧洲改革和政府力量等，我深信对待事物需要全局观念。这并不是因为我现在变得软弱了，而是中美冲突将会非常危险，双方必须努力避免冲突，如果失败了，我们将会回到传统的模式去，这十分危险。我期待一个各国都能被平等对待的世界秩序，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趋势将不可避免。

---

1. 2015年10月31日，傅莹应邀出席“世界秩序与中国的角色——2015京城国际论坛”，并主持与基辛格博士的公开对话，回答听众提问。对话内容系首次整理发布。

与福山谈话实录㊟

傅莹：美国大选的状况出乎您的预料？

福山：确实。没人料到特朗普会是主角之一，人们还在适应并接受这个事实。下期出版的《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上会有我写的文章，阐述这次大选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影响。我的主要观点是：特朗普现象不是偶然的，它代表了美国的一个重要社会趋势。全球化、科技发展、移民和去工业化导致劳动者阶层地位持续下降，如果不是身处这个阶层，很难理解和注意到，美国的衰落已很严重。这不是一朝一夕之结果，而是在过去30年间逐渐积累形成的。美国人尤其是高中学历或以下的劳动者阶级，实际收入是下降的。在这些阶级的聚居区有很多问题：单亲家庭、犯罪率上升等等。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与妻子安·凯斯（Anne Case）合写了一篇文章，文中指出从1999年到2010年，美国白人男性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了50万，主要是吸毒等问题。全球人均寿命在增长，而美国白人男性的死亡率却在上升。美国非洲裔人上世纪80年代有过类似的状况，现在情况已经缓解，而中年白人的死亡率上升这一现象并没有被广泛认识到。我认为特朗普了解这个群体，他是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者，想要保障美国劳动者的利益，阻止移民。他不喜欢全球化，即便是输掉大选，他也已经改变了美国政治生态，余波将持续数年。至于大选结果，谁知道呢，近来情况疯狂无常，已经不能排除希拉里·克林顿输掉大选的可能性了。

傅莹：在中国也有不少人关注美国大选。年长的中国人不大有倾向性，但年轻一代很有想法，也乐于表达，在他们中有很多人倾向特朗普。这些90后认为希拉里的讲话太老派，还是20世纪的作风，而特

朗普貌似紧跟时代潮流。另外一个原因是两者对中国的不同表述。例如特朗普说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这不难理解，毕竟中国具有庞大的制造业，而希拉里却说中国偷走了美国的科技，显得刻薄。两者相比较，至少特朗普有话直说，而希拉里依旧对中国怀有刻板印象。当然，我所看到的可能都是表面现象。

福山：我想这是个错误的成见。不管两者风格如何不同，要看到特朗普是个贸易保护主义者，而希拉里不是。

傅莹：如果特朗普坚持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也无好处。

福山：对谁都没有好处。现在全球都充斥着经济民族主义的声音。美国建立了现有的全球贸易系统以避免各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但如果美国自身开始大规模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各国很快就会做出反应。

傅莹：是的。您怎么看中美政治分歧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就宣称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不正确的，您大概是第一个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排斥言论导致中国人的戒备心理，双方难以建立起信任。不知您是否同意我的看法，那就是各国应对自己的政治体制负责。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正确，中国人会审视和完善自己，而美国也应如此。美国总是在政治上指责中国，这构成两国关系的障碍之一。您怎么看？这个矛盾会长久存在吗?

福山：你是说美国对于民主和人权的关注?

傅莹：是指美国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居高临下态度。

福山：我想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谈话的对象。我认为，美国对中国政体的批评对双边关系的实际影响并不大。例如每逢大选，候选人

都在指责中国，但当选后他们会变得十分实际，两国有很多共同利益。美国并不能左右中国的政体，所以只能从实际出发，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美国公民是否关心中国的民主和人权问题呢？是的，民主和人权事关美国人的核心身份，他们相信即使在美国之外，在全世界这都是普世价值。但我不认为美中关系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因为两国的关系是建立在贸易合作和民间往来基础之上的。我们的政府不会禁止国人批评中国。我认为两国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什么大矛盾，关键还是两国对外交上实际存在的问题如何处置。

傅莹：我出席2014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时，与会者的主要关注点在乌克兰问题上，我听到许多关于乌克兰未来政府的讨论。在咖啡馆里、电视评论中，甚至议论到拳王克里琴科是否有能力承担总理之职。这些讨论是远在乌克兰政府倒台之前发生的，对俄罗斯来讲，很难相信美国和欧洲没有预谋，因为“颜色革命”的确就在乌克兰发生了。我曾经就这个问题与德国人交换过意见，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出现对立的群体向美国或者德国寻求帮助，就不好拒绝。但是，用什么标准来确定是否应插手他国内政呢？

福山：这种看法恐怕很难改变。但我个人认为，外人高估了美国削弱任何一个国家的能力。乌克兰事件与其国内活动家获得美国多少帮助没有很大的关系，很多乌克兰年轻人反对总统亚努科维奇，不希望乌克兰与俄罗斯纠缠，更愿意加入欧盟。政变是有组织的，但即便美国有所介入，也是在暗地里进行而已。2013年9月我在乌克兰参加斯坦福的夏季学术交流项目，邀请到的人大部分是乌克兰的活动家，美国政府并没有为斯坦福的这个项目买单，我们有别的财政来源。恰好这些乌克兰活动家反对的与美国政府反对的是大体一致的，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参与颠覆乌克兰政权的运动。政变原因是乌克兰人民不想与腐败的俄罗斯政府有瓜葛，他们更希望加入欧盟。

如果说美国历史上有过鼓动“颜色革命”的做法，那也是在“二战”后最初的15年左右，的确美国曾参与颠覆他国政权，例如1954在危地马拉和伊朗。在危地马拉的例子中，中情局密谋推翻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左翼政府，那是个巨大错误，两国为此付出了代价，美国的利益也受到损害。因此在越南战争中，美国重新审视是否能够和应该控制他国的政治局势，得出结论是，这样做将适得其反。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国内有过颠覆伊朗政权的言论，但我不认为有人当真，我们有前车之鉴。伊朗问题部分上是1954年美国在伊朗所作所为的历史遗留。综上，美国停止干涉甚至颠覆他国政权已有很长时间了。

傅莹：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上呢?

福山：这是好例子。我们决定不直接介入叙利亚内政，结果是30万人死亡和大规模移民潮危机，很多美国人指责奥巴马政府不作为，声称叙利亚死亡人数超过美国当时进入伊拉克导致的死亡人数。利比亚的情况不同，利比亚的解放是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的，产生后来问题的根源是各方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对利比亚的后续重建做出贡献，这是大错。布什政府在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其独裁政权之后，并没有计划和措施稳定战后局势。美国从中得到教训，不能再次重蹈覆辙，但实际上是很难的，我们在利比亚参与稳定政局，反而得到负面结果，在叙利亚决定不作为，结果更糟。有时候很难决断到底应该如何插手。在中东问题上美国撤退的原因是局势太复杂了，我们并不十分了解，介入后常常变得很棘手，导致自己深陷泥潭。

傅莹：我认为中美两国政治学学者坐下来交换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十分重要，美国有自己的看法，但很少了解对方的观点，中国也需要多了解他人观点。

福山：我认为这个想法很好。即便是美国的政治学学者坐下来开会，你也会发现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现在有很多争论，例如对特朗普现象。特朗普现在传递的美国外交政策是1940年后主流候选人很少

再提及的，他强调的是孤立主义，限制美国动用自身力量参与外界事务。

傅莹：特朗普的言论仅是为大选做表面文章吗?

福山：不。

傅莹：所以您认为特朗普如果上任，会兑现这些政策?

福山：过去30年来特朗普一直这么说，并不是最近才开始改变的。

傅莹：您预测谁会赢得大选?

福山：希拉里，而且是大幅度胜出，但我也不敢十分肯定，因为过去的一年特朗普实在让人瞠目结舌，人们曾预测他不是10月就是11月或者12月就会退出，肯定不会通过初选。将来情况怎样，谁也不好预测。

---

1. 2016年5月10日，傅莹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往见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就中美关系、美国大选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有关对话内容系首次整理发布。福山教授为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师从塞缪尔·亨廷顿。2010年起任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高级研究员、主任。著有《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信任》《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等著作。

中俄关系

中俄关系：是盟友还是伙伴注

在俄罗斯与美欧关系陷入困难之际，相对紧密的中俄关系引起新的关注。西方学界及媒体一直在探寻一个答案：中国与俄罗斯是什么样的伙伴关系？是否会走向结盟？

世界冷战结束后，西方关于中俄关系趋势的评估和猜测通常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俄关系脆弱复杂，充满不确定因素。许多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将中俄关系称为“方便婚姻”，认为两国不太可能越走越近，反而很可能渐行渐远。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战略甚至意识形态的考量构成中俄关系的基础，两国都视美国为实现自身意图可能的阻碍，他们预见中俄未来必然会结成反美、反西方联盟。

这两种观点都没有准确地反映中俄关系的实质。中俄关系内容丰富、基础牢固，是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演变进一步拉近了两国的关系。许多西方分析家和政府官员推测（可能有人甚至希望），由于俄罗斯深度介入当前叙利亚和乌克兰局势，中俄关系会趋向紧张，甚至破裂。事实上，这样的状况没有发生。

中国无意与俄罗斯正式结盟，也不会结成反美、反西方联盟。中方的愿望是，稳定的中俄关系能够为两个大的邻国在安全的环境里实现国家发展目标提供保障，通过互利互惠的合作彼此提供支持，这为大国处理分歧和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经验，同时也有利于巩固国际体系。

中俄关系沿革

中国同沙俄及此后的苏联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有过三次结盟，结果都不如预期，短暂的结盟只是两个实力失衡国家间的权宜之计。从20世纪60年代起，两个同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关系时好时坏，虽然也有合作，但更多时候是对抗和猜疑。1989年，在苏联政权末期，中苏关系终于恢复正常。双方发表声明强调，“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两年后，苏联解体，但中俄关系依旧继承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

俄罗斯独立之初，向西方“一边倒”的“大西洋主义”占据主导。为了赢得西方信任和援助，俄罗斯在经济改革、削减战略核武器等诸多重要问题上走西方路线，不断做出让步。但事与愿违，俄罗斯反而出现经济萎缩、区域影响力下降，俄罗斯对美欧援助口惠而实不至感到失望，对北约东扩意图十分不满。1992年，俄罗斯开始将更多精力转向亚洲。同年，中俄宣布“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并发表联合政治声明，强调“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其国内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得到尊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

自此开始，中俄关系逐步改善和深入。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两国贸易和投资大幅增长。2011年，中国成为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国。仅2014年一年，中国对俄罗斯投资增幅就高达80%，且这一增长势头依然强劲。20世纪90年代早期，中俄贸易额每年尚不足50亿美元，而2014年这一数字已接近1000亿美元，足以彰显两国经贸关系的成长。2014年，中俄签署天然气管道项目的“世纪合同”，俄将从2018年起向中国供气。此外，双方还计划在核电、联合航空制造、高铁、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做一些“大事”，并且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等新的多边金融平台开展合作。

同时，中俄两国安全合作不断深化。中国连续多年保持俄罗斯最大武器进口国地位，并且正在与俄方探讨开展一系列武器联合研制项

目。此外，双方还开展了高层防务磋商、联演联训、人员培训等系列合作，包括双方过去十多年间在双边及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以反恐等为主题举行的二十余次联合军演。20年间，已有数千名中国军人赴俄留学，而俄罗斯中高级军官也到中国国防大学进行类似的短期进修。

伴随着经济、军事合作的发展，中俄政治关系也在不断加深。2008年，两国和平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领土争议，划定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从根本上消除了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最大隐患。目前两国在元首、总理、议长、外长等各个层级都有年度定期会晤的安排。习近平2013年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已五次赴俄，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三次来华，加上国际场合的见面，两人已经会晤了14次，普京成为习近平主席见过次数最多的外国元首。

管控分歧

尽管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中俄两个邻国间依然存在分歧和矛盾，对外政策关注点也各有侧重。欧洲是俄罗斯的传统外交优先方向，而中国则更多聚焦亚洲。两国外交行事风格也不同，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上的经验更加丰富，外交主动性强，但略显生硬，常出人意料。中国则是应对性多一些，姿态相对和缓。

中国的崛起引发了一些俄罗斯人的不安，有些人对中俄力量对比的变化感到不适应，旧有的“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仍有一定市场。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于2008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60%的俄罗斯人担心日益增多的中国远东移民会对俄罗斯领土主权产生威胁，4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强大将挑战俄罗斯的利益。随着中国不断寻求新的对外投资和贸易机会，同独联体国家合作不断深化，有些俄罗斯人担心中国在其周边争夺影响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俄罗斯最初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反应比较谨慎，当然，俄罗斯最终于2014年

表示对该倡议的支持。另外，仍然有中国人因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对俄罗斯存有不满，尽管双方已和平解决领土争议，沙俄于19世纪末抢占中国大约15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事在中国评论界仍常有议论。

然而，以上分歧都不足以支持西方关于中俄关系会渐行渐远的猜测。过去两年，俄罗斯和美国、欧盟的关系由于乌克兰和叙利亚危机每况愈下，关于中俄关系会恶化的评论在西方不时出现。但是，尽管有分歧，中俄对坚定发展两国关系的政策考量是一致的，为双方各自的安全和发展所需，两国必须合作。在国际合作方面，中俄携手既有利于国际政治的平衡，也给诸多国际难题的解决带来机遇。双方既有共识，也有分歧，但双方能承认和有效管控分歧，同时不断扩大共识。正如中国外长王毅所言，中俄关系是一条对外交往的新路，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一种新的外交模式。

对乌克兰和叙利亚危机的应对，反映了中俄如何有效地维护双边伙伴关系。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对乌克兰问题态度不明朗，或怀疑中国倒向了俄罗斯一边。事实上，2014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第一时间明确表示，应该尊重乌克兰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强调的是，相关所有各方应通过对话机制协商解决分歧，设立国际协调机制，各方不应采取恶化局势的行动。中国还提出应协助乌克兰维护经济和金融稳定。中国并未倒向任何一边：在国际问题方面，中国从来恪守公正、公平和客观的原则。

但是，中国外交人士和领导人也对导致危机的种种根源性因素更加关注。例如，在独联体国家屡次上演的“颜色革命”和背后的外部因素；北约长期推进东扩对俄罗斯产生安全压力等。还有一层因素不能忽略，这就是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之间存在复杂的历史、民族、宗教及领土纠葛。乌克兰事件的爆发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乌克兰局势发展到今天，“偶然中有必然”。

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认为，俄罗斯应叙利亚政府请求进行军事干涉，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分子。尽管华盛顿呼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下台，但美俄打击“伊斯兰国”（ISIS）的意愿是相同的，因此，美国一方面谴责俄罗斯干涉，另一方面又表示愿意与俄罗斯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俄罗斯的行动虽不完全是美国希望看到的，但对美国利益来讲并不完全是坏事。从中国的角度看，俄罗斯和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这样凶残的恐怖主义方面是有共同利益的，中方希望，在维也纳举行的包括俄罗斯、美国、伊朗和其他本地区相关国家的会谈将在解决该问题方面取得进展。

但是，很难说俄美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前景如何，因为双方对如何达成和平与秩序并无共识。许多中国人感到困惑，为什么美俄很难走出冷战阴霾？听美国政客和媒体谈俄罗斯，总像在讲那个失败的冷战对手。俄罗斯官员和研究人员也常常抨击美国的傲慢和帝国主义言行。双方都有分析人士认为，美俄之间关于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对抗有可能使两国重陷冷战。但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这场对抗更像是冷战漫长的终结过程，不知道这次双方是否能够抓住机会，为“宿仇”彻底画上一个句号？

超越零和

鉴于中、俄、美三国之间的关系互相关联，研究中俄关系也需要关注中美关系的状况。与中俄关系相比，中美关系更为复杂。中美经济总量占到全球1/3，2014年，双边贸易额达5550多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1200亿美元。37年前，当中美刚刚建交之际，没人预料到两国会发展出如此强有力的双边关系。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美关系也存在结构性的矛盾，两国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有巨大的不同。很多美国人视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及与

之相应的增加的国际影响力为对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潜在挑战。中国正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2003年美国派兵入侵伊拉克之际，中国的GDP大约是美国的1/8。8年后，当美国开始从伊拉克撤军之时，中国的GDP已增至美国的一半。很多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GDP将与美国接近，这个趋势令美国人不安，有人认为中美对抗难以避免。针对中国在南沙一些岛礁上的扩建行为，很多美国学者和评论家认为这是“扩张主义”的体现，并就美国该如何应对展开了激烈讨论。同时，北京认为，美国派军舰接近中国岛礁是挑衅行为，有观点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从以建设性接触为主转向遏制。

在这些争论的背景之下，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对美国进行了他担任国家主席以来的首次国事访问，期间对有关中国的发展对美国的世界领导角色构成挑战的观点进行了直接回应。他说，“我们将始终不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人们应摈弃你输我赢、零和博弈旧观念，树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新理念。中国发展好了，对世界有利，对美国也有利；美国发展好了，对世界和中国也有利”。

中国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获益者，秉持和推崇《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平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中国自身在相当长时间里都需要聚焦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高度重视维护一个稳定与和平的外部环境。中国在维护自身利益上的态度是明确和坚决的，对任何挑衅和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权益的做法都会给予坚决的回应，目的仍是要确保和平与稳定。中国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国际秩序，更好地融入世界。

促进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3年以来，“习奥会”已进行过5次，此外还有3次通话，2013年6月，两国领导人在安纳伯格庄园进行了7个多小时的长谈。之后，习近平主席宣布中

美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他将之定义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两国领导人之后围绕这个话题继续进行了对话。2014年11月，他们在北京的“瀛台夜话”持续近5个小时，在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他与奥巴马总统直接对话和共同活动时间约9个小时。两国元首长时间的谈话有助于他们增进了解，防止发生一些美国分析家认为的不可避免的冲突。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双方在广泛领域达成共识，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安全、反恐和核不扩散领域的挑战。网络安全曾是访问前两国分歧比较严重的领域之一，双方领导人进行了坦诚的对话，阐明各自意图并就建立打击网络犯罪高级别对话机制达成共识，表示将致力于合作构建互联网空间国际行为准则。这充分显示出中美能够在重要问题上促进全球合作。

当然，中美在例如南海、台湾、人权、经济和贸易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中国对美国亚太军事同盟的意图极为关切，特别是在2009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战略之后，美国在亚洲的一些盟友为了强化自己在与中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上的地位，拉美国为自己站台，试图让美国介入与中国的争端。这是非常危险的，让人联想到冷战时期的集团政治。

中国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学者建议，如果美国在本地区坚持推动集团政治，中国和俄罗斯应当通过结盟来应对。但中国决策层并不认可这种说法，中国没有搞集团政治和结盟的政策，也没有这样的政治文化，俄罗斯同样没有这样的意愿。中俄两国应该坚持结为战略伙伴而不是盟友的原则。对中美两国来说，重要的是把牢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方向，继续让对话合作、管控分歧主导彼此关系的议程。

中俄美关系：不等边三角形

中俄美三国目前的相互关系如同一个不等边三角形，其中，华盛顿和莫斯科的这条边距离最长。在三国关系当中，中俄关系的态势显然更加积极和稳定，中美关系一直起伏不断，俄美关系非常紧张，因为俄罗斯现在正遭受美国的严厉制裁。与此同时，中国同俄罗斯对美国动辄以武力和制裁方式对他国施压的做法以及在外交政策中的双重标准不能认同。

在美国及其盟友眼中，中俄走近很容易被视为带有结盟色彩，进而被看作是扰乱或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但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俄三方关系不应该是一方联合另一方对付第三方的"大博弈"，中俄关系的良好发展不针对美国，也不会受到美国的影响。同样，中国同美国开展合作也不会受到俄罗斯因素或是俄美紧张关系的影响，中国不会构建以集团政治为基础的同盟体系，也不会"被结盟"。

现行国际秩序是世界稳定的基石，但并非尽善尽美。2005年中俄共同发表了《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呼吁国际体系更加公正，以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为合法基础。联合声明显示，中俄双边关系从不信任、竞争到伙伴向合作伙伴的方向发展，使它们能够管控分歧，扩大共识，支持全球合作，减少世界陷入大国冲突与战争的风险。

---

1. 2015年12月，美国《外交》杂志2016年1/2月号发表傅莹署名文章：《中国如何看俄罗斯：北京和莫斯科关系密切，但不是盟友》。12月17日，《参考消息》报第10版刊载中译文，题为：《中俄结伴但非结盟》。此文为傅莹关于中俄关系的长论文节选版，论文全文刊登于《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4期，题为：《中俄关系：是盟友还是伙伴？》。

亚洲和平

东亚的安全与中国的责任㊟

“二战”后，东亚地区作为两大集团对抗的前沿，经历了无数次的“热战”和“冷战”。东亚安全形势的全面改观，始于冷战结束特别是柬埔寨战争的结束。自那时起，东亚地区总体上保持了相对和平、稳定与安全，几乎所有东亚国家都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都将经济建设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都一心一意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

20多年过去了，东亚携手合作，克服了两次大的经济金融危机，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实现了民众就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实现了国家经济社会进步和地区安全稳定的良性循环。东亚经济平均增长率超过8%，远远超过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4%和发达国家3%的水平，东亚经济总量已超过北美和欧洲，成为世界经济三足鼎立中的重要一极。

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区域合作十分活跃，自贸区建设和互联互通合作方兴未艾，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东亚地区已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在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东亚经济仍然保持相对较快增长，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当然，东亚地区也存在诸多安全挑战。一方面，朝核问题、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等旧有的传统安全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另一方面，恐怖主义、海上安全、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严峻。

一些西方媒体甚至预测东亚要发生冲突。2012年，我在一个周边国家参加会议时，一名欧洲记者走到我面前神情严肃地问道：南海问

题怎么办呀？我反问他，难道欧债危机不是更值得你担心吗？他笑了，回答说因为欧债危机没有解决办法，所以不再关心了。

我对东亚安全形势是持乐观态度的。这是因为东亚各国间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不断深化，已成为利益融合、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发展繁荣、实现合作共赢，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在东亚地区，冷战式的集团对抗和地区冲突不复存在，大国间没有你死我活的争夺，增进理解、深化合作成为各国的优先政策选择，对话和谈判成为处理国家间争端的主要手段。非传统安全挑战的跨国性也决定了，地区国家必须加强相互协作，才能合力破解难题。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从阿富汗问题到柬埔寨问题，中国为推动地区安全热点的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中国真正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还是始于东盟地区论坛。1994年正式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历史上第一次把东亚和亚太地区大小国家都聚拢在一起，共商维护地区安全大计。我本人当时任外交部亚洲司综合处的处长，亲身参与了中国加入东盟地区论坛的决策过程。

当时的中国对参与多边安全机制还充满了疑虑。20年前，对于中国政府和军队很多部门来说，国家安全是纯粹的国内问题，参与地区多边安全机制似乎是毫无必要的。在中方的跨部门协调中，许多人担心加入东盟地区论坛会侵蚀中国安全决策的自主权。尽管有疑虑，中国最终还是接受了邀请，作为创始成员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并且参与制订了论坛指导原则。

20年来，东盟地区论坛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最具包容性和影响力的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中国通过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为推广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促进地区安全合作做出重要贡献。中国还提出，应摒弃以缔结军事同盟、武力展示、军事威慑、强权政

治为特征的零和博弈的陈旧安全观念，共同培育一种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主要特征的新型的安全观念。

其精髓是各方平等参与安全事务，通过合作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安全是共同的，应该让所有国家参与区域安全架构的建设，防止出现因一国不安全而导致的溢出效应。安全是相互的，不应该也不可能追求独家的绝对安全，任何国家都不应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的基础上。安全是综合的，经济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重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综合施策，一味突出军事安全和军备手段，制造和渲染安全威胁，对亚洲有害无益。时至今日，这些主张和想法日益被亚太多国所接纳和认同。

中国提出并践行合作安全理念，首先确保做好自己的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占东亚的三分之二。今天13亿中国人不仅自己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而且能为他国提供巨大的出口市场、资金和经验，创造就业机会，这是历史性的变化与贡献。

同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意识到肩负的国际责任，愿意为维护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与发展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为解决各种安全挑战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发挥中国独特的积极作用。

东亚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维护东亚地区和平与安全，中国责无旁贷。在东亚热点问题上，中国积极劝和促谈，为缓和紧张局势、维护地区和平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朝鲜半岛与中国山水相连，邻居如果不安全，中国也不可能安全。中国一直坚定不移地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致力于从根本上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10年前，在中国倡议和推动下，朝核问题的六个当事国坐到了谈判桌前，尽管现在六方会谈进程目前遇到了困难，但不可否认的是，六方会谈为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维护半岛和东南亚和平、安全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个区域的安全感往往取决于安全链条中最脆弱的那个环节。毋庸置疑，朝鲜半岛存在极不对称的力量对比，在此情势之下，弱势的一方很容易缺乏安全感，而单纯施压和遏制只能增强其被威胁感，引发激烈反弹，如此周而复始，深陷“安全困境”，使问题更难解决。朝鲜半岛安全秩序不能孤立和排斥任何国家，不能不考虑另一方为什么感到严重不安全。

我们不赞成任何单方面挑衅性的言行，中国主张半岛无核化，同时希望各方在考虑自身利益的时候也能尊重他方的安全关切，进而建立让主要当事国都平等参与的多边安全机制。东北亚整体的安全应该是涵盖所有成员的完整的安全，不以任何一方的不安全为代价。作为六方会谈的亲历者，我衷心希望各方相向而行，争取早日重启六方会谈，让朝核问题重回谈判轨道。

东亚地区存在一些历史遗留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多数是西方殖民者和冷战的遗产。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数量最多的国家，拥有14个陆上邻国和8个海上邻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22000多公里的陆地边界尚未与任何邻国划定，中国本着互谅互让、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同邻国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经过多年努力，除印度和不丹外，中国已同其余12个陆地邻国成功划定边界，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在海上，中国同越南解决了北部湾划界问题。鉴于东海、南海这些海上争端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中国倡导并推动在争议得到最终解决之前，各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稳定，推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的这一主张是“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的最好体现。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保持了对话与合作，双方于2002年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成为维护南海和平安宁的基石。《宣言》规定，应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和平对话和协商解决南海领

土和管辖权争议，在争议解决前，各方应积极开展海上合作，为当事方最终解决争议创造良好条件。

2013年9月，中国和东盟国家举行落实《宣言》高官会，就继续推进《宣言》框架下务实合作和启动“南海行为准则”措施达成共识。中国希望商签“南海行为准则”的进程也能够成为在南海问题上同东盟国家深化安全互信的过程。

为支持双方开展更大规模的海上合作，中国出资30亿元人民币设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双方已经规划一系列合作项目。前不久，中国领导人访问东南亚时，分别同文莱和越南领导人就共同开发南海部分海域资源达成共识，期待有关合作迈出步伐。

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两国老一代领导人在恢复邦交正常化时就搁置争议达成共识，但日方近年来不断采取强化声索的单方面行动，甚至否认存在争议，这是中方无法接受的。尽管如此，中方还是保持了极大克制，坚持同日方磋商，希望日方能够正视历史和现实，拿出诚意和实际行动，为通过对话磋商妥善管控和解决钓鱼岛问题做出努力。

大国在维护东亚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作为当今最主要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积极推动东亚地区大国良性互动。2013年初，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在克里姆林宫与普京总统深入探讨了如何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广泛共识，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协议，为新时期大国之间深化互信与合作树立了典范。

同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两国领导人同意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不是搞中美共治，而是优势互补、全方位合作，为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

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是一项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历史创举，不会一帆风顺。特别是中美在东亚地区有不同的视角和关切，双方仍有很多分歧，相互看法存在不少误区，需要增加了解，培养合作习惯。这也符合地区国家的期待。

近来，中国学术和舆论界对美国在亚太重新突出安全议题、加大对军事同盟投入是很关注的。我注意到，不少其他亚洲国家媒体和各界人士也都很关心这个问题，有人认为中国就是大家假装看不见的那只大白象，是被针对的目标，也有人担心冷战回归。美国已经反复申明“重返亚太”战略的目标不是遏制中国，是战略“再平衡”。不管怎样，为预防大国冲突而先发制人，很可能只会导致“自我预言的实现”。

中国积极推动地区安全合作和安全机制建设，成为多边安全机制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中国是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亚洲反海盗和武装劫船协定》信息分享中心、马六甲海峡合作机制等地区安全机制的创始成员，也是这些机制框架下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

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例，在中国的倡议下，论坛成立了副防长级的“安全政策会议”，为国防高层官员深入参与论坛搭建了重要平台。中国积极支持论坛加强维和、预防性外交、灾害管理、海上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迄今已经承办了30多个合作项目，是论坛成员中承办项目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已宣布同东盟国家合作承办论坛将于2015年举行的第四次救灾演习，这将是中国首次在境外联合主办军队和民事救援力量都参与的大规模救灾演习。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也愿意承担更多的国际安全义务，为东亚乃至世界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当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也是115个维和参与国中派出工兵和医疗分队人员最多的国家，并即将首次向马里派出成建制的维和部队。

根据联合国决议，中国海军自2008年起陆续向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派遣15批舰艇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圆满完成了600多批护航任务，被护船舶达5000多艘，其中一半是包括东亚国家在内的外国商船。

中国海军在亚丁湾并非单打独斗，他们参加了北约发起的多国海军的“共享信息、降低冲突”协调机制，并与韩国、日本、印度等独立护航国家的海军护航编队开展信息情报交流、分区护航等合作。

东亚国家多属外向型经济模式，从中东途经印度洋、西太平洋一直到东北亚的海上航道是东亚国家的共同海上生命线，中国愿与其他东亚国家一道，积极探讨在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和航行自由等方面开展多种形式的地区合作，并为此承担应尽的责任。

当前，东亚在地区经济合作方面已有比较完善的框架安排，但安全架构仍处于成长磨合期。推动建立一个符合地区实际、满足各方需要的区域安全架构势在必行。

这一架构应建立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观念的基础之上。这一架构应该是平等的、开放的、透明的，具有广泛包容性和代表性。这一架构应有利于促进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坦诚对话与合作，有利于促进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的相互促进。

中国总理李克强2013年10月在文莱出席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时，曾用筷子为例来说明东亚国家通过合作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性。他说，东亚许多国家都使用筷子，一根筷子很难吃着东西，两根筷子一起用才能夹到食物，一把筷子捆在一起就不易折断。他的结论是，每个东亚国家对地区的安全稳定都负有责任，各国应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

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应该成为东亚国家的共同理念，这也是世界前进的大势所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4月的开幕式讲话中曾说过，“和平与安全犹如空气，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与安全，发展就无从谈起。中国作为东亚大国，将继续同各国一道为维护东亚和平安全与发展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

1. 2013年11月15日，傅莹应邀赴韩国首尔出席第16次阿斯彭部长论坛，并发表主旨讲话。讲话内容系首次整理发表。

中国周邻和睦是福[注]

今天这个研讨会以“中国与邻国：推进共同繁荣与发展”为题，切中当前国际国内对中国与周邻形势的关注，很有意义。

我想分享几点自己的学习体会。

一、怎么看本地区的形势?

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曾有较长时间接触亚洲地区的外交事务。回首这20多年的变化，感到中国和周邻国家在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上，在世界上可谓独领风骚，足以引以为傲。

周邻指的是中国与相邻的整个地区。还记得冷战结束之初，这里的许多国家仍陷于各种分歧和长期割裂带来的不信任气氛之中。各国痛定思痛，坚持耐心细致的对话，增信释疑，各方面合作从无到有，逐步扩大。

我年轻的时候当过翻译，曾有幸近距离观察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怀着耐心和情感去关心邻国、沟通思想的。中国经过不懈努力，与周邻建立起合作共赢的共识。

好的外部环境使中国有条件聚焦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整个地区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通过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和建设自贸区，通过妥善管控分歧，培育起相互依赖和信任的合作习惯。

过去20年，亚洲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7.6%增加到27.5%，区域内经贸和金融合作也实现跨越式发展，各国利益交融，相互依存。中国成为亚洲多数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重要投资来源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中国与周邻地区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投入。包括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无论其内涵如何，从根本上看，美国还是受到这个地区的强劲增长和活跃合作的吸引，是看重这里的分量和潜力。当然，再平衡的结果是增强还是削弱这里的大好势头，是要存疑的。

二、怎么看本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和存在的问题?

在当今世界，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更加现实，数据显示，世界上人员和财产损失的一半都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现代媒体可以直观地展现地震、海啸、台风，甚至海难、空难事故的伤害，让我们看到人类的脆弱。在这个越来越小的地球上，非传统安全已经成为可以触及每个人的利益，而且唯有共同努力才能应对的重要课题。

同时，一些传统安全问题和争议也有重新升温的动向。过去20年来形成的协商谈判处理争议的地区性共识，正面临被违背和被抛弃的危险。例如，2012年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单方面打破了中日老一辈领导人达成的搁置争议的共识。遭到中国强烈反应之后，日方调换了主题，把中国描绘成地区安全威胁，不仅使争议扩大化，而且挑动起对立的气氛，至今无法缓解。

最近越南船只干扰中国企业在西沙群岛的中建岛附近海域的作业。而西沙根本就不在争议地区，越南早就承认了中国对西沙的主权，这里的勘探活动也已经有10年之久。这些问题被炒作，在周邻国家内部和外部引发新的焦虑，对地区和平气氛带来新的挑战。

三、如何维护周邻的和平与和谐?

有人认为，亚洲面临经济繁荣和安全困境的矛盾状况，这个看法我觉得不很准确。亚洲的经济繁荣恰是得益于安全稳定的局面，是中国与周邻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要维护和平稳定，仍要靠各国共同努力。对现代社会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对冷战思维的结果和人为造成的紧张，必须高度警惕和有效遏制。

在处理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中，中国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同时，我们也反对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些国家的举动和立场偏离了和平轨道、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挑战时，中国必须做出有力、有节的反应，一方面是维护自己的主权权益，另一方面也是防止安全局势失控，促使事态回到协商谈判的轨道，维护和平稳定大局。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5月的亚信安全峰会上发表了以“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为题的重要讲话，强调，亚洲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中国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立足于亚洲的多样性特点和安全状况，体现出平等、合作、包容的精神。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潮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中国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做出的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我们要沿着这条道路坚持走下去，不能因为存在干扰而偏离正确的方向。

---

1. 2014年5月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承办的“中国与邻国：推进共同繁荣与发展”国际学术论坛在京举行。傅莹应邀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发言，发言内容系首次整理发布。

东亚能否坚持区域合作的方向？㊟

2015年11月5日至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了越南、新加坡这两个东盟（亚细安）国家。中越领导人宣布要实现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越南“两廊一圈”两大发展战略的对接，中新领导人决定启动两国自贸区升级版谈判。这表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区域合作带来了新的动力。

在2015年11月1日于韩国首尔举行的第六次中日韩首脑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与韩国的朴槿惠总统、日本的安倍晋三首相一致表示，要“克服东亚局势复杂多变造成的困难”，“坚定推动三国合作向前发展”。

再过几天，中国领导人将在菲律宾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在马来西亚出席东盟+1、东盟+3和东亚峰会，带去和平、合作的信息。中国人期待的是，在增进地区国家信任和理解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区域合作。

而东盟也希望在2015年年底之前正式宣告建成亚洲第一个次区域共同体“东盟共同体”，借以促进东南亚和东亚区域的一体化进程。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正在不断受到分歧和争议问题的干扰。尽管中国—东盟合作不断深化，东盟和中日韩，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区域合作机制却开始减速。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东亚区域合作能否保持前进的势头？

东亚区域合作曾是本地区各国的共同骄傲。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东亚各国超越分歧，秉持包容精神，以极大的魄力在本地区搭建起多个“同心圆”结成的区域合作架构。这个架构以东盟为中心，10+1

和10+3合作为主渠道，东亚峰会为外延，共同支撑起东亚区域合作方兴未艾的局面。

从1985年到2014年，全球经济总规模增长了6.2倍，而同期东亚经济体（东盟+中日韩）经济总量扩大了9.3倍。东亚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30年前不到17%，现在是25%。

如果说欧洲一体化走的是制度模式和价值体系类同的国家超越分歧步步深化联盟的路子，那么东亚区域合作走的则是一条跨越制度和价值鸿沟而进行多重构建、梯次整合的路子。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亚区域合作对人类社会在交流中融合、在融合中进步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丝毫不亚于欧洲一体化进程。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进一步确立了睦邻、安邻、富邻的亚洲政策，在周边外交中积极参与和鼓励多边合作，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坚定推手和重要贡献者。中国支持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既尊重了东盟的积极性，也有效规避了大国竞争因素对区域合作的负面冲击。在大国众多的东亚，东盟以自身一体化带动区域一体化，虽是“小马拉大车”，但富有成效。

现在，中国的地区政策目标并未发生变化，但确有多种因素在冲击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可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对东亚地区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区域内部领土和海洋划界争端、国际河流上下游利益差别等争议问题的突出，亦给东亚合作带来干扰，东亚区域合作的会议往往被负面议题主导。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军事安全议程的强调显然增加了东亚区域合作的复杂因素。在东亚区域合作平台上，各国曾经有着优先推进合作与经济发展议程的默契，但是美国强化军事和安全议题的做法使之难以为继。

另一个情况是，2009年至2010年间，当日本政府显示出重视“亚洲协同”甚于对美外交的姿态时，似乎触及了美国亚太战略的敏感之处，使美方感到不安，日本被迫改变了其对区域合作的态度。近年来，作为本地区重要国家，面对中国上升势头，日本在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机遇论”之间拿不定主意，于是人们看到的是，日本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同时，又优先投入一度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精力分散。

能否得出一个结论：中、美、日以及东盟四方利益兼容性的下降是东亚区域合作遭遇挑战的根本原因？如果是，那么我们就要重新审视各自的政策，努力在自身国家利益与地区合作大局之间求得平衡。

对东盟而言，是要保持住自身引领区域合作的意愿和能力，照顾本区域各方更广泛关切，以继续为其发挥核心作用赢得支持。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受到南沙争端升温的严重干扰，个别东盟国家偏离2001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的精神，在南海采取挑衅言论和行动。中国支持东盟联合自强，但不能支持东盟国家联手损害中国的利益。

对作为亚太地区一员的美国而言，需要尊重地区国家优先发展经济、开展合作的共识，与亚洲国家真诚对话，在既有和将有的区域机制之间架桥而不是筑墙，与各国一道引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而非恶性竞争、相互排斥的地区环境。

至于日本，需要学会倾听邻国的声音，不能一门心思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日本应与邻国在历史问题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并增进相互了解，这将有助于消除东亚区域合作发展的一大障碍。中日需要重拾战略互惠与合作的精神。

中国的责任又该是怎样的呢？中国需要保持推进东亚区域合作的信念，避免受到外部因素过多干扰。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

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在参与东亚合作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灵感和经验，要为促进地区共同发展提供更宽广的舞台。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中国需要持之以恒地经营周边，避免自身利益与地区利益发生抵触。在争议问题上，中国将一如既往地稳妥处置，以平衡方式寻求谈判化解之道，这也需要本地区其他国家的配合与支持。

作为对本区域负有责任的成员，东亚各国都不应允许区域合作发生“退行性”变化，因为长此以往谁都不会成为赢家。各方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肩上的责任，突出地区议程的积极面，以免被消极和争议问题所把持。

---

1. 2015年10月24日，傅莹应邀出席第11届北京—东京论坛，并发表题为《东亚区域合作视野中的中日关系》午餐演讲。10月26日，《人民日报》第5版评论版《名家笔谈》栏目发表此次演讲节选，题为《维护合作，离不开理解与宽容》。

朝核问题的历史演进与前景展望[注]

朝鲜半岛核问题是东北亚安全局势中最具复杂性和最具不确定性的因素，也是当前亚太乃至国际社会高度聚焦的安全热点。随着朝核问题的升温，国际社会上不断有人在问：中国为什么不能在管住朝鲜上负起更大责任?

中国是自2003年起应美方要求斡旋半岛核问题并且主持多边谈判的。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朝核这个涉及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坚决反对核扩散。

自从承担起斡旋责任以来，中方明确要求朝鲜停止核研发，也督促其他各方，尤其是美方，关注和解决朝鲜提出的合理安全关切。然而，美国与朝鲜之间深刻的互不信任使得多年来谈判达成的协议总是得不到落实。中方坚持不懈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努力斡旋，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参加了对朝鲜核导活动的制裁。但是，中国在督促美国和朝鲜承担起应尽责任的问题上缺乏强制力。

中国不掌握解决朝核问题的钥匙，在说服朝方停止核项目上也缺乏关键筹码；而被朝鲜视为安全威胁来源的美国，对朝方安全诉求这个解决核问题的关键条件不愿予以考虑。美朝双方的意图南辕北辙，致使朝鲜半岛核问题陷入困境。朝方伺机推动核导发展进程，2005年以来已经进行了五次核试验和难以计数的导弹试射。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也层层加码，美韩针对朝鲜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不断升级。半岛对抗和对立的气氛日趋紧张，和平谈判迟迟无法重启，目前的局势相当危险。

在国际舞台上，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享有国际法赋予的主权权利。强国通常拥有比较大的主动权，同时也必须承受自己言行所引发的结果。小国或弱国会对强国的压力做出反制性应对，同样也会付出代价。国际形势就是在国与国之间对具体问题的处置和应对所引发的波澜涌动，国家之间出现的紧张关系往往会在这个过程中相互折冲，甚至导致局势走向与预期不同的方向。因此，中国方面认为通过和谈解决核问题是一个“帕累托最优选择”。虽然不能满足当事各方的最高诉求，但却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利益最大化，当然这也需要各方都承担责任，都做出应有的妥协。目前和谈未能取得成效，恰是由于已达成的协议得不到全面执行，并由此导致谈判的中止。

无论过去还是将来，为了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支持通过对话妥善解决朝核问题。半岛南北双方间只有一线之隔，又都是中国的近邻，中国与朝鲜的边界线长达1300公里，如果半岛双方发生武装冲突，必然危及地区和平，导致大量无辜平民的严重伤亡，并且使事态滑向难以掌控的方向。过去几十年在世界许多地区发生的轻率动武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

本文试图梳理近年来朝核谈判的经纬，包括从三方会谈到六方会谈再到会谈破裂的历程，所讲述的事情有些是我亲身经历的。本着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面目的态度，我希望帮助人们了解：事情何以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和谈成功的机会何以被一再错过？但愿这些回望可以为将来更明智的选择提供借鉴。

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打开朝核问题的“锈锁”，还是要找到那把钥匙。

《美朝框架协议》与第一次朝核危机

说到中国在朝核问题中扮演的角色，2003年是一个分水岭。关于朝核问题的国际多边解决机制在这一年诞生，中国被卷了进来，成为多边谈判的重要斡旋者。在此之前，朝核问题一直是由朝美两家在谈。事情要从2003年2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华说起，当时我作为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参加了他在中国的一些日程。鲍威尔来中国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是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2003年1月10日，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是海湾地区局势紧张，美国对伊拉克军事行动已箭在弦上。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为避免陷入中东和东亚两线压力，派鲍威尔到中国游说。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会见了鲍威尔一行。鲍威尔提出希望中国出面斡旋朝鲜核问题，并表示美方无法再相信朝鲜，但是愿意采取多边方式寻找解决办法，建议由中国邀请美国和朝鲜派代表来北京“谈一谈”。

朝核危机之所以在此时爆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美朝框架协议》）没有得到执行，导致双方关系破裂。时至2003年，美国并未在指定时间用两座1000兆瓦轻水反应堆替换朝鲜的石墨核反应堆和其他相关设施，而朝鲜也没有完全履行协议。其背景则是朝鲜半岛局势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风起云涌和相关国家关系的演变。正如《美朝框架协议》这一名字所体现的，美国和朝鲜是这段历史的主角。

考察朝核问题的根源，需要追溯到对朝鲜战争的战后处置，这场战争从法律意义上讲，至今没有正式结束。

1953年7月27日，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为一方，以联合国军总司令为另一方，双方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但是那只是一纸停战协定，而非和平条约，也就是说，相关国家虽然休战了，但仍处于战争状态。这是朝鲜半岛局势长期以来稳定不下来的重要根源之一。

停战协定签署之后，以北纬38度线为军事分界线，朝鲜半岛一南一北继续处于分裂状态。南方即大韩民国，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扶持，北方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其背后则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朝鲜半岛成为全球冷战和美苏争霸的前沿。在美苏对峙相对处于均衡的状况下，朝鲜半岛在相当长时间内基本上是平静的。

战后朝鲜半岛军力部署基本上是南方占优。美国在韩国保留了驻军，并于1957年起部署了包括战术核武器在内的一系列进攻性武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美苏核裁军倡议的实施，美国全部撤出在半岛的核武器，改由美军在美国本土和太平洋总部辖区的核力量承担对韩国的核保护义务。

冷战初期，面对巨大的外部生存威胁，朝鲜选择主要依靠苏联获得安全、经济和能源的保障和支持，并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有限的核研究。1959年，朝鲜建立了以和平利用核能为目的的宁边原子能研究所；1965年朝鲜拥有了自己第一个2兆瓦的小型轻水反应堆，此后苏联专家便回国了。需要提到的是，当时的苏联无意帮助朝鲜进行核武器的研发，在向朝传授核物理知识时并没有提供铀浓缩和钚生产技术。

20世纪80年代，朝鲜开始建造一座5兆瓦电功率的天然铀石墨气冷堆，反应堆建成后可以年产6公斤武器级钚。从这时起，美国开始注意到朝鲜发展核能力的意图，并在1985年通过向苏联施压，敦促朝鲜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作为交换，苏联与朝鲜签署了经济、科学与技术协定，承诺提供新的轻水反应堆。但后来苏联并没有履行该协议，而朝鲜在加入NPT之后也没有按条约履行过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的“义务”。

进入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衰落和解体以及冷战的终结彻底打破了半岛的均势，朝鲜陷入极度的无依靠和不安全感，国家面临一种“系统性困局”。经济上，朝鲜失去了来自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工农业生产

一落千丈。而韩国经济则在20世纪70年代起飞，并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

1991年9月17日，第46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的决议。1991年《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到期，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没有声明自动续约（进而在1994年宣布废止该条约）。1991年10月5日，金日成主席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苏联垮台后的国际形势和对策。邓小平在会见时表示，中国此阶段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主要是观察，少露锋芒，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成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当时中国早已脱离苏联阵营，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要扛起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大旗。

接踵而至的是1992年8月中韩建交，当时中韩两国各方面的民间交往已经在快速扩展，建立外交关系势在必行。而朝鲜显然对此感到不满和失望，也更加孤立。此后中朝高层互访几近中断，直到1999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访华方得以恢复。

时至今日，人们也许仍不能对当时朝鲜深重的危机感有足够的了解。需要认识到的是，20世纪90代年初的一系列变故深深刺激朝鲜决定“走自己的路”，这包括在安全问题上的“核选择”。在这一系列变故中，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则是：苏联/俄罗斯和中国，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主动顺应潮流，改善和发展了与韩国的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半岛停战直接当事方之一的美国，没有采取明显的对应措施改善与朝鲜的关系，它的盟国日本也没有，从而错过了“交叉承认”“恢复外交关系”的良机。

1990年前后，美国根据卫星图片判断朝鲜正在秘密研制核武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要求依据《核不扩散条约》（NPT）对朝鲜进行核查。1992年5月至1993年2月，朝鲜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6次不定期核查，但双方对检查的对象和结果意见不一。1993年3月美韩恢复曾于1992年暂停的“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而此时国际原子能机

构提出要对朝鲜进行“特别核查”。面对双重压力，朝鲜宣布退出NPT，这导致第一次朝核危机的爆发。当年4月1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将朝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而朝鲜则认为，朝核问题本质是朝鲜同美国之间的问题，而非朝鲜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间的问题，因此只能由朝鲜和美国通过协商解决。

1992年美国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上台后，由于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判断自身面临的最现实和最直接的安全威胁是日益增长的核武器与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在此背景下，如何解决朝鲜核问题成为克林顿政府在亚洲面对的首要课题，美国开始重新审视朝鲜半岛局势。

在美国，施压和强硬立场一度占据主导地位。1994年6月16日，参议院通过决议敦促克林顿采取行动，让美军做好“威慑，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击退朝鲜袭击”的准备。但经过评估，美认识到对朝采取军事行动会引发朝军对韩国的攻击，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就在美商讨和评估军事方案之际，美国前总统卡特赴平壤访问，并面见了当时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并传回了朝方愿就核问题与美国谈判的信息，这促使克林顿政府改变态度，选择了谈判的路径。

自1993年6月起，朝美双方分别在纽约和日内瓦进行了三轮高级别会谈，双方最终签署《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朝鲜同意放弃处在建设过程中的两座石墨反应堆。作为补偿，美国将组织和领导一个国际财团，以融资方式在尽可能早的时间内向朝鲜提供价值40亿美元、总发电能力为1000兆瓦的两台轻水反应堆。为解决反应堆替换过程中的能源问题，美国将每年向朝鲜提供50万吨重油。在上述整个过程中，主要是朝美直接谈判，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并未参与。

《美朝框架协议》签署后，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了下来，但是协议的落实工作进展缓慢。美国牵头成立了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

（KEDO），从国际上募集了一些资金开始向朝鲜运送重油，以帮助朝鲜弥补能源短缺造成的困难，宁边反应堆中8000根废燃料棒则被取出封存。然而美、日、韩帮助朝鲜拆卸石墨减速反应堆并为其建设轻水堆的工作却一拖再拖，没有落实。

可以看到，克林顿在第一任期内成功化解了第一次朝核危机，在第二任期，他试图通过与朝鲜加强接触来彻底解决核问题。1999年10月，美国官方发布了《美国对朝政策评估：成果与建议》，指出要“采用全面、综合的方式应对朝鲜核武及弹道导弹项目，以双边谈判为核心手段，辅以与日本和韩国的三边协调”。但是在对具体承诺推进的过程中，双方却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意愿和行动力，框架协议中的大部分内容未能及时得到落实。

到了克林顿执政的后期，朝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一度打开了一条缝隙。2000年10月9日，朝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赵明录作为金正日特使访问美国。10月23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对朝鲜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历史性访问，并与金正日会面。奥尔布赖特访朝期间，向朝鲜领导人转达了克林顿总统对改善美朝关系的设想，与朝方就朝鲜核导问题以及将朝从“支恐名单”中删除进行了讨论，并就互设联络处和将联络处升格为外交代表处问题进行协商，也探讨了安排克林顿访朝的可能性。

奥尔布赖特回国后，美方甚至把安排克林顿访朝、进而促成金正日访美提上了日程，但由于美国当时已进入总统换届周期，跛脚状态中的克林顿政府没有时间和精力实现这个愿景了。据奥尔布赖特回忆，就在离开白宫前一天克林顿还向她表示，自己应该去平壤，而不是留在华盛顿为巴以问题做最后的斡旋。

多年后笔者与奥尔布赖特就此交换过意见，说到那时也许是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机遇，可惜错过了。

从第二次朝核危机到三方会谈、六方会谈

克林顿政府曾希望新一届美国政府能够沿着自己任上开创的涉朝问题“新局面”走下去。然而，在2000年大选中胜出的共和党新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小布什）被新保守主义分子包围着，他在竞选期间就不断批评《美朝框架协议》，更是把矛头指向朝鲜政府，抨击对朝接触政策反而帮助这个政权避免了崩溃。显然，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把“弃核”和“政权崩溃”搅合到一起考虑，以致于常常混淆了哪个是主要目标。而平壤很难理解这些变化，因此他们认定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是认真的。

小布什总统上任伊始就重审对朝政策，推翻了克林顿政府改善关系的政策。八个月后，2001年9月，美国发生了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美国政府宣布发动“反恐战争”。值得一提的是，“9·11事件”后，朝鲜外交部发言人在第一时间表态，说这是“令人惋惜和悲剧性的事件”，强调“作为联合国的成员，朝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对其的支持，这一立场不会改变”。朝鲜的这个表态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对美强硬姿态，但小布什政府没有给予理睬。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小布什总统将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国家。

2002年10月，美国情报部门宣称发现了朝鲜的秘密核计划，并掌握了朝鲜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技术和设备采购的证据，将朝鲜与巴基斯坦秘密核交易的证据一并曝光。小布什政府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紧急赴朝，在与朝副外相姜锡柱的会谈中，他当面拿出朝鲜进口用于铀浓缩离心机的“证据”，而姜毫不掩饰，亲口承认这一切都属实。

这件事引发美国朝野震惊。看起来，朝鲜在声称放弃研制以钚为原材料的核武器的同时，又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偷偷研发以铀为原材料的核武器。小布什政府认为朝鲜背弃了《美朝框架协议》，

由此宣布终结双边谈判，而在朝鲜看来，美国方面也没有履行框架协议中的全部承诺。这次关系的破裂直接触发了第二次朝核危机。

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开始拉盟国一道在东海、黄海至印度洋一线实施“防扩散安全倡议”（PSI）。2002年12月，在美国授意下，西班牙海军在也门外海拦截了载有“飞毛腿”导弹的朝鲜货船“小山号”，后来，在得到也门政府做出仅供本国使用且下不为例保证的基础上放行，是为“小山号事件”。

2002年11月14日，美国主导的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KEDO）决定停止向朝鲜运送重油。朝方则认为美国中止供油属于违约，并于12月12日宣布，将重启根据《美朝框架协议》冻结的核计划。2003年1月10日，朝宣布正式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核武器扩散，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并彻底销毁核武器。同时，中国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分歧。既然《美朝框架协议》执行不下去了，而美国又希望中方能够出面斡旋，帮助解决问题，并派国务卿鲍威尔到北京来游说，经过慎重研究，并考虑到促朝弃核也符合中方利益，中国政府决定接受美方的请求。初步考虑邀请朝美双方来中国进行三方会谈。鲍威尔访华后，中方于2003年春派特使访朝，虽不乏困难，但访问基本上是成功的，朝方同意尝试三方会谈。但朝鲜的根本立场并没有改变，还是希望与美方直接谈，理由是核问题由美国对朝安全威胁引起，要解决也必须是朝美直接达成协议。中方把朝鲜的要求和意见转达给了美方，而美方则坚持不能再与朝鲜单独谈，任何会谈必须在有中方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朝美双方的要求是完全拧着的，中方抓住“谈”这个基本共识，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居中斡旋，终于双方都同意派代表到中国来谈一谈，美方与朝方可以在三方框架内接触。

中国外交部于2003年4月22日发表了公开信息，表示：“中方一直主张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这也是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的共

识。基于上述共识，将邀请朝鲜和美国派代表团来中国进行会谈。”中方通过积极介入，把各方拉回到了谈判桌前。从2003年4月到2007年10月，举行了一轮中、美、朝三方会谈和六轮有韩国、日本、俄罗斯加入的六方会谈。过程充满曲折，但对话使得朝核态势基本维持在可控范围内。六方会谈中所形成的三份文件——2005年的《9·19共同声明》、2007年的《2·13共同文件》和《10·3共同文件》——为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打下重要的政治基础。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协议在达成后却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变故往往得不到执行，会谈常常陷入破裂，局势一再地卷入螺旋上升的紧张状况。

2003年4月23至25日，中朝美三方会谈在北京举行，我作为当时的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与朝鲜外务省美国局副局长李根和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凯利分别率团与会。

但是会谈还未正式开始便戏剧性地遭遇僵局。小布什总统有令在先，禁止美国代表团成员同朝方单独进行任何形式的会面，而朝方则希望能与美方单独谈。三方会谈的前一天晚上是中方主办的宴会，美朝代表都出席了，席间，朝方谈判代表李根借敬酒的机会与凯利单独说话，直接告诉美方，朝鲜已经对乏燃料棒进行了后处理。凯利随后把李根对他讲的话转述给笔者，生气地说，他需要请示华盛顿如何应对。第二天早上美方代表团声称，不能与朝进行任何直接接触了，只能三方一起谈，朝方代表团则因此而拒绝出席三方会谈。经过中方居中反复劝说，朝方放弃了退出会谈的打算，但是三方会谈实际上也只是中方分别与朝方和美方谈。

这次三方会谈的尝试虽然艰难且不令人完全满意，但朝美两国回到了谈判桌前，让国际社会看到了外交对话的可能性，紧张气氛开始降温。朝方提交了一份以放弃核开发和导弹试验换取美日韩经济援助和体制保证的“一揽子计划”，这个方案体现了朝鲜的基本立场和思路，实际上成为以后几轮会谈朝方方案的基础。

三方会谈吸引了韩国和日本的强烈关注，国际社会对会谈也更加关注。美要求扩大多边会谈，让韩日加入进来，对此中方没有感到困难，同时认为也应该让俄罗斯加入。面对各方释放的信号，中国继续发挥作用，进行了大量静悄悄的外交斡旋活动，穿梭访问，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围绕核问题，朝鲜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即：朝鲜面对美国敌视政策，需要发展核武器来保障自身安全，朝鲜对美方已经无法信任。而中方表示坚决反对朝鲜走拥核的道路，但是可以理解朝鲜安全关切，支持多边谈判寻求和平解决办法，而且愿意承担沟通协调并主办更多会谈的责任。

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成为朝鲜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和援助国，朝方需要维系两国合作关系，认识到应尊重中国这个友好邻国的意见，对中方的和谈建议难以回绝。而美国方面的态度则是非常强硬，小布什政府的立场是：保留军事解决的选项，如何选择要看朝鲜参加谈判的表现。中方向美方转达了朝鲜的意见，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清晰的立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采用军事手段的企图，但是可以支持通过和平谈判找到解决核问题的妥协方案。

由此可见，无论是美方还是朝方，各自都有两手打算：美方是可以谈，不行就打；朝方是要么谈出一个结果，要么拥核自保。而中方采取的策略是全力推动谈判，同时坚决打掉双方另外的企图。

笔者记得在一次访问华盛顿的过程中，美方一再表示："可以谈，但是军事解决的手段也在桌子上。"（We can talk，but the military option is also on the table.）中方不同意，强调如果美方坚持保留军事解决的选项，朝方就要坚持保留拥核的选项了。后来，美方对措辞做了调整，表示"军事解决的手段还没有离开桌子"。（The military option is not off the table。）这个说法和前面的提法相比似乎没有太大区别——尤其是对不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但美方很坚持，说这是总统的意思。笔者曾经开玩笑地问美方同事，如果"没有离开桌子"，又不

在桌子上面，会是在哪里？他说，你可以发挥想象力。而当笔者把这个话转述给朝方代表李根时，对方瞪大了眼睛问："那是在哪里？"

2003年7月，与朝鲜打过多年交道的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作为特使先后访问朝鲜和美国，劝说双方重启对话。在朝鲜，戴秉国一行在与朝方同行长时间会谈之后，受到金正日的接见。会见结束时，金正日说："既然中国同志说可以再谈，那我们就再试一试吧。"

这一轮斡旋的结果是，美方同意派代表团尽快到北京来谈。在形式上，美方希望能让韩日都加入进来，也不反对中方建议的让俄罗斯参加。如果朝鲜希望三方谈，美方同意再进行一次三方会谈，但坚持必须紧接着就进入六方会谈。中方把美方的意见转达给了朝鲜，朝方的回应很痛快，说，只要美方同意与朝方直接接触，其他要求都可以同意，也不妨就直接进入六方会谈。

鉴于朝核问题的敏感性和朝美对立的严重性，六方会谈会场的设计和布置都成为困难的政治问题。由于六个国家关系微妙，无法安排在长条桌子对面，我们把桌子围成一个六边形，这样每个代表团都可以坐在桌子的一边，不存在主次关系。会谈确定在钓鱼台国宾馆宽敞的芳菲苑进行。

更难的是如何安排朝美对话。朝方高度重视与美方的双边接触，要求必须在独立的空间与美方谈；而美方则坚持不能在单独的房间谈，美朝接触时须与其他代表团"在同一个屋顶下"。我们想出办法，在芳菲苑大厅的角落用屏风、绿植和沙发隔出几个独立的喝茶空间，用于会间休息，其中一个专门保留给朝美代表团对话用。

我们分别邀请了朝鲜和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官员来考察，他们都认可了，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其实后来美朝对话越来越重要和深入，他们主动要求转入了"单独的房间"。

2003年8月27日至29日，第一轮六方会谈在北京召开，由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主持开幕，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任中方代表团团长。参加第一轮六方会谈的各国代表团团长是：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朝鲜副外相金永日、俄罗斯副外长亚历山大·洛修科夫、韩国外交通商部次官补李秀赫、日本外务省亚洲和大洋洲局局长薮中三十二。

朝方仍坚持一揽子解决核问题，提出的方案主要分为四个阶段，每阶段都要求美国“同时行动”。

美方则强调朝鲜应迈出第一步，须首先以“全面、不可逆转和可验证”的方式弃核，然后才能讨论其安全保障问题。

当年一则来自利比亚的声明引人注意。那年12月，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宣布“彻底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全盘交出了手中的核研发成果。美国随即解除制裁，摘掉了利“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帽子，并建立了外交关系。一时间，利比亚成了西方国家眼中消除核生化武器和远程导弹的“模范生”。也许美国曾试图以此为例打动朝鲜，但八年后利比亚局势的剧烈变化及其后果对朝鲜在核问题上的态度产生了反向的影响。

2004年2月25日至28日，第二轮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会谈焦点在于解决核问题的目标和第一阶段措施。会谈中，美坚持朝应同利比亚一样，先放弃核计划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中、俄、韩三国则倾向“乌克兰模式”，主张若朝主动弃核，应尊重其主权并给予安全保障。

本轮会谈通过了六方会谈启动以来发表的第一份书面文件——《主席声明》。声明强调：各方表示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核问题；各方表示愿意和平共存，并同意采取协调一致的步骤解决核问题及其他关切。

2004年6月23日至26日，第三轮六方会谈召开。朝方仍坚持“冻结换补偿”，但首次表示冻结是为了最终弃核。美方也展现一定的灵活性，提出了五阶段的弃核方案。第三轮会谈虽然没有实质性协议，但是最终达成了“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按照口头对口头、行动对行动”原则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共识。这是中方在开启六方会谈以来就反复强调的，要求美朝相互同时迈出步伐。

第四轮六方会谈与第三轮间隔了13个月之久。导致会谈中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小布什政府在连选连任前后对朝态度更趋强硬，多次将朝鲜领导人称为“暴君”，将朝鲜称为“暴政前哨”，导致朝鲜退缩。另一个原因是，韩国在2004年9月初承认曾秘密提炼武器级钚和浓缩铀材料，这引起朝方强烈不满。2005年2月10日，朝鲜宣布已经制造出核武器，并无限期中止参加六方会谈。美国则在6月底首次对朝实施金融制裁。

中国并未放弃斡旋，13个月后朝鲜同意重返六方会谈。第四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会议和第二阶段会议分别于2005年7月26日至8月7日和9月13日至9月19日在北京举行。这轮六方会谈最大的成果是在9月19日达成了《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以下称《9·19共同声明》）。这是一份成功地凝聚了各方共识的重要文件，其意义在于：朝鲜首次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韩国也明确表态不发展核武器；美国同意在适当时候讨论向朝提供轻水反应堆；美、日首次正式承诺将采取步骤实现与朝鲜关系正常化；首次谈到朝鲜半岛和平机制问题和东北亚安全问题。

这是六方会谈以来达成的第一份共同声明，作为解决朝核问题的路线图，《9·19共同声明》让人们看到了一线曙光。但曙光却又很快被美国对朝鲜金融制裁的乌云所遮蔽。

2005年9月23日，几乎就在六方会谈进行的同时，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美国财政部根据情报机构提供的信息，公开指责澳门汇业银行

替朝鲜在该行开设的多个账户“洗钱”“流通伪钞”，所获资金用于“支持恐怖主义”。此前的9月9日，美国已提出冻结朝在澳门汇业银行的2500万美元资金。10月21日，美又宣布将8家朝鲜企业列入黑名单，冻结其在美资产。汇业案虽然表面上看与朝核问题没有直接关联，但对朝核问题的解决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11月9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会议时，朝鲜代表团仍如期而至。但在第一阶段会议之后，美国于12月开始对朝实施金融制裁。面对美国不断加大的制裁力度，朝鲜公开声称，若美不肯取消经济制裁，将不再重返六方会谈。而美国没有松手，2006年4月美国财政部进一步加大了对朝鲜的制裁力度。

由此开始，今天已被人们熟悉的围绕朝核问题的“制裁—试验—再制裁—再试验”的恶性循环开始了。美国不断升级的制裁没能阻止朝鲜升级武器试验的步伐，2006年7月5日，朝鲜向日本海试射7枚导弹，10月9日，朝鲜宣布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

2006年10月14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5票赞成一致通过了美国提出的1718号决议。决议要求：所有联合国成员对朝鲜实施与核武器及技术、大型武器和奢侈商品有关的禁运；要求朝鲜不再进行核试验，暂停与弹道导弹有关的所有活动。

2006年10月，中方与六方会谈其他成员展开了新一轮密集磋商和协调。终于在11月1日，朝鲜宣布重返六方会谈。同期，美国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在参众两院同时占据多数，力主对外逞强和军事冒险的“新保守主义”在美国退潮，对朝强硬势力在小布什政府中的影响也随之下降。

2006年12月18日至22日，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召开。2007年2月8日至13日，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三阶段会议在北京继续进行，会谈的最大成果是通过了共同文件《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

（以下称《2·13共同文件》）。《2·13共同文件》主要包括一系列平行行动，包括朝方以最终废弃为目标关闭并封存宁边核设施，以及申报和最终放弃全部核项目。朝美将开始双边谈判，美将启动不再将朝列为支恐国家的程序。其中，朝鲜同意申报所有核计划是一个很大进步。

《2·13共同文件》签署后，半岛局势出现了一定程度好转，朝韩部长级对话恢复，2007年3月1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赴朝，商讨关闭和封存宁边核设施的具体细节。同日，朝鲜副外相金桂冠访美，这是凯利2002年10月访朝后，朝鲜对美国的一次“破冰之旅”，也是朝美第一次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开展谈判。

与此同时，对朝制裁日益成为阻碍《9·19共同声明》和《2·13共同文件》履行的障碍。朝鲜坚持将取消制裁作为关闭宁边核设施的一个先决条件，但美方却不能同意。

2007年3月，在第六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会议于北京召开之际，美方宣布汇业银行涉朝资金将被转账到中国银行，朝鲜承诺将这笔资金用于人道主义和教育。中间的一个插曲是，由于某种“技术问题”，这笔钱并没能马上转入中国银行账户，而朝鲜认为己方已经履行了相应义务，在澳门汇业银行问题中没有尽到义务的是美国，因此在澳门汇业银行问题解决前，朝“不会采取下一阶段措施”。直到6月25日冻结资金问题得到解决，朝才开始恢复履行《2·13共同文件》。7月14日，朝鲜关闭宁边核设施，韩国提供的6200吨重油抵达朝鲜。同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朝鲜，前往宁边地区监督和验证关闭核设施。至此，应该说，朝核问题的解决终于开始迈出重要的步伐。

2007年9月1日，美朝工作组在日内瓦举行会谈。朝方表达了申报所有核计划和“去功能化”的明确意愿，美方则承诺把朝鲜从“支恐国”名单中去掉。但是，在9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上，小布什总统发表演

讲，将朝鲜等国称为“残酷政权”（brutal regime），表明美国对朝鲜政权的态度仍然相当负面。

2007年9月27日到10月3日，第六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进行。六方签署了《“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共同文件》（以下称《10·3共同文件》），“去功能化”和“申报”是两大重点。其中要求朝鲜：一、对宁边原子能研究中心5兆瓦实验性反应堆、后处理厂（放射化学实验室）及核燃料元件制造厂进行去功能化；二、在2007年12月31日前对其全部核计划进行“完整、准确”的申报。《10·3共同文件》还对美朝、日朝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提出了要求。11月5日，宁边三个核设施开始去功能化。

但到了2008年1月，朝鲜在去功能化完成了75%后，其他国家提供的重油、设备和物资援助并没有到位，朝方开始犹豫，并以此为由，放缓了去功能化步伐。

与此同时，申报开始成为新的争议焦点。美朝在申报问题上主要存在三点分歧：一、钚材料数量；二、朝鲜是否存在浓缩铀项目；三、朝鲜与叙利亚是否存在核合作。由于这些分歧和争议的存在，朝鲜并未按照规定在2008年1月1日前完成申报。

经过各国间多轮磋商，以及美朝于2008年3月和4月在日内瓦和新加坡会晤，双方在申报和将朝鲜从“支恐国”名单除名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朝鲜提交了宁边反应堆运行记录，美国可以此为依据计算朝鲜的钚数量。美国对此举是充分肯定的，称之为核查朝鲜核计划的“重要一步”。美国的义务则是在45日内将朝鲜从“支恐国”名单中去掉。

但是，就在朝鲜提交申报书当天，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提出“验证”问题，要求对朝鲜申报予以核查。朝鲜强烈反对美国将验证与“除名”挂钩的做法，而且提出，《10·3共同文件》并未包括验证条款。8月11日，鉴于美国并未在45天内完成将朝鲜

从“支恐国”除名的承诺，朝鲜宣布“暂停去功能化作业，同时考虑按原状恢复宁边核设施”，并驱逐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人员，局势骤然紧张。直至10月初，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美方代表团团长希尔访问朝鲜，美朝就验证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宣布将朝鲜从“支恐国”名单中除名，朝鲜随后重新启动去功能化作业，表示接受去功能化阶段验证措施。

至此，在过去6年左右的时间内，六方会议虽然周折和反复不断，在顿挫中艰难前行，但总体上维持了半岛稳定，更重要的是坚持了无核化和谈判解决分歧的大方向。但是这个进程未能持续下去。

2009年至今朝核问题的螺旋式升级

截至2016年11月，朝鲜已进行了五次核试验，其中第一次是在2006年，发生在因汇业银行问题和美方制裁而导致六方会谈中断之后。此后的四次都发生在2009年之后，而这期间六方会谈由于事态发展的步步升级、不断激化的恶性循环而完全陷入停滞。

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此前大约一年，主张对朝强硬的李明博接替卢武铉成为韩国总统。同过去一样，相关国家领导人变动再次给半岛局势带来了新的变化和不确定性。

新上任的奥巴马政府认为，朝鲜在小布什政府的后期已逐渐偏离了《9·19共同声明》和《2·13共同文件》中所做的承诺，在“欺骗和讹诈美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反对美国与朝做交易的声音开始在华盛顿形成“政治正确”——特别是在军界和国会。另外一个特殊的背景是，奉行自由主义世界观的奥巴马在竞选时反复强调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并提出构建“无核世界”的主张，上任后更把推动国际核裁军和倡导全球核安全合作当作颇为优先的外交议程。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

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在朝核问题上不可能沿着小布什执政末期那种与朝鲜达成妥协的路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很难完全走上示强的道路。

奥巴马在2009年1月20日发表的就职演说中对“美国的敌人”们宣称：“如果你们愿意松开拳头，我们就会向你们伸出手。”这一表述让人印象深刻。希拉里·克林顿在出任国务卿前的参议院听证会上的发言，也显示出奥巴马政府在处理美朝关系时会比小布什政府采取更为灵活和开放的措施。

然而，朝鲜对这种缓和姿态没有马上给以积极回应，入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导致局势骤然升级。2009年3月，朝鲜扣留两名在中朝边境地区采访时未经允许进入朝境内的美国女记者，同年8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赴朝斡旋带回了她们。4月5日，朝鲜宣布发射“光明星2号”试验通信卫星，紧接着在23日宣布退出六方会谈。4月25日，朝鲜外务省宣布，已开始对从试验核反应堆中取出的乏燃料棒进行再处理。5月25日，朝鲜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朝鲜采取这种强硬姿态，显然是根据对形势的研判对继续和谈失去了兴趣，更加倾向于走拥核的道路。很难判断朝鲜这样做是因为韩国的政治变化，还是对六方会谈失去了信心。

2009年6月12日，安理会以15比0全票通过第1874号决议，对朝鲜核试验表示“最严厉的谴责”，要求朝鲜立即全面执行第1718号决议。决议还对限制朝鲜进出口武器、检查进出朝鲜的船只、在公海检查与朝鲜有关的船只及防止外部资金流入朝鲜并被用于研发导弹和核武器等，做出明确规定。

2009年10月4日至6日，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平壤，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举行会见，期间再次做了劝说工作。随后形势在2010年1月出现些许缓和，朝鲜表示愿意在六方会谈框架内与美方签订和平协议，条件是六方会谈前先取消对朝鲜制裁。美方则要求先重启六方会谈，在会谈框架内讨论缔结和平协定的问题。

2010年3月26日，“天安号事件”爆发。韩国载有104人的“天安号”护卫舰在黄海朝韩两国争议海域白翎岛和大青岛之间巡逻时，船尾发生不明原因爆炸后沉没，造成46名船员遇难。美韩立即指责是朝鲜潜艇向“天安号”发射鱼雷造成爆炸沉没，但朝鲜从未承认是自己所为。俄罗斯参加了事后开展的国际调查，而中方没有参加。

此事导致韩国宣布中断与朝鲜的贸易、交流与合作。这一突发事件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各方不信任，并造成半岛局势再度滑向新的紧张状态，尤其美韩此后对朝鲜的不信任感和对立情绪日益深化。

2010年5月12日，据朝鲜《劳动新闻》报道，朝鲜科研人员在开发核聚变反应技术方面取得了“值得自豪的成果”。在韩美外交和国防部长“2+2”会谈后不久，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以支持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朝鲜5家实体和3名个人实施制裁。

这期间中方不间断地做工作，力图恢复六方会谈。2011年3月15日，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表示，朝鲜将无条件地参加六方会谈，且不反对在六方会谈中讨论铀浓缩问题。2011年10月，朝分别与韩国、美国、俄罗斯代表会谈，表示愿意无条件重返六方会谈。但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突然病逝。

还有一件发生在2011年的国际大事需要提及。这一年2月，作为“阿拉伯之春”的一环，利比亚出现反对卡扎菲的示威游行，并很快演化为内乱。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973号”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3月19日起，法、英、美等西方多国对已经在2003年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利比亚发动空中军事打击。10月20日，卡扎菲在苏尔特落入反对派手中后惨死，而卡扎菲在动荡局势下的最后演讲中提到，金正日会看着我笑。确实，朝鲜密切关注着利比亚的事变，朝鲜《劳动新闻》4月18日发表文章宣称，“近年来，迫于美国的强权和压力而中途弃核的一些国家的悲惨遭遇，更加明确地证实了朝鲜的选择何等明智和正确”，“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和民族的自主权”。

利比亚局势和“阿拉伯之春”或许对朝鲜沿着核道路走下去有所影响，但当时朝鲜仍然同意继续对话，直到2011年底金正日去世之前，他一直强调“无条件重启六方会谈”的立场。金正日的小儿子金正恩接班之初，围绕朝核问题的沟通仍沿着金正日去世前的轨道行进。

2012年2月23日至24日，在六方会谈一时仍无法重启的情况下，朝美第三次高级别会谈在北京举行。双方再次确认履行《9·19共同声明》，认为在签订和平协定之前，停战协定是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双方同意同时采取一系列建立信任的措施，以改善朝美关系。

2月29日，朝、美两国分别同时公布了在北京达成的协议内容，此即后来人们所说的“2·29协议”。双方分别公布的内容并不一致，但综合起来大体包括：朝暂停核试验和远程导弹试射，暂停铀浓缩活动，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进行核查监督；美方表示不敌视朝鲜，愿意改善关系，扩大交流。美将向朝提供24万吨营养食品。

在此后双方讨论落实协议的过程中，对协议是否包括卫星的解释存在差异，朝鲜认为“2·29协议”中暂停远程导弹试射并不包括发射卫星，而美方则坚称是包括的，这可能是最说不清楚的一笔糊涂账。

2012年4月13日上午，朝鲜发射了首颗应用卫星“光明星3号”，美国政府随后宣布将不会履行与朝先前达成的粮食援助协议。5月2日，联合国安理会朝鲜制裁委员会更新制裁名单，新增3家朝鲜实体。5月13日，朝鲜第十二届第五次最高人民会议修改宪法，序言中写道：“金正日同志使我们祖国变成不败的政治思想强国、核拥有国、无敌的军事强国。”

2012年6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指责朝鲜继续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宣布把对朝制裁举措延长一年。12月12日，朝鲜宣布成功发射了第二颗“光明星3号”卫星，外界普遍认为朝鲜发射的是“大浦洞2”导弹。2013年2月12日，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3月7日，安理会一致

通过第2094号决议，对朝鲜实施第三次核试验予以谴责并采取新一轮制裁措施。4月2日，朝鲜原子能总局发言人表示，朝鲜将重新启动曾于2007年关闭封存的宁边5兆瓦石墨减速反应堆。

进入2014年，自韩美“关键决断”联合军演于2月24日启动后，朝鲜频繁发射类似导弹的飞行物及火箭炮。

2015年5月20日，朝发表声明，称该国的“核打击能力已经实现小型化和多样化”。

事态在2016年进一步升级，对立的双方如针尖对麦芒。1月6日，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1月13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在记者会上表示，韩国政府将研究有关引进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即“萨德”系统）事宜。

2016年2月7日，朝鲜宣布用远程火箭发射一颗卫星。3月2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以15票赞成一致通过了涉朝鲜问题的第2270号决议，决定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

2016年3至4月，韩美举行了大规模的“关键决断”和“鹞鹰”联合军演，有超过30万名韩国军人和1.7万名美国军人参加，航母战斗群、战略轰炸机等战略武器也加入演习。无论武器质量还是官兵数量，均为历次军演之最，并将对朝“斩首作战”列为演练内容。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韩几乎每年都举行“关键决断”“乙支自由卫士”“协作精神”等联合军事演习，近些年演习规模日趋增大、针对性日益增强。作为应对和准备，朝鲜往往会动员军民进入战备状态，调动军队布防和征召后备役增强常备军。可以想见，这不仅制造紧张气氛，也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给朝鲜国民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

朝鲜随后五次试射舞水端导弹。2016年6月1日，美国财政部称朝鲜为“头号洗钱机构”，并于7月6日首次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列入制裁

名单。7月至8月，朝鲜又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数枚飞行距离为500千米的导弹。

2016年8月22日，韩美启动“乙支自由卫士”年度联合军演。为了抗议美韩军演，朝鲜又于8月24日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潜射弹道导弹。9月5日，朝鲜再次向海上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9月9日，朝鲜进行了第五次核试验。

在朝鲜第五次核试82天后，联合国安理会于2016年11月30日一致通过了针对朝鲜第五次核试验的第2321号涉朝制裁决议，其中最受关注的部分是对朝鲜最大的重要出口物资——煤炭出口总量设定了限制。中国呼吁各方还是应尽快重启对话，以和平、外交和政治方式解决问题。

回顾奥巴马政府两任的8年，美国总是将朝核问题和朝鲜内政放到一起考虑。确实，媒体关于朝鲜政权“残暴性”的说法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不安。奥巴马采取的是对朝“战略忍耐”政策，其内涵就是，无论朝鲜怎样显示姿态，美国就是不对朝鲜的安全关切做任何实质性回应：你想接触我就跟你接触，但不会谈出什么具体进展，你要对抗我就强化制裁。归根结底是要通过不断地施加压力来促使朝鲜政权垮台，即所谓以压促变。

尽管美国通过纽约、平壤、吉隆坡等渠道与朝保持着秘密和半公开的双边接触，但只要朝拒绝拿出弃核姿态，这种接触的作用就十分有限。2009年以来的事态显示，奥巴马政府这种隐形的强硬对朝政策与朝鲜坚决的拥核意志相遇，彼此负面印证，不仅没有缓解半岛紧张局势，而且成为局势呈现螺旋式恶化的滑轨。

随着朝鲜核导计划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美国对朝鲜的“忍耐”正在被快速消耗。据说华盛顿已经在重新评估朝鲜对美国本土的威慑潜能，至少可以判断，朝最终获得这种能力的“时间轴”是缩短了。而美

国国内政治中的反朝、厌朝情绪日甚，关于朝鲜国内情况的真伪难辨的负面报道充斥媒体，国会里指责奥巴马政府对朝“软弱”“无能”的声音越来越响亮。特朗普执政后，把朝核问题当作在亚洲需要优先处理的安全挑战，从军界、战略界也传出美将与同盟国调整、完善对朝“定点打击”预案的消息。这又给朝鲜半岛的未来蒙上了新的不确定性。

对中方来说，一个新增加的严重关切是，2016年7月8日，美韩宣布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萨德”系统使用的AN/TPY-2型X波段雷达，号称是当今世界上最大、功能最强的陆基移动雷达。根据工作模式的不同，该型雷达的最大探测半径在1200千米至2000千米左右，对于弹体尚未分离的上升段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探测距离在2000千米以上，且能在580千米左右的距离精确评估目标弹头的预计位置或假弹头。

即便基于最谨慎的估计，该型雷达如果在韩国部署，也将能对中国东北、华北、渤海、黄海的部分地区进行照射，这将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破坏东北亚本就十分不对称的战略平衡。考虑到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已经有强大的导弹防御体系，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如果与日本的两部X波段雷达、关岛的“萨德”系统组网或共享情报，并与该地区美、日、韩大量的海基宙斯盾、陆基爱国者系统配合，美国的预警和拦截能力将因此得到大幅加强，这将更进一步地危及到中国的战略安全。

中国还担心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仅仅是美国在亚太以零和方式寻求己方绝对安全的一个新的开端，且已有消息称，美国还意图在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部署“萨德”系统。如此下去，中美间将不得不面对更严峻的战略平衡问题，亚太地区战略领域的军备竞赛将愈发难以避免。

朝核问题将向何处去?

朝核问题下一步何去何从，令人关注。从目前趋势看，有三种局面可能出现：

第一种局面，继续目前“制裁—试验—再制裁—再试验”的恶性循环。朝鲜相对封闭，独立性较强，制裁虽能造成很大压力，但不会使国家撑不下去。而制裁之下的朝鲜更不会放弃核开发，事实上，朝鲜正是在受到制裁后才开始核试验的，五次核试验也是在一次比一次严厉的制裁之下发生的。因此不难判断，这种局面会使朝核问题拖下去，制裁升级和朝鲜核导试验相互刺激的循环反复出现，直到朝鲜核导技术达到“临界点”。届时，反对朝鲜拥核的各方将面临两难选择：是采取极端手段导致不可控的结果？还是容忍朝鲜拥核？

导致上述局面难以改变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朝拥核决心十分坚定。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朝鲜一直受困于外部安全压力，多次参与和平谈判未能获得安全保障，加之这些年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事例，导致其不断明确和强化了拥核自保的选择；二是美不愿在朝核问题上做任何妥协，不能与朝做交易，这在美国各界已成为高度政治共识，特别是在军界和战略界。同时，美国心有旁骛，借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强化在东北亚的战略部署和军事活动，不能聚焦于解决朝核问题。考虑到美国政策的惯性和转弯的阻力，新任总统特朗普是否能摆脱旧的轨道，仍存在疑问。

如同以往，每当美国试图调整对朝政策，选择军事手段的声音就会上升，而每次分析权衡之后，就会意识到无论何种军事方案，都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巨大的平民伤亡，而且结局难以控制。而军事解决选项的存在，也是造成半岛局势不稳定和相关国家间不互信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当前局势不断接近“临界点”，美国对其动作更谨慎的评

估，以及中美和其他相关国家对下步对策更好的协调，就显得愈发重要。

第二种局面是朝鲜政权垮台，这是美韩最期待的。美对朝政权长期采取不认可和敌对的立场，“政权更迭”一直是其对朝政策的主要目标，这也是奥巴马政府“战略忍耐”政策的重要立足点。在很大程度上，美对朝不断加大制裁力度，只压不谈，就是期待能以制裁促使朝鲜内部发生变化。而对朝接触、对话在美国内易被视为助朝稳定，阻碍实现其政权的垮台。这也导致朝鲜认定美国不愿放弃对朝敌对政策，因而要强力应对。但现实情况是，近年朝鲜国内农业和经济进入恢复阶段，民生状况相比最困难时期有了改善。金正恩接任朝鲜最高领导人后已基本稳住局势，虽然朝鲜国内政策和表现令外界反感，但将解决核问题的希望寄托于朝政权短期内崩溃恐难以实现。

第三种局面是恢复对话和认真谈判，使核问题得到缓和甚至解决。应该承认，重启对话并不容易，因为多年来美朝间已极度互不信任，六方会谈的起伏甚至倒退也削弱了各方的信心。但过往的经验证明，对话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对话可以稳定朝核态势，为解决彼此关切创造条件；二是对话是通往达成协议的必由之路。

六方会谈经过艰苦谈判曾经达成《9·19共同声明》《2·13共同文件》和《10·3共同文件》，凝聚了各方最大共识，为政治解决提供了路线图。导致会谈的破裂恰是因为达成的共识和协议得不到贯彻执行，而会谈停滞后才出现朝核问题的不断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朝鲜在发展核导技术上一步一个台阶，朝核问题的现状和谈判的基点已远远脱离了2003年启动六方会谈时的原点。若能再度恢复对话，各方能否现实、理性地接受现实，不预设任何前提地谈起来，这将是决定对话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换言之，任何一方如果刻舟求剑般地试图回到过去，那么对话仍可能无法成功。所以，目前看，中方提出的“双暂停”可以是一个现实的起点。

在2017年3月在中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王毅外长指出："为应对半岛的危机，中方的建议是，作为第一步，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也暂停大规模军演，通过'双暂停'摆脱目前的安全困境，并且使各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之后，按照'双轨并进'思路，将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结合起来，同步对等地解决各方关切，最终找到半岛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换言之，中方提出的"双暂停"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在2017年4月于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及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中，中美双方就朝核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中方重申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表示将继续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涉朝决议。中方介绍了解决朝核问题的"双轨并行"思路和"双暂停"建议，强调希望找到复谈的突破口。中方还重申反对美方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在这次会晤中，双方确认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同意就半岛问题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会晤为中美及相关各方增进了解带来了信心，也为未来在东北亚地区营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安全环境带来了希望。

总之，在半岛问题上，中国的利益在于确保无核化和防止东北亚乃至亚太的和平安全环境遭到破坏，中国的责任在于积极主动发挥作用，以和平方式实现上述目标，最终达成半岛和平协议，与各方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和平、合作的地区环境。同时，中国也要坚决阻止和防止半岛发生大的动荡和战乱。只有坚持对话，用安全换安全，才能走出东北亚安全局势的"怪圈"，避免让东北亚成为一片"黑暗森林"。

---

1. 本文于2017年4月30日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和布鲁金斯学会网站上刊登，在美国引起广泛反响。该文中译文刊发于《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第17期。

朝核问题还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吗？㊟

2017年以来，朝鲜第六次核试验和多次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之后，美国越来越担心朝谋求核打击美本土能力逼近“临界点”，加大武力威慑和战争恫吓，升级经济制裁，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屡次提及的和平谈判却继续空悬。朝核危机升温，成为重大安全挑战。朝核问题还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吗？

自2006年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以来，联合国安理会已经通过了9个涉议，至第2375号决议，朝鲜90%的外贸都遭禁止。据估算，2018年朝鲜对外贸易额可能降至约20亿美元，退回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水平。根据联合国制裁决议，朝鲜每年进口石油不能超过400万桶，相当于中国日进口量的一半。与此同时，美国及其盟友不断施加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吓退了国际上与朝几乎所有的金融、投资、服务等交往。

这些措施使朝鲜陷入极度困难，但并没能阻止其核导计划，反而不断强化其紧迫感。朝更加一意孤行并一再刻意“展示”其在核弹头小型化和弹道导弹技术方面的进步，完全无视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呼声。

朝鲜经济似乎不比过去更糟多少，在过去两年大约增长1%，2016年粮食增产7%，达到481万吨，取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好收成，加上外界人道主义粮援，基本满足人民最低需求。

为何十年制裁没有达到迫使朝鲜放弃核计划的目标呢？原因很多，简言之，对朝鲜而言，此事涉及国家安全，自认为没有其他可靠的选择。而美国及其盟友的政策目标分散，不是聚焦核问题，而是将

关注的重心放在了朝鲜内政问题上，以为朝政权将在制裁的压力下垮台。和平谈判的任何妥协都被视为支撑了这个政权。

现在朝核问题已处于危险阶段，犹如驰入一条黑暗隧道的火车。地区安全和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信誉面临严峻挑战。隧道的尽头恐怕不是问题的结束，而是新麻烦的开始。

出路何在？鉴于导致朝核问题的根源是半岛的敌对状况，美国作为关键当事方，应着力于解扣而非一味刺激对立情绪。在施压和制裁的同时应给予朝鲜其他的生存出路，包括启动和平谈判，做出必要的外交妥协，认真考虑朝鲜的安全诉求。

美国一直把军事打击作为一个选项来讲，实际上问题拖至今日就说明，军事手段代价高昂，后果难以估量和控制，美国很难下战争的决心。然而，美国军事威胁的姿态和关于战争的喧嚣，加剧了朝鲜的不安全感，使得朝坚信寻求加快发展核计划是其自保的唯一出路。这就导致了今天这种令人两难困境，难道美国要继续自欺欺人地拖下去?

在中方看来，制裁是必要的手段，但只有当和谈的大门打开时才能有效果，正如中国外长王毅指出的，实施制裁与促谈应该同步推进。

需要注意的是，现阶段核问题现状和谈判基点已远远脱离2003年启动六方会谈时的原点。但不管怎样，需要抓紧时间了，拖下去代价只会更大。

美国应合理调整自己的政策目标和手段，争取让事态走向和平解决的轨道。中方提出了“双暂停”建议，也即朝鲜暂停核导试验，美韩暂停大规模军演，就是希望在当前困难局势下争取给和平一个机会。

中美协调至关重要。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中美关系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在涉及双边关系的问题上，中美能够妥善处理，避免碰撞。但更大的考验是，两个大国能否真心协作应对国际难题，这要求双方建立更高水平和更加稳定的战略互信。

2017年11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了中方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双方同意致力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重申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不承认朝鲜拥核国地位。

双方同意继续通过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各项涉朝决议，对朝核导活动保持压力，同时推动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解决各方合理关切。双方同意就下步半岛形势发展及中美应采取的措施保持沟通。

不可否认的是，中美也存在分歧。一是中方不认可军事手段。二是中方视制裁是推动和谈的手段，主张聚焦核问题。三是中方反对美国及其盟友部署"萨德"等损害中国安全利益的行为。

中国严格地执行了联合国有关制裁措施。例如2017年2月以来，中方机构连续发出公告，对自朝进口煤、铁、铁矿石、铅、铅矿石、水海产品、纺织品和对朝出口凝析油、液化天然气、精炼石油产品采取了禁止或限制措施，关闭朝鲜实体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合资合作企业以及中国企业在境外与朝鲜实体或个人设立的合资合作企业，也要求全国金融行业对朝方有关个人、实体开展回溯性审查。

这些措施不是没有代价的。许多中国企业在对朝制裁中蒙受大量损失。制裁也使得中朝关系受到伤害。

中国坚持半岛无核化立场，坚决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坚定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中方将继续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保持与美国、俄罗斯、韩国及其他相关各方的紧密协调合作。

朝核问题凸显在东北亚构建新秩序观的必要性。中国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为推动半岛的共同安全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方不愿看到朝鲜半岛生战、生乱、生核污染、生难民潮。战争一旦开启，没有赢家。我们需要以新的视角看待东北亚的安全与秩序，认识到我们的未来命运与共。

美国及其盟友在半岛安全上如果继续秉持零和思维，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给对方生存和发展的机会，那么恐怕永远无法理解妥协的必要性。

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窗口还未完全关闭，目前的危机应被转化为机遇。对朝施压应以更加聪明的方式进行，既要采取多种手段综合有效施压，也要有真诚的谈判建议，包括视朝鲜为平等的主权国家，合理考虑朝鲜的安全与发展关切。

而朝鲜也需要冷静认识当前形势，抓住时机重新回到谈判的道路上来。最近有一些新的动向，朝鲜和美国都在释放一些愿意和谈的信号，只要能谈起来，就有利于避免战争，就有可能找到一条不至于皆输的出路。希望各方都做出一切可能的努力，争取走出这条"黑暗隧道"，进而最终在本地区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安全秩序架构，以使所有国家的安全需求都得到合理保障。

---

1. 本文德语版刊载于德国《明镜周刊》2017年第51期，中英文版由观察者网于2017年12月18日发布。

南海局势

中国为什么对南海仲裁案说不[注]

菲律宾单方提起的南海仲裁案备受关注，在海牙仲裁庭尚未公布最终裁决结果之际，一些西方国家和媒体似乎已经知晓裁决结果将对中国不利，早早开始敦促中方接受裁决。但中国对仲裁案的立场十分明确，即“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中国反对南海仲裁案有充分的国际法理依据，中国这样做不仅是在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也是在捍卫国际海洋秩序的完整性和合法性。

为什么中国拒绝接受和参与仲裁程序？因为中国作为主权国家，有权选择解决争议的方式，这是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同时也是因为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存在滥用争端解决程序、偷换概念和刻意掩盖争议实质的诸多问题，自始就存在瑕疵，因此缺乏合法性。

首先，菲律宾提起仲裁的诉求涉及与中国一些岛礁争议和两国之间的海域划界问题。领土主权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调整范围；对于海域划界问题，中国已于2006年依据《公约》298条规定做出排除性声明，因而不再接受使用强制争端解决程序。

第二，菲方单方面提起的强制仲裁未满足《公约》规定的前置条件。根据“无争议不仲裁”的原则，提起任何强制仲裁前，双方就仲裁事项须确实存在争议。但是，菲方并不能确认这一点，例如菲律宾在仲裁中提出关于单个岛礁法律地位的问题，而中方从未就单个岛礁主张海洋权益，是一直将其当作群岛的组成部分。

《公约》也规定，提起诉讼前相关方须充分交换意见，但菲律宾从未与中国就仲裁事项进行任何沟通。在申诉报告中菲方声称，因与中国的“双边磋商”以及“后续的众多沟通”都“陷入僵滞”无法解决问题而提起仲裁。这不是实话，事实上，是中方一直试图与菲律宾进行有意义的沟通而得不到回应。

因此，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仲裁并未满足《公约》规定的前置条件。此外，菲方单方面提起仲裁也违反了其先前与中方达成的共识，即：双方承诺通过双边谈判和协商解决争议。

为什么中国“不承认、不执行”仲裁庭做出的裁决？尽管《公约》288（4）条款规定，仲裁庭有权决定自身管辖权，但是该条款的适用不是无条件的。国际法中不存在所谓“绝对权力”，仲裁庭作为《公约》制度下的一个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其权威和权力是通过所有缔约国让渡而获取的。如果仲裁庭滥用权力，包括中国乃至国际社会有权拒绝接受裁决。我们不难看到，仲裁庭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过度任性，明显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动摇中国和其他国家对《公约》的信心。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最终结果，但可以确信，仲裁庭在管辖权裁决中没有了解和确认中菲间存在的争议是什么，忽视菲律宾提起该案的目的和诉求的实质，刻意将其视为纯粹的《公约》解释和适用问题，而实际处置的内容又远远超出这个范畴。另外，仲裁庭未考虑南海的特定地理框架和海洋划界态势，也就是中菲两国在相关海域的海洋权益主张上是有重叠的。

鉴于上述，中方做出“不承认、不执行”的决定应是不难理解的。中国作为《公约》的缔约方，支持和尊重其原则和精神，我们反对的不是《公约》和强制仲裁机制本身，而是仲裁庭在审理此案中的滥权行为。

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争端都是由直接当事国之间通过谈判协商解决的。无论是双边、多边谈判，还是通过国际机制解决，其前提都是要直接当事国达成协议或者形成共识。中国对此案的主张和立场符合国际法的基本精神和国际关系实践。

仲裁解决不了中菲在南海的争议，只会刺激对立情绪，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南海沿岸存在争议的国家如不打算激化矛盾，总还需要回到双边谈判解决争议的轨道上来。中国和东盟国家现在都支持通过"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即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争议，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商谈"南海行为准则"的努力也已取得先期成果。这个势头不应被中断。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坚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南海问题的处理事关和平稳定，也事关公平正义。本地区的国家需要共同努力，建立基于规则的合作机制。国际社会应支持中国和其他南海沿岸国以和平方式管控和解决争议所做的努力，尊重中国以谈判解决分歧的选择，维护国际机制特别是《公约》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

1. 2016年7月11日，傅莹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上发文，说明中国为什么不接受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南海仲裁案。7月12日，《环球时报》第3947期刊登中文版。

南海局势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

近年南海问题渐成为关于中美关系的最重要话题，双方在外交和舆论场不断相互喊话，军事上也出现紧张气氛甚至摩擦。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对抗似乎正在通过南海问题展现出来，彼此都开始从战略层面评估对方意图。

最新的话题是“南海军事化”“航行自由宣示行动”，双方国内都出现“武力相向”的声音。而围绕南海问题的龃龉，进一步凸显了双方战略互信的缺失，对抗情绪也在两国社会上扩散。美国学者戴维·兰普顿用“中美关系日益接近一个‘临界点’”来表达担忧。由此可见，南海问题即便不是造成中美关系困境的主要原因，也是一个重要“催化剂”。

对于导致当前局势的原因，中美看法全然不同。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正是由于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南海问题上拉偏架，甚至直接走向前台插手干预，使问题复杂化，让南海议题愈来愈热。而美国方面的声音则认为，中国“不遵守国际法”，在南海搞武力胁迫，意图排挤美国力量，用“切香肠”的渐进模式控制整个南海，让南海变成中国的内湖。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南海问题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部分东南亚国家间历史遗留的局部争议问题，其本源焦点是围绕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权益之争。世界近代史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冷战，在许多亚非拉国家中埋下争端的隐患，像南沙岛礁这种争议在世界上并不鲜见。

20世纪60年代末在南沙附近海域所蕴藏的大量石油被发现，加之联合国的《大陆架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涉及大陆架和专属

经济区制度的陆续出台，岛礁争议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对于南海的关注焦点从岛礁之争进一步扩展到海域划界之争。但南海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局部和可控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度过了“黄金二十年”，合作得到长足发展，经贸关系尤其令人瞩目。自1991年至2010年底，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总额从不到80亿美元增长了约37倍，达到近3000亿美元。这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快速增长，而东南亚除了内部存在困难的个别国家，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总量也都增长了5倍以上。

南海形势是从2009年、特别是从2012年后开始紧张起来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在东亚区域合作经历蓬勃发展之后，南海问题如何走到了今天这一步？这个过程中都发生了什么？显然不是一件事或者一个原因导致事态的变化。那么，是什么事、什么行为导致了什么样的反应和结果？这些是非常值得回顾和审视的。

本文旨在梳理南海局势演进过程中发生的许许多多或大或小的事件，展示出它们之间可能的关联，希望借此反映出问题延展的脉络，为关心南海问题的人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这个问题提供参考，同时也希望能为避免误解的加深和局势的螺旋升级提供一个警醒。

一、日本等国对南沙群岛的侵略和南海诸岛的战后安排

南海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陆缘海，北靠中国大陆和台湾岛，东接菲律宾群岛，南邻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西接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总面积约350万平方公里。南海是连接两洋三洲的要冲，东北部经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等众多海峡和水道与太平洋相连通，东南经民都洛海峡、巴拉巴克海峡与苏禄海相接，南面经卡里马塔海峡及加

斯帕海峡与爪哇海相邻，西南经马六甲海峡与印度洋相通。南海还蕴藏着丰富的渔业、油气等资源，对各沿海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在南海拥有西沙、南沙、中沙和东沙四大群岛，其中，南沙群岛在诸岛中居南，岛礁沙洲最多，散布最广，位于北纬3°40'至11°55'，东经109°33'至117°50'之间。东南向西北延伸达1000公里，分布着大小230多个岛屿、沙洲与礁、滩。当前引发关注的南沙群岛是中国最早发现和命名的，中国最早并持续对南沙群岛行使主权管辖。中国对南沙群岛的认识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唐宋时期，中国对南沙的认识以及在南沙的经营开发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至明清两代，中国已明确了对南沙群岛的主权管辖，当时世界各国出版的权威地图都将南沙群岛列入中国版图。20世纪30年代以前，国际上对中国南沙群岛的主权状况没有争议，世界上有不少地图和百科全书都标明南沙群岛属于中国。

20世纪初，随着西方殖民者和帝国主义者加大对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侵略，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开始觊觎南沙群岛，但他们的企图无一例外都遭到中国晚清政府、民国政府以及民众的强烈反对，大部分侵略举动都以失败告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39年日本为实施控制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南下战略”，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注)

1943年11月，中国、美国、英国三国首脑在《开罗宣言》中写明：“……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1945年7月26日发表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且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日本战败后，民国政府于1946年12月派舰巡视和收复了太平岛、中业岛等南沙群岛主要岛礁，接收了南沙全部岛礁并进驻南沙主岛太平岛。1947年，民国政府重新命名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全部岛礁沙滩名称共159个，并公布施行。同时，民国政府对外公布中国南海疆域图，用11段线标注了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历史性水域范围。此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官方对此未持异议，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影响和民国政府及后来的台湾当局与美国长期保持盟友关系，美国对这一切显然是知晓和认可的。

海峡两岸的分裂、冷战的爆发、全球两大阵营的对立，使得美国政府在南海岛礁归属问题上有了更多权宜的考虑。这首先体现在战后的对日和约安排上，旨在解决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领土及国际地位问题的《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以下简称“旧金山和约”）于1951年9月8日签署、1952年4月28日正式生效。该和约声明“日本承认朝鲜半岛之独立，放弃台湾、澎湖、千岛群岛、库页岛、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岛屿的主权”，其中第二章“领土”部分第2条第6款规定“日本放弃对南沙群岛与西沙群岛之所有权利、名誉与请求权”，但未进一步言明。

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最大受害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四大战胜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未被邀请出席旧金山会议。对此，中国政府1951年8月15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宣布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向为中国领土”，反对“旧金山和约”虽然规定日本放弃对南海有关岛屿的一切权利却不提归还主权问题，重申有关岛屿在日本投降后“已为当时中国政府全部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有关岛屿的主权“不受任何影响”。注

美国为了推动日本与台湾当局缓和以更好地服务于其亚太战略，1952年主导日本和台湾地区签署了《日台条约》，当时叫《日华条约》。其第二条延用“旧金山和约”模式规定，“兹承认依照公历一千九

百五十一年在美利坚合众国金山市签订之对日和平条约……第二条，日本业已放弃对于台湾及澎湖群岛以及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誉与要求。”其含义无疑是，当时仍然被美日两国承认的台湾当局代表中国接收了日本放弃的南海诸岛。

二、冷战背景下的各方博弈

20世纪50年代中期，菲律宾和当时的南越开始在南沙搞一些动作。1956年菲律宾航海家克洛马宣布在南沙群岛海域航行过程中“发现”“许多岛屿”，并将它们定性为“自由地”，菲律宾政府遂据此认为这些岛屿属菲，企图抢占部分南沙岛礁。而菲政府对台湾当局的南沙主权立场是知晓的，曾欲派官员赴台湾协商南沙岛礁归属问题。新华社电讯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郑重声明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绝不容许侵犯》，《人民日报》1956年5月30日第1版。1962年起，南越陆续占领了南子岛、敦谦沙洲、鸿庥岛、景宏岛、南威岛、安波沙洲，遭到了海峡两岸的强烈反对和抗议。

更大规模的侵占浪潮发生在20世纪70、80年代。这与南沙附近海域油气资源的发现，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与签署有很大关系。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及联合国多个调查机构宣称，在南海大陆架上发现丰富油气资源；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最大制度创建之一。

在巨大资源前景的诱惑刺激下，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纷纷伺机在南沙夺岛占礁。

当时的越南北方政权原本明确承认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但南北统一大势确立后，北越随即改变了立场与政策，注1975年先是以“解放”为名，占据了曾经被南越当局侵占的南沙群岛6个岛礁，后又

陆续抢占了染青沙洲、万安滩等18个岛礁。1988年3月14日，越南还在赤瓜礁附近与中方爆发了海上冲突。

菲律宾陆续占据了费信岛、中业岛等8个南沙岛礁，马来西亚则侵占了弹丸礁、南海礁和光星仔礁。

这些国家都大幅调整了在南沙群岛等问题上的原有立场，以制定国内涉海法律、发表政治声明等方式，纷纷正式提出对南沙群岛的主权诉求，并且开始对南沙周边的海域提出权益要求。

此段时期，美国通过外交询问、申请测量、通报航行飞越计划等方式，显示了其承认中国对南沙群岛主权的立场，台湾当局还曾在南沙有关岛礁上接待过美国军事人员。对于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沙夺岛占礁的疯狂举动，美国长期未有明确态度，但曾多次向台湾当局咨询过对这些岛礁主权归属问题的意见。[注]1957年至1961年2月，美军驻菲律宾的空军人员在黄岩岛及南沙群岛区域实施海图测量及气象调查时，曾多次向台湾当局提出申请，也表明美国实际上认为中国拥有这些岛礁的主权。而同期，美国出版的地图和书籍等，例如1961年版的《哥伦比亚利平科特世界地名辞典》、1963年版的《威尔德麦克各国百科全书》、1971年版的《世界各国区划百科全书》，也均确认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美国的政策困境是，虽然基于道义和国际法理应承认中国对这些岛礁的主权，但另一方面由于反共和亚太战略的考虑，美国又不情愿让中国大陆占有这些岛礁，更不愿因此损害与菲律宾等盟友的关系。

而中国长期以来只有太平岛在台湾当局占领之下。中国大陆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控制并驻守较小的六个岛礁，1994年在美济礁上建筑了渔船避风设施。

三、通向《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曲折之路

20世纪90年代初，在冷战终结、亚太国家关系缓和、经济发展成为主基调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和东盟的关系发展步入快车道。1990年中国与新加坡建交、同印度尼西亚复交，1992年中国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

在开创和维护周边稳定政策的驱动下，中国对东盟确立了增信释疑和全面开展合作的政策。这期间围绕南沙群岛存在的争议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中国一向坚持对南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但是，考虑到维护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稳定的现实需要，中方沿用了对东海钓鱼岛争端采取的方针，一方面坚持主权立场，另一方面向东盟国家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注]避免争议干扰周边稳定与合作的大局。

1994年中国与越南双边关系实现正常化。1995年，随着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正式加入东盟，东盟扩大为10国。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在随后的亚太金融危机中，中国负责任的态度赢得了东盟国家的广泛赞誉，双方关系迅速走近。1997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首次中国—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双方确立建设“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

在此期间，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南海局势的起伏波动，但有关争议仍不时凸显。

一是相关国家启动了新一波的占岛与油气开发行动。进入20世纪90年代，越南又侵占5个南沙岛礁，使其实控南沙岛礁总数达到29个。到1994年3月，越南在南沙、西沙海域非法划出的石油招标区块已达120多个，覆盖了南沙、西沙大部海域。马来西亚1999年侵占了榆亚暗沙、簸箕礁，并大肆开发南沙附近的油气和渔业资源，在南沙海域钻

井数量占东南亚争端国钻井总数的一半以上，而20世纪90年代其执法力量在南沙海域驱赶、抓扣中国渔民渔船的次数也最多。

二是菲律宾在中国的美济礁、黄岩岛和仁爱礁等岛礁进行了多次挑衅行动。

针对中国1994年在美济礁建设渔民避风设施，菲律宾反应激烈，1995年3月底出动海军，把中国在五方礁、仙娥礁、信义礁、半月礁和仁爱礁等南沙岛礁上设立的测量标志炸毁，甚至派出海军巡逻艇，在空军飞机的支援下，突然袭击了停靠在半月礁附近的4艘中国渔船，拘留了船上62名渔民。5月13日，菲律宾军方将争议升级，派船机试图强闯美济礁，与中国附近海域的“渔政34号”船进行了8个多小时的对峙。而中国坚持完成了修建设施的工程。

黄岩岛属于中国中沙群岛，以东隔马尼拉海沟与菲律宾群岛相望。至少在元朝，中国就已发现并管辖着黄岩岛，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曾多次在黄岩岛宣示主权。历史上菲律宾的官方文件和地图也都对此不持异议。菲律宾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围绕黄岩岛制造的所谓新争议，在1997年以前菲律宾从未对黄岩岛提出过领土要求。

众所周知，菲律宾的疆域主要由1898年《美西巴黎条约》、1900年《美西华盛顿条约》和1930年《英美条约》所界定，这三个条约都明确规定了菲律宾领土位于东经118°线以东。而黄岩岛明显位于该线以西，从未属于过菲律宾。菲律宾官方也承认黄岩岛不在菲领土主权范围内，在1967、1981和1984年菲律宾官方出版的地图中，都清晰地显示出黄岩岛在用虚线标出的菲领土界限之外。

1992年2月，时任菲驻德国大使在致德国无线电爱好者的信中表示，“黄岩岛不在菲领土主权范围以内”。[注]甚至到1994年10月18日，菲律宾国家地图和资源信息局还确认“菲领土边界和主权是由1898年12

月10日《美西巴黎条约》第三款规定，斯卡巴罗礁（黄岩岛）位于菲领土主权范围之外。”同上。

1997年4月底，菲律宾海军登上黄岩岛，炸毁中国主权碑，插上国旗，中国海监船一度与菲律宾军舰形成对峙。此后数年间，菲多次驱逐、逮捕甚至枪击航经黄岩岛海域的中国渔民。

1999年，我担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当时中国渔民在黄岩岛附近与菲方发生了纠纷，我应邀去新闻俱乐部接受采访，途中停下来，从街头报摊上买了一张由菲律宾国家地图和资源信息局出版的菲律宾地图，答记者问时我把这张图展示给大家看。在场的菲律宾和外国记者看得都很清楚，地图上标明，黄岩岛不在菲疆域内。

1999年5月9日，菲律宾海军将一艘舷号为57的坦克登陆舰“马德雷山脉号”开入仁爱礁，以船底漏水搁浅需要修理为由停留在礁上，此后一直以定期轮换方式驻守人员，再未离开。中方进行了反复严正的外交交涉。同年11月3日，菲海军又如法炮制，派出另一艘淘汰军舰，以机舱进水为由在黄岩岛潟湖东南入口处北侧实施坐滩。此次中方不可能再相信菲方谎言，施加了强大外交压力。菲时任总统艾斯特拉达下达命令，菲军方11月29日将坐滩军舰拖回到码头。

在此期间，中国政府着眼于管控、稳定局势，维护中国与东盟关系大局，对菲、越、马等国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外交努力，特别是与菲律宾进行了多轮磋商，推动局势走向缓和。1999年3月，中菲关于在南海建立信任措施工作小组首次会议在马尼拉举行。此后，双方又举行多次磋商，同意保持克制，不采取可能导致事态扩大化的行动。

东盟国家高度关注南海局势，也与中国进行了多轮磋商。早年各方还进行过专题1.5轨，也即半官方半学术的闭门对话，就领土争议和海域划界进行深入探讨，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参加，其中一个重要共识就是，南沙争议错综复杂，解决难度大，但应该坚持和平谈判解决，

中方提出的“搁置争议”是最可行的选择；并且认识到，在岛礁领土主权争议解决之前，海域划界难以推进，保持模糊是明智的选择，同时应该鼓励推进“共同开发”。这些讨论为日后中国与东盟寻求共识提供了基础。1998年东盟峰会通过了旨在推进东盟一体化的“河内行动计划”，其中提出要“推动在争端当事方之间建立‘南海地区行为准则’”。[注]出于增信释疑和睦邻友好的考虑，中方原则上同意与东盟国家就“行为准则”进行磋商。[注]

2000年3月15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泰国举行非正式磋商，交换了各自起草的“准则”文本。由于各方在约束效力方面有较大分歧，“准则”的制订并不顺利，后来的数次磋商均未取得明显进展。

2002年7月，在文莱斯里巴加湾市第35届东盟外长会上，马来西亚为了打破僵局，提议以一个妥协、非约束性的“宣言”取代“准则”，得到东盟外长会接纳，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东盟将与中国保持密切合作，为达成“宣言”而努力。[注]此后数月间，中国与东盟国家进行了密集的沟通和协商，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是年11月4日，由时任中国副外长王毅与东盟十国外长在柬埔寨金边第八届东盟峰会期间共同签署。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共有十条内容，主要是确认促进南海地区和平、友好与和谐的环境，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承诺在南海的航行及飞越自由；承诺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包括不在现无人居住的岛、礁、滩、沙或其他自然构造上采取居住的行动，并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分歧；同意在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朝最终达成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的目标而努力。[注]各方磋商《宣言》的焦

点是南沙岛礁归属争议，主要是着眼于防止岛礁争议失控，防止新的占岛、控岛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各方在《宣言》临近签署时在争议地区称谓问题上出现困难。东盟多数国家习惯使用英文“SPRATLY ISLANDS”（“斯普拉特利群岛”）指代南沙群岛，但不反对中方自行使用中文“南沙群岛”（“NANSHA ISLANDS”）。越南坚持使用“黄沙、长沙群岛”（即中国西沙、南沙群岛）称谓，而中国从未承认西沙群岛存在争议，《宣言》讨论也不涉及西沙群岛，中方不能接受越方无理要求。在长久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为了顾全大局，中方同意在《宣言》中使用了“南海各方”“南海的航行及飞越自由”“南海行为准则”等笼统表述，对于岛礁争端也只是泛泛表述为“不在现无人居住的岛、礁、滩、沙或其他自然构造上采取居住的行动”，没有具体到南沙群岛。《宣言》为南沙争议降温和地区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对南海问题的政策是不对各方领土要求的合法性做出判断，只是强调用和平手段解决领土纠纷，同时关注南海的航行自由。在当时的全球安全格局中，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台海两岸关系的缓和，亚洲不构成美国关注重点，南沙偶然发生的争端没有影响美国在主权问题上不选边的立场，美方强调的是各方以和平手段解决领土争端。(注)

四、总体平静但暗流涌动的十年

《宣言》签署后的10年，事实上只有中国基本遵守了其规定和原则，未采取使争议扩大化的行动，并且积极推动海上和平合作和共同开发。然而，越、马、菲等国从一开始就没有全面和认真地落实《宣言》，不断对所占据岛礁改建和扩建，加强行政管理，加紧油气资源

开采，不时抓扣中国渔民等，这些国家的一个共同指向就是固化非法侵占所得，否定存在争议，而不是“搁置争议”。而这些做法不断刺激中国国内民众和舆论的反感情绪，使得他们对南沙问题的关注热度不断上升。

其中，越南方面最为活跃。2003年4月，越南举行“解放南沙”28周年纪念大会，6月与印尼秘密签订大陆架划界协定；2004年4月，首次组织旅游者前往南沙观光旅游；2005年初，在行政版图调整中将中国的西沙、南沙群岛作为行政县分别编入越岘港市与庆和省；2006年初，与马来西亚设立海军热线以协调解决南海资源开发、岛礁主权争议问题，4月进一步划定南沙油气招标区块，并宣布与外国企业合作在南沙修建天然气输送管道；2007年5月，租用俄勘测船对南海海域进行拉网式地质调查，6月宣布其在南沙占领的部分岛礁举行“国会代表”选举等。

马来西亚2003年4月先后派出4个海上作业编队共11艘勘测船在南通礁海域进行勘探测量活动，5月在弹丸礁附近海域举行国际海上挑战赛，并首次批准旅游船只赴榆亚暗沙经营旅游休闲项目；2004年11月发行将部分南沙岛礁标入版图的邮票；2008年8月其国防部长率近80名记者登弹丸礁宣示主权。

菲律宾2003年4月在中业岛举行“卡拉延设市25周年”纪念活动；2006年6月启动中业岛机场跑道和其他设施修缮工程；2008年3月在所占岛礁设立卫星通信系统等设施。

不过，应当承认的是，在2009年以前，虽然各种摩擦不断，但南海局势总体上是可控的。复杂化的转折大约发生在2009年，这与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关于提交200海里外大陆架界限信息的期限（2009年5月13日）有一定关系，而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则是一个更大的刺激因素。

2009年1月，奥巴马政府甫一履新，即释放了将对小布什政府对外政策进行纠偏、把战略重点优先放在亚太地区的信号，这显然助长了部分争端方在南海与中国角力的信心。

2009年一二月间，菲律宾国会参众两院通过《领海基线法案》，以国内法形式将中国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划为菲领土。5月6日，越南、马来西亚无视在南海海域划界存在事实争议的情况，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联合提交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案。7日，越方又单独提交南海外大陆架划界案，声称对中国西沙、南沙群岛拥有主权。这迫使中国也向联合国提交了中国关于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初步信息，以防止自己的权益受到进一步损害。

中美在南海也开始出现摩擦，仅2009年，美国军舰与中国船只在侦察与反侦察过程中，至少发生了5起对峙摩擦事件。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无瑕号”事件。

进入2010年，美国对南海问题的政策加快转变，表现出“选边站”的倾向。7月23日，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出席在越南河内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就南海问题发表讲话，宣称“自由利用亚洲共享海域”“在南海维护国际法”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强调各方要遵守国际法，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胁迫。根据她本人的回忆，“这些都是精心选择的措辞，是对早先中方声称其在本地区扩张性的领土要求属于‘核心利益’的回应。”[注]此后，希拉里又多次就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以及南海问题发表针对性言论，而美国军方则大幅强化了在南海及其周边的力量存在和军事演习等动作。

为稳定南海局势，缓和东盟国家的紧张情绪，中国政府进行了艰苦的外交努力，取得一定成效。2011年7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10＋1外长会上，中国与东盟国家通过了落实《宣言》指导方针；中菲、中

越在双边沟通中也曾达成了一定的谅解。但中国的努力未能对冲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带来的影响，更未能换来菲、越等方的克制。

菲、越等方对所占南沙岛礁继续进行改扩建，与美国在南海周边频繁军演，一些国家出现抱团针对中国的倾向，而且完全无视中方关切。2011年3月，菲军方披露，计划投入2.3亿美元修整在南海岛屿上的军营和机场。六七月间，菲、越等国会同域外力量在南海举行了多场敏感的军事演习。菲总统阿基诺三世还下令用所谓"西菲律宾海"一词替换"南海"（South China Sea）这一国际通用地名，意图强化菲律宾对相关岛礁和海域的主权声索地位，并获得美国官方一定的认可。2012年3月，菲、越就在南海进行联合军演和开展海上边界共同巡逻达成协议，4月，越南派出僧侣进驻其所占南沙岛礁的寺庙。

东盟部分国家和美国的这些动作在中国受到媒体的密切关注，而媒体的广泛报道也激起公众的强烈反响。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采取的克制政策面临保持延续性和民间情绪的双重压力。

五、南海局势加剧紧张的背后

2012年4月发生的黄岩岛事件可以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突破了中国政策和忍耐的底限。

4月10日，12艘中国渔船在黄岩岛潟湖内例行作业，突然出现的菲律宾军舰对渔民进行堵截和干扰。中国渔民被菲律宾军人扒去上衣在甲板上暴晒的照片，瞬间成为中国各大媒体和网站的头条新闻，引发全国性声讨。菲律宾的粗暴挑衅和国内舆情的强烈反应，促使中国政府立即采取反制行动，一方面进行紧急外交交涉，另一方面派出海监和渔政船只尽快抵达黄岩岛现场，双方进行了激烈交锋。直至6月3日，菲方船只才全部撤出黄岩岛潟湖。为防止菲律宾新的挑衅行为，

中国船只留守黄岩岛附近海域，开始实施实际管控。为了避免现场失控，2012年4月14日中方渔船暂时撤出黄岩岛潟湖。

2012年4月15日起至5月中旬，中国政府多次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和黄岩岛的历史经纬，我当时正好在中国外交部担任副部长，主管亚洲事务，就黄岩岛紧张事态通过菲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提出多轮交涉，对方均不予回应。4月25日菲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中国认为菲律宾不遵守共识，但菲律宾认为双方从来就没有达成共识”。[注]

菲方公务船只侵入潟湖，不肯离去。有中国渔民反映，菲公务船上的人员配备有枪支。现场的情况令人高度担忧。中方通过外交渠道多次敦促菲律宾撤出潟湖内的武装船只，而菲方未予理睬。菲外交部一直拒绝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的任何沟通要求。

这个情况持续了两个多星期，至5月底，中方决定派出执法小艇进入潟湖，加大在现场的执法力量，同时增加潟湖外的警戒力量。

在该事件的过程中，美国在外交场合多次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有效性，也强化了在外交和军事上与菲律宾的互动，但同时把握分寸，未就发生冲突的假设情形做任何回应，强调“肩并肩”演习等军事动作并不针对中国。美国时任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国防部长帕内塔等高官不断表示，美国在争端问题上不持立场，无意介入黄岩岛事件。[注]显然，美国的态度与菲律宾的预期有一定差距。[注]在2012年4月30日美菲国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也承认，“美方已经明确表示不会介入黄岩岛这样的领土争端”。[注]

美国的“相对中立”和保持距离无疑动摇了菲律宾继续挑衅中国和长期对抗的决心，而中方维护对黄岩岛主权的决定是坚定的，用公务船长期在黄岩岛外围保持警戒，迫使菲律宾认识到在黄岩岛与中方对抗的不可持续性。[注]5月下旬，菲律宾的态度开始松动。

此后，中方一直在为缓和局势进行外交努力。

2012年6月初，在确认了菲武装船只撤出潟湖后，中方开始调度中方公务小船离开潟湖。2012年6月5日，菲律宾外交部公开确认，双方公务船只已全部撤出黄岩岛潟湖。㊟随后，南海逐渐全面进入休渔期（5月16日至8月1日），中方渔船也逐渐离开黄岩岛，中方海监船继续在黄岩岛外围保持警戒，事态趋于平息。

整个事件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菲律宾未曾拥有过黄岩岛，也就谈不上失去。菲海军在黄岩岛的挑衅事发突然，但在整个处置过程中，中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和善意。在交涉过程中，焦点是缓和潟湖内的紧张局势，但中方从未向菲方承诺过要撤出在黄岩岛附近保持警戒的公务船只。考虑到菲律宾多次在黄岩岛滋事，中方公务船在黄岩岛周围继续进行警戒是必要的。这一过程中，中方本着管控风险、防止冲突的考虑同美方进行了一些必要沟通，但并不存在向美方做出所谓“承诺”，更不存在“中方欺骗”美方之类的问题。毕竟南海问题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美国也不是争端的直接当事方。

此时越南方面也有新动作。2012年6月21日，越南国会审议通过《越南海洋法》，意在用国内法为越方主张披上合法外衣。㊟该法通过当日，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召见越南驻华大使阮文诗提出严正交涉。同日，中国宣布建立地级三沙市，政府驻西沙永兴岛，管辖西南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并在随后数月间采取了落实三沙设市的一系列行政、司法、防卫举措。

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海洋法法庭提请针对中国的仲裁。对此，中国外交部多次发表声明，指出“菲律宾和仲裁庭无视仲裁案的实质是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及其相关问题，恶意规避中国于2006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298条有关规定作出的排除性声明”，强调中方“不承认、不参与”。

中方对菲启动仲裁是持完全否定立场。菲律宾声称其提出仲裁的理由是与中国之间的协商和谈判已陷入僵局，但事实上，菲方自黄岩岛事件以来一直拒绝与中方进行任何严肃的对话，遑论谈判，也未与其他《宣言》成员协商。再者，中国已在2006年根据《公约》第298条做出了排除性声明，由于仲裁庭的管辖涉及主权、历史性权利及所有权，因而已免于管辖。无论仲裁结果如何，《公约》中没有任何条款规定可以执行对中国不利的仲裁结果。

此后发生的仁爱礁打桩事件和中建南事件进一步恶化了局势。菲律宾1999年坐滩仁爱礁的军舰面临解体风险，菲方一直寻机在礁上打桩以实施占领。中方对此保持高度警惕，2014年3月成功阻止了携带建筑物资的菲军舰驶向仁爱礁，两国政府船只发生对峙。菲律宾在舆论上大肆渲染，吸引国际关注和美国介入。

2014年5月中国在西沙海域启动“中建南”项目两口探井的钻探作业，“中国海洋石油981”平台从5月2日至8月15日在西沙中建岛南部17海里海域附近进行钻探作业，遭到越南数百艘官方船只的骚扰，并引发了中国海警船队与越南执法船的多次追逐甚至冲撞，场面一度激烈。

针对南沙整体形势的变化，并且为了彻底改善中国南沙岛礁民生、基本军事防御和维护主权权益的需要，中方于2013年底在自己控守的岛礁上开始了扩建工程，这些岛礁都远离国际航道，完全不存在影响航行自由的问题。但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反应强烈，并且大肆炒作和指责中国。2015年4月9日，针对外界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对有关工程做了详细说明，指出：中国政府对南沙部分驻守岛礁进行了相关建设和设施维护，主要是为了完善岛礁的相关功能，改善驻守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更好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更好地履行中方在海上搜寻与救助、防灾减灾、海洋科研、气象观察、环境保护、航行安全、渔业生产服务等方面承担的国际责

任和义务。有关建设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注]时至完稿，已有中方消息显示，一批为国际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灯塔、自动气象站、海洋观测中心、海洋科研设施等项目建设正顺利开展。5个用于航行安全的灯塔已建成，其中4个已正式启用。

中方的动作并没有得到周边国家的完全理解，引发了部分周边国家的担忧。而美国也加大对南海事务的介入力度，以中国岛礁扩建工程“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岛礁军事化”等话语，向中国施压，甚至采取了派军舰接近中国南沙和西沙岛礁的行动，被中方视为严重的军事和安全挑衅。

在中国许多人看来，美国是当前南海局势紧张的最大推手。首先，美国在加快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时，愈来愈将中国视为在亚太的主要针对目标。2013年，美军确定了“两个60％”的军力部署目标，即在2020年前将60％的海军舰艇、海外60％的空军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此外，美军抓住一切机会炒作中国“反介入与区域拒止”威胁，描绘积极完善为中国量身打造的“空海一体战”等作战概念。这些举动无疑都增加了包括南海在内的亚太局势的复杂化与紧张程度。中国许多学者开始关注，美国是否在为其亚太战略调整预设威胁甚至危机，然后导致“预言的自我实现”？

2014年起，美国针对中国周边问题做出了更加清晰化的表态，在南海问题上呈现出直接介入争议和偏袒盟友及其他争议方的姿态。

2014年的2月5日，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众议院有关东亚海洋争端的听证会上作证时，指责中国“断续线”主张“缺乏国际法基础”“影响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要求中国予以澄清。[注]这是美国官方首次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点名向中国发起挑战。而美方应了解，在南沙领土主权争议未决的情况下，明确断续线或者任何海域主张都无异于强化争议和紧张。同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

特在菲律宾宣称，如果中菲在南海发生冲突，美国将支持菲律宾。[注]这是美方在中菲南海争端中做出的最强硬表态。8月，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缅甸内比都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期间，还直接提出“三停止”要求，即，停止填海造岛、停止修建建筑、停止采取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冲突的激进行动。

而在美国，“成本强加”战略开始成为政策选项，即动用政治、外交、舆论、军事等各类手段，增加中国南海行动的成本，迫使中国后退，以期在不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制止中国的所谓南海扩张。[注]2015年美国发布了《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国家军事战略》《美国亚太海上安全战略》四个战略文件，都用较大的篇幅谈到南海，并声称要让中国付出成本代价。

美国南海政策的大幅调整不仅削弱了美方公正说话的地位，也进一步加深了中方对自身利益受到更多损害的担忧，刺激中方增强捍卫自身利益能力的决心。

与美国政策调整相伴随的是，美军对中国的行动指向性越来越明显，各类威慑、挑衅动作愈加频繁。例如，美军明显加强了对中国南沙岛礁周边海域海空抵近侦察活动的力度，美国军机对中国在南海的抵近侦察从2009年约260余架次增加到2014年的超过1200架次。[注]美国还开始频繁向中国直接“大秀肌肉”，进入中国南沙，甚至不存在争议的西沙岛礁12海里内进行航行自由宣示行动。2015年10月27日，美军导弹驱逐舰“拉森号”驶入南沙群岛渚碧礁临近12海里水域。2016年1月30日，美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驶入西沙群岛中建岛领海。与既往不同的是，美国每次都采取了在媒体上高调渲染的做法，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哈里斯等官员还扬言今后的行动范围将更广泛，性质将更复杂，并保持每季度约两次的频率。[注]

此外，美国还展开了针对中国的其他威慑动作。2015年7月，美军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搭乘P-8A“海神”反潜巡逻机对南海进行抵近侦察飞行；11月5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登上“罗斯福号”航母就南海问题发表讲话，而当时该航母正位于南沙群岛以南150—200海里、马来西亚以北约70海里的南海海域；11月8日—9日，美军B-52战略轰炸机连续两天飞越中国在南海扩建岛礁的附近海域；2016年4月15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访菲期间登上“斯坦尼斯号”航母巡航南海。美军舰机还时常在中国领海领空发生“误闯”事件。

美国有意识地强化在南海周边的盟友体系和军事网络。“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以来，美国已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新加坡樟宜基地、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环南海地区增加了力量部署。美国也正在加强与南海周边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有关海域态势感知的情报及侦察合作，加大对其他南沙争端国的军事援助，重点是提高菲、越等国的侦察预警、巡逻管制以及反介入能力。2016年3月，美菲在第六次年度双边安全对话上宣布，美国将被允许使用菲律宾的六个基地。2016年4月，美菲“肩并肩”联合演习再度举行，演习科目十分具有针对性，包括失岛夺回、油井防护等，设定的背景即当下的南海争议。

美军在南海及其周边地区的排兵布阵推动地区局势进一步紧张，也使得南海争议在全球战略棋局中的位置被刻意夸大，貌似中美间的竞争开始超越其他矛盾成为南海局势的主线。回顾冷战后世界上发生的紧张和冲突，几乎都有美国的卷入甚至是主导，有的至今还没有了结。这不免让中国人要问，美国在南海意欲何为?

六、中方增强管控局势的能力并推进合作

综上所述，南海局势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各种行为和言论在多条线索上相互纠缠、影响、互动的结果，也是国际环境和地区安全

形势变化使然。造成局势螺旋升级、各方不断相互刺激的因素中，不仅有基于主权、资源、战略安全诉求的现实利益纠葛，也有各方记忆中历史脉络的缺失和信息的不连贯，更有相互之间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的揣测与猜度。美国作为一个南海域外大国，其加大介入和立场的调整变化是2009年以来南海局势复杂化的主要肇因。大家关心的是未来的局势会如何发展？美方关注中国下一步将采取什么新的行动，而中方对美方意图也产生深深的怀疑。围绕南海局势和南沙群岛的争议，存在矛盾激化甚至战略误判的风险。

中国在南海的利益诉求多少年来一以贯之，那就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权益的完整性和维护地区和平安宁。观察中国不能忽略历史维度。中国虽然正在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历史的烙印仍然深刻，我们这个国家是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侵略和践踏之下跌跌撞撞进入20世纪的，中国人民无法忘怀曾有一个多世纪的屡遭外敌入侵、强权欺凌的屈辱经历，那是国家和民族不可磨灭的记忆。也正是基于此，中国人民和政府始终对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抱有极强的敏感性，绝不会允许那样的损失哪怕在局部重演，这是外界在看待和判断中国时必须了解和考虑的。诚然，现在已经没有能对中国的生存与发展构成根本性挑战的重大外部威胁，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这方面的信念与承诺没有也不会改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4月8日在亚信部长会议上强调指出：中国一贯致力于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坚定维护自身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权利，坚持通过同直接当事国友好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议。[注]从王毅外长与东盟国家的接触中可以看到，中方提出的“双轨”思路，即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妥善解决争议、中国和东盟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得到许多国家的认可和支持。东盟国家也认识到控制局势，重回对话轨道的重要性。

对中国在南海的目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第一，中国南海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一向是以静制动、后发制人。中国民众绝不会允许任何国家进一步损害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权益，因此强烈期待国家有能力维护自身利益。中国将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权益，并增强管控局势和避免进一步损失的能力。目前看，只要没有重大威胁，可以继续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中方致力于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议的政策不会改变。

第二，中国的南海政策也需要关注到维护航行自由和航道安全。南海是国际战略通道，有世界上最繁忙的商业航线，每年全球货物海运总量的40％要经过南海，南海航行自由与安全攸关世界各大经济体的重大利益。中国贸易和能源70％~80％也依靠南海航线，是南海通道最大的使用者，南海也是中国海军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

第三，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的最大公约数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没有旨在谋求所谓地区霸权的动机和设计。中国之所以一直努力管控与争端方的矛盾和分歧，就是考虑到周边总体环境的重要性。今后需要更多地向外界提供信息、分享资料，以期增进了解；更多地提供公共服务，以增加地区的安全与福祉；通过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构建地区有效规则。长远看，作为南海最大的沿岸国，中国应在南海保持军事防御和维护和平的能力，增强推进谈判解决争议的主动地位。

第四，中美在南海的共同战略利益是航行自由和安全以及南海周边地区的繁荣稳定。中美之间在南海并不存在直接争议，两国应该通过对话、澄清彼此意图来摆脱目前南海问题带来的安全困局和误解。中美需要也应该能够在南海逐步走向合作。中国正在建设海洋强国，世界范围内的辽阔海洋对中国的发展和全球合作越来越重要，中国的

海洋视野注定要超越南海。外界用陆权思维和传统的海洋控制理念去揣度中国是没有道理的。

未来形势如何发展取决于各方的认识和选择，如果选择合作，可能是多赢；如果选择对抗，则可能是僵局甚至冲突，任何一方都难以从中完全获益。

---

1. 本文2016年5月11日首发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55期），英文同步刊发于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有增删。
2. 日本于1939年圈出北纬7°—12°、东经111°36'—117°30'之间七边形区域内的南沙部分海域，将其中的南沙部分岛礁，包括太平岛、南子岛、北子岛等，统称为“新南群岛”，划归“台湾总督府”“高雄州高雄市”管辖。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38-46.
4. 1974年之前，无论是越南政府的照会、声明，还是其报刊、官方地图，均承认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例如，1958年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明确地对世界宣布，“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适用领海宽度12海里主权范围”。9月14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签发外交照会，表示“承认和赞成”中国的上述声明，并承诺在国家关系中“彻底尊重”中国的领海主权。
5. A.V.H.Hartendorp，History of Industry and Trade of Phillipines：the Magsaysay Administration，Manila：Philippine Education Co.，1961，p.217。萧曦清.中菲外交关系史.台北正中书局，1995，831.
6. 1992年7月，中国外长钱其琛参加了在马尼拉举行的第25届东盟外长会后对话会，其间同东盟六国外长就南海问题交换了意见，确认中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指出中方愿在条件成熟时同有关国家谈判寻求解决的途径。
7. 南海大事记，http：//www.china-nanhai.org.cn/events.html，访问时间2016年8月20日。
8. ASEAN，1998HaNoi Plan of Action，HaNoi，December15，1998.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主编：《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659页。
10. ASEAN，2002Joint Communique of35th ASEAN Minister Meeting，Bandar Seri Begawan，July29-30，2002.

11. Nguyen Hong Thao，“The2002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A Note”，Ocean Development&Internation al Law，34：3-4，pp.282-284。《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yzs_673193/dqzz_673197/nanhai_673325/t848051.shtml。访问时间：2016年4月11日。

1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aily Briefing，May10，1995.http：//www.state.gov/r/pa/prs/dpb/，访问时间：2016年4月11日。

13. Speech of Hillary Rodham Clinton，Vietnam，July23，2010，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7/145095.Htm，访问时间：2016年4月11日；Hillary RodhamClinton，HardChoices，Simon&Schuster，2014，p.79。

14. State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on the Scarborough Shoal issue，April25.2012，http：//www.gov.ph/2012/04/25/statement-of-the-department-of-foreign-affairs-on-scarborough-shoal-april-25-2012/

15. 坎贝尔的反应，http：//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conduct-06272012194950.html/，访问时间：2016年8月15日。

16. Armed Clash in the South China Sea，http：//www.cfr.org/asia-and-pacific/armed-clash-south-china-sea/p27883，访问时间：2016年9月1日。

17. Remarks with Secretary of Defense Leon Panetta，Philippines Foreign Secretary Albert del Rosario，and Philippines Defense Secretary Voltaire Gazmin After their Meeting。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2/04/188982.htm。访问时间：2016年9月1日。

18. DFA statement on the situation at Bajo de Masinloc（Scarborough Shoal），May23，2012。http：//www.gov.ph/2012/05/23/dfa-statement-on-the-situation-at-bajo-de-masinloc-scarborough-shoal-may-23-2012/。访问时间：2016年9月1日。

19. DFA statement on the situation in Bajo de Masinloc（Scarborough Shoal），June5，2012。http：//www.gov.ph/2012/06/05/dfa-statement-on-the-situation-in-bajo-de-masinloc-scarborough-shoal-june-5-2012/。访问时间：2016年8月20日。

20. 《越南海洋法》核心内容包括：明确适用范围包括越南主张的各种管辖海域、各岛屿、“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及其他群岛，强调“发挥越南全民族的力量，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保卫越南在海域、岛屿和群岛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定了越南的海域制度，规定采用直线基线法确定其领海基线，特别提及大陆国家很少使用的“群岛”概念；强调发展海洋经济，推动开展国际和区域合作；明确了海上巡逻和检查力量。

21. 《外交部：中国对南沙部分驻守岛礁的建设合情合理合法》，新华网，2015年4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4/09/c_1114920500.htm，访问时间：2016年4月11

日。

22. Speech of Daniel R.Russel，Washington.DC，February5，2014，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14/02/221293.htm，访问时间：2016年4月11日。

23. Jonathan W.Greenert，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13February2014，http：//www.navy.mil/navydata/people/cno/Greenert/Speech/140213%20National%20Defense%20College%20of%20the%20Philippines%20remarks%20only.pdf，访问时间：2016年4月11日。

24. The challenge of responding to maritime coercion.http：//www.cnas.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pdf/CNAS_Maritime1_Cronin.pdf，访问时间：2016年4月11日。

25. 《专家：美国频繁抵近侦察监视中国南海三大建设》，人民网，2015年07月03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5/0703/c1011-27247801.html，访问时间：2016年4月11日。

26.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哈里斯关于南海言论"缺乏历史常识"》，新华网，2016年1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6-01/28/c_1117929534.htm，访问时间：2016年4月11日。

27. 习近平，《凝聚共识促进对话共创亚洲和平与繁荣的美好未来》，http：//www.gov.cn/xinwen/2016-04/28/content_5068771.htm，访问时间：2016年5月1日。

一带一路

亚欧联通的百年梦想㊟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2015年3月，经国务院授权，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勾勒出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倡议的蓝图。

历史上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既有海上的，也有陆上的。中国复兴古代丝绸之路的理念旨在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

当然，人们需要花些时间来理解这一宏大构想。这两个倡议的英文译法是“一带一路”，我曾经许多次被问到：中国为什么和怎样在陆地上建设“一条带子”，在海上建设“一条马路”？可见，选择一个恰当的能够抓住人们想象力的译法也是个挑战。

我的理解是，习近平主席所倡议的是一个互联互通的规划，既是亚洲区域内的，也是亚欧之间的，既要惠及内陆，也要惠及沿海区域，既是加强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是打造贸易、通讯、金融和文化交流的高速公路。

这一倡议已经得到60多个国家和多个国际组织的支持。双边、多边和地区层面正在积极探讨如何通过具体项目加以推进，如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同时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设立亚投行等，共同推进。

一、亚洲互联互通的百年梦想

请让我先简略回顾一下亚欧连接的历史。

亚欧联通不仅是如今中国人的梦想，也是欧亚百年梦想，两大洲为此有过不少尝试。

第一段是北线，19世纪俄罗斯修建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联通了波罗的海与太平洋。不过那条铁路更多关注安全问题，经济意义不大。

第二段是中线。1990年，中国境内的兰新线西延至阿拉山口，贯通了从连云港到鹿特丹的铁路，被称为亚欧第二大陆桥。90年代我去中国最西端的阿拉山口考察过，铁路在中国这边是标准轨距，在哈萨克斯坦那边是宽轨，所有货物都需要换车，我看到笨重的货物倒来倒去，长长的列车在等待。这个路线“连而不通，通而不畅”。

第三段是南线。中国建成了一些南北纵向的线路，例如成昆铁路，青藏铁路，但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直至马来西亚和连接新加坡到印度的构想从未实现。

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都不曾放弃这个梦想。20世纪90年代，欧洲学者提出构建欧亚大陆桥的设想。2015年5月，我在义乌的丝路研讨会遇到拉鲁什（Helga Zepp-LaRouche）女士，从她提供的册子里面找到1991年的那幅曾经令我们这些年轻外交官兴奋不已的欧亚大陆桥设计图。这次欧洲国家对亚投行普遍支持，我相信也源于对这个梦想的深刻理解。

20世纪90年代，亚洲开发银行也曾提出一系列亚洲建设基础设施网络的方案。昆曼公路就是亚行与中国、老挝和泰国共同建设的。然而，总体上看，一方面当时缺乏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中国内陆本身的基础设施网络还没有建好，尚不具备实现欧亚联通的支撑条件。因

此，虽然中国和东盟在学术和官方层面继续进行过许多讨论，这个宏伟设想的实现不得不等待更加合适的条件和更大视野的出现。

20年后的今天，这些制约因素正在消失。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世界水平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纵横交错，修建速度不断刷新记录。目前，中国高铁拥有世界最长的高铁网。

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总体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资金和技术也有了比较好的积累。中国领导人不仅从中国下阶段发展需要考虑，更是从亚欧甚至更广泛地区长远发展的需要出发，提出了这样一个顶层设计倡议。

二、互联互通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经济繁荣

新加坡处在连接亚洲和欧洲的重要贸易通道上，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发挥关键的门户作用。

我们都清楚，大部分亚洲国家内陆地区不如沿海地区发达。交通不便，基础设施缺失使中国中西部、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和欧洲之间广大地区的发展步伐受到拖累。贫穷导致社会不稳定，同时滋生人口贩卖、毒品泛滥、恐怖主义等问题。

中国是一个海陆两栖大国，东部地区面积是内陆地区的四分之一，但是创造了全国GDP的80%，内陆地区与发达的东部差距比较大。中国的西部在地理意义上是欧亚大陆的中心，如果向西向南发展则有条件发挥自己的区位优势。

同样，其他例如印尼、马来西亚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也需要改善其内陆互联互通条件，以赶上亚洲新一轮的增长浪潮。

建设更多的互联互通通道，有望将更多新的发展动力引进亚洲内陆欠发达经济体，带来机会，创造繁荣，提高整个地区的竞争力。

三、“互联互通”倡议为各国合作带来新的动力

中国是大部分亚洲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我注意到，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与中国贸易额保持在两位数的增长，希望随着合作项目进一步开展，双边贸易增长趋势会继续保持下去。

以新加坡为例，中新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两国间相互投资也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新加坡已经连续2年成为中国第一大外资来源国，中国对新投资增长速度也很快。我相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深入，双边贸易投资增长一定会注入新的动力。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亚洲的市场潜力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亚洲无电人口尚有6亿，2010年至2020年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达8万亿美元。中国设立和倡议设立的400亿美元丝路基金和1000亿美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是提升本地区基础设施的良好开端。

中国有句俗语，“要想富，先修路”，这正是中国成功的要诀之一，中国愿意与各国分享经验。中国企业有能力为区域内国家提供质量高、性价比高、可承受的基建项目，并且它们已经在域内各国积极承揽工程合同。根据商务部网站消息，2015年1-5月，中国企业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超过1000个，新签合同额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一半。

新加坡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可以扮演多方面的重要角色，我试举几例。第一，新加坡基础设施完善，是亚太地区重要的海运、航运和物流中心，可以作为重要的中转点，提供补给、维修等服务，支撑海上和陆上有关丝路项目。第二，新加坡不仅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也是世界第二大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这是新加坡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贸易、融资和投资服务的优势。第三，未来三年，新加坡将担任中国—东盟双边关系协调员，我们期待新加坡在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亚太自贸区及其他区域互联互通项目中发挥领导作用。

目前，中新两国正就在中国西部地区开展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业示范项目进行谈判。这一项目得到落实后，也将增强新加坡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能力。

四、共同努力，应对挑战

任何一个好的设想，最终需要落到实处，需要实践来检验。实现亚欧互联互通也面临许多需要重视的具体问题和挑战。

首先，增进了解和信任。对中国来说，将自身的想法有效传递给外部世界一直是个不小的挑战，这里面有语言障碍的问题，也有将概念化倡议转化为具体思路的问题。这个倡议从诞生伊始就是个开放包容的倡议，因此培育相互信任对倡议取得成功至关重要。中国方面也需要更多地倾听周边邻国的意见，实现更好的沟通。

其次，要妥善应对安全和其他风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周期长、回报率低，需要稳定的安全和法制环境。任何项目的成功都需要东道国政府确保基本的有利环境。企业在做出项目决策之前，都需要详尽的风险评估。当然，反过来，好的互联互通建设项目也会促进本地区稳定。

其三，最终还是要由企业和市场决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有经济可持续性的互联互通项目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政府也要提供政策指导、法律环境和各种便利。

风险与挑战的单子还可以再列，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国际社会积极关注和支持互联互通。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区域从来没有如此团结，如此一致地期待区域实现全方位互联互通。让我们一起推动丝路倡议的成功，为数以亿计的人民带来新发展，新机会，新繁荣。

---

1. 2015年7月29日，傅莹应邀出席新加坡地区工商论坛暨首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演讲中译文刊发于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3日。

中国之道

不同视域下的中国㊟

与外国人交谈，常感到在他们眼里的中国与我们的看法差距比较大。最近一次带给我的强烈感受是参加一年一度的圣加伦论坛。

世界5月初，这个有“小达沃斯”之称的论坛在瑞士东北部的圣加伦举行，来自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政商领袖和杰出学子云集在这里探讨世界大事。几天下来观察到的是，大家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兴趣都非常高，但同时又误解颇多。最集中提到的问题是：作为新生世界大国，中国将如何对待和领导世界?

在讨论中我以自己在国内演讲时的经历为例，谈到每次问听众是否赞同“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国”时，很少有人会举手，但是问到哪个国家在世界上排第二时又往往莫衷一是，这很能说明中国人看世界的方式和角度。主持人当场动议，请赞同“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国”的人举手，在场的大部分人都把手举得高高的，而同时场内却回荡起参会的中国人此起彼伏的声音：“No”。外界和国人的看法如此不同，国外普遍认为中国成长了，世界大国排位第二当仁不让，而我们则坚信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虽然有了很大的成就，但在许多方面都还远远排不到世界第二位。

我向听众介绍了我们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也许外界从经济总量上看到中国发展强大的一面，但是中国人刚刚走出为衣食奔波的年月，人均GDP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普通人看到的是眼前的现实差距和挑战，对国家的国际地位有更加冷静的判断。在座谈会上，我还介绍了“中国梦”包含的是每个人和家庭质朴的愿望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追求，“城镇化”将为下一步发展提供动力，而“依法治国”则是进一步改

革发展的必备保障。中国的发展需要与国际的合作，也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机会，中国的国际责任在于维护和平与推进合作。

在会场内外，无论是学术界和企业界人士还是青年学生，都非常重视来自中国的声音，但也有些人的观点尖锐刻薄，可以看出他们一直以来获取的信息相当片面。比如在钓鱼岛之争上，就有人认为中国太强硬，是在恃强凌弱。有些人对西藏的今昔一无所知，却张口闭口种族灭绝。荒唐的错误信息被不断重复以至于让人笃信不疑，这导致对中国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强烈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充满担心和不安；一方面对中国的成就钦佩不已，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有诸多"不正确"。很多人对中国国家机构换届和新领导人的思想观点充满好奇，但是他们的推理和发问完全从偏见的视角出发，与现实南辕北辙。

显然，不同视域下的中国影像是不重合的。其实国人的看法也相当多元，折射出中国正处在发展中的现实，虽然在各方面都有成就，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少。如果外界从单向度和片面的角度打量中国，就总看不到完整的影像。如何让不同视域下的中国逐渐融合，这不仅需要外界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有真切认知，也需要中国人向世界讲好自己的故事，为此，我们需要提高国际意识和扩大国际视角。面对扑面而来的种种偏见，一些出席论坛的中国学生主动站出来介绍中国，赢得敬意，在他们的身上闪耀着年轻一代自信的光芒。还有不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和了解中国的人士，很多人表达了对西方种种偏见的愤懑，也有人希望更多听到中国的声音。可以看到，理解中国、渴望沟通的力量也在成长。

---

1. 本文于2013年5月8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第5版《名家笔谈》栏目。

走和而不同之路㊟

很高兴与大家见面。百年来，布鲁金斯学会人才辈出，你们的思想产品不仅构成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也对国际政治思想界产生着深刻影响。我应邀来这里演讲深感荣幸。

几天前，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历史性会晤。对于中美两国，这是个极其重要的时刻。此次会晤的方式轻松灵活，气氛和谐，让我感触良多。两国元首能在一起相处这么长的时间，充分交换彼此对各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看法，实属幸事。

此次会晤释放出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信息是，两国元首承诺将共同努力，致力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让中美成为合作的伙伴，而非走向冲突之路。之前许多人曾对此感到担忧。虽然这次会晤不可能解决所有难题，但相信这将是两国未来携手合作，不断取得丰硕成果的开端。

毋庸置疑，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很不一样的国家，在一些问题上看法和感受不尽一致。今天我想针对外界对中国的一些看法谈谈意见，也介绍一下中国的近况。

中国是世界强国吗？这是一个中外看法差距比较大的问题。外界常常视中国为世界级强国，甚至是世界第二位大国。但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依然是个发展中国家。在中国人看来，我们这个大国也许在人口和地域上当之无愧，但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总体实力上，与发达国家依然有巨大差距，自身发展面临着外界难以想见的困难和挑战。

2008年北京奥运会隆重开幕后，有英国记者问我，中国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我说，是让13亿人吃上了饱饭。

对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来说，吃饭问题自古以来一直是政治的中心课题。在漫长的历史中，围绕着能否解决吃饭问题，历代王朝兴起衰落未曾停歇。现在我们用一代人的时间实现粮食自给自足，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食品的短缺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过去几十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人们是否感觉更加幸福了呢？这倒不一定。以80后为例，他们是中国吃饱饭的第一代人，但他们却认为自己已经老了，每天疲惫不堪，在高房价、工作竞争和生活费用上升的压力下苦苦奋斗。

中国人如今面临的挑战是更高层次上的，其困难和严峻程度也同样是很不轻松的。例如这几天的热门新闻话题是九百多万学生参加大学高考。同时，今年将有近700万青年人从大学毕业，就业竞争相当激烈。北京冬天出现的雾霾让人们意识到，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对于中国的农民工来说，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无法融入城市生活，难以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和待遇。出生于城市的第二、第三代农民工尤其有被排挤在外的失落感。区域发展的差距也相当大，只要走出北京或者广州300公里之外，就会发现那里有些人的生活状况依然贫困。

随着中国进入一个超越基本需求的时代，人们开始追求新的梦想，希望有更稳定的就业机会，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环境和文化设施。人们希望法治得到更好的落实，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希望自己的国家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能为祖国感到自豪，能感受到作为世界公民的尊严，希望国家和人民的安全能够得到很好的保卫，等等。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梦这个概念恰逢其时，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梦是国家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与国家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中共十八大为国家发展设定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GDP和人均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第二个目标是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高度重视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和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则要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保基本兜底线。中国将致力于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的重点是人的城镇化，这将涉及6亿人口，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如果将来能顺利推进，将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消费需求。

中国面临的挑战很多，包括环境恶化、能源短缺、产能过剩等等。应对的手段之一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结构，促增长，从依赖于投资和出口转变为由技术进步和低碳经济带动发展。

中国需要加强依法治国，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制定立法规划，尤其是在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加强立法建设。我们现在有244部法律，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还需要制定更多的法律，尤其在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加强立法，注重立法的质量。同时，要加强执法，培育知法守法的社会文化，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就是中国前进的方向。美国完全可以参与这个进程，发挥重要作用，并从中国发展带来的机会中获得利益。

今日世界正在发生新变化。中国、印度、南非等昔日长期落后的国家经济开始较快增长，而一些发达国家则深陷金融和经济危机，双方差距有所减少。在此背景下，有观点认为，世界权力正在转移，新兴大国将对传统的世界领导者构成威胁。

现实中世界权力也没有出现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世界面临的问题越来越需要各国携手合作来共同应对，所以，可以说世界权力正在从传统的中心地带向更广的范围扩散。

这种变化反映了现代世界的演进。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带动资本、技术、市场和人力资源更加快速、自由地从传统的中心地带向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扩散。许多国家被吸引到这个大潮中，走上工业化的轨道，它们获益于现有的世界结构，没有必要推倒重来。同时，为了更好地应对现实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各国正通过二十国集团和多哈回合谈判等平台，推动国际治理体系的改革。

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依然在世界的许多方面居于领先地位。你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最有活力的创新力，高端的制造业，最赚钱的公司和品牌等。当然，你们也有你们的困难，有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聚精会神，不迷失方向。新一届领导人在这方面表现出来坚定的意志和睿智。

如果要问，中国人对美国有什么看法？至少有一点，那就是对美国人总以“政治不正确”的眼光看待中国感到厌倦和反感。无论中国的变化如何天翻地覆，关于“人权问题”的指责依然在继续，一些美国人看中国的陈旧态度如故。

2013年5月，我出席瑞士圣加伦论坛，有一些在网上征文获奖的中国学生也参加。当会上有人提出那些关于中国人权的老问题时，一个中国女孩站起来问会场里的人：你们能不能有点创意啊？可见中国的年轻一代人是多么希望在21世纪的平台上进行对话。

现实世界的发展比观念的变化还要快得多。在我三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能看到今日中美合作之紧密，远超乎想象。我们能够合作应对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信任和理解不断增加，比如六方会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近年有人担心中国的周边开始变得不那么平静，我更愿从历史和全球的角度看中国的周边。冷战结束后，世界许多地方出现问题甚至冲突，而亚洲整体保持了相对和平，这使很多国家能专注于发展经济并且取得成功。这当然离不开各国的努力，而中国奉行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国内政治保持稳定和经济繁荣，做出的贡献也功不可没。我们也非常希望中国与东盟国家围绕如何维护争议地区安宁而达成的原则得到遵守，地区的和平秩序得到尊重。

中国在很多场合都表达了欢迎美国在本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态度，美国在亚洲有着长期交往和重要影响。但是人们也不禁提出一些疑问。美国在冷战期间把投入的重点放在欧洲，其原因大家都是知道的，“9·11”之后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中东专注于反恐。现在，在亚洲总体形势向好之际，美国开始转而聚焦亚太。随着一些意想不到事情的发生，人们要问的是，美国的投入是否能有利于地区和平发展的趋势？中美两国能否为此而开展合作？亚洲也许将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一个实验场。

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挑战都关系到我们星球上的共同利益，例如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核武器的扩散、食品的保障和安全、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在应对这些挑战上，大小国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

我们能超越旧时代，用新的眼光看待彼此，信任彼此，就有可能找到共同基点，找到合作之路。否则难题只会更加困难，更加复杂。

中美元首已经指明了两国合作的光明前景。我们应倍加努力，携手合作，让21世纪的世界更加美好。

---

1. 2013年6月12日，傅莹应邀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演讲摘要于2013年6月13日刊登于中国人大网。

中国会怎样影响世界㊟

最近出席国际会议强烈感受到外界对中国更加重视，都关心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想知道中国会发生什么、将给外界带来什么。最常听到的问题是：中国会怎样影响世界？

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是中国的快速成长，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贸易总额与美国平分秋色，一些西方政客看中国有蓦然回首的错愕。他们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面临的种种困难缺乏了解，长期从意识形态角度挑剔中国的习惯也使他们很难理解中国的政策和艰苦努力。但是，外界已经开始从期待新兴世界大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关心的焦点是，中国将以什么方式去实现自己安全和利益的最大化？又将如何影响世界？大国的利益是流动的，会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和对全球配置需求的上升而不断扩展。历史轨迹显示，成长中大国面对的考验和挑战在于，能否使自身利益的延展与世界性趋势，或者说是与大部分国家的利益相辅相成、顺势而行。这道难题曾阻断过多少大国梦。

习近平主席讲中国要有正确的义利观，其要义就在于此。讲义是讲道义，讲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顾及他人利益，甚至有时需要予他人以利、自己取义。这有别于传统大国将自身利益凌驾于他人利益之上的旧习、甚至不惜以炮舰推进利益的做法。中国以和平发展的方式走到今天，既是自身理念使然，也是时代条件的必然。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需要包容国际社会一些共性的、成功的观念和准则，也要不断完善自己的义利观念和现代国家关系原则。中国能给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还是会源于自身优势，例如在经济上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机会，在消除贫困和环境治理

方面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多借鉴。当然，成长中的大国难免会面临对利益的挑衅和侵犯，且难以用回避的方式求得安宁，需要在挑衅张力的范围内做出明确的行动和表态，从而制止更多挑衅，必要时推进规则的再确认或者制订新的共同规则。

随着外界关注的上升，中国人可能会听到更多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观点和疑问。我们需要倾听，也需要提高增进国际了解的能力，更多地去宣介自己的意图和道理，减少成长过程中与世界融合的阻力。

---

1. 本文于2014年1月2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第5版《名家笔谈》栏目。

中国的改革发展让亚洲和世界更安全㊟

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人们再次反思大战爆发的根源。的确，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人类才能少走弯路，避免重蹈覆辙。

100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在牢记历史的基础上，实现了真正的和解，成为地区一体化的先行者，统一了市场，催生了欧元，不仅维持了历史上最长时期的和平，也实现了巨大的繁荣。欧债危机促使欧洲国家调整政策和方式，但欧洲的前景仍然光明。

作为来自中国的与会者，我和大家一样，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年代。正是因为人类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汲取了经验和教训，和平才压倒了战争，进步才战胜了落后。

在中国的焦点是另外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人均收入比2010年时实现翻一番；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习近平主席将之概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是要让13亿中国人过上好日子，劳有所得，少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要让每个普通人都有权利和条件生活得更有尊严，这是中国梦的吸引力所在，也是中国发展成功饮誉世界的魅力所在。

中国人民对实现这一梦想充满信心，对前进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也有清醒的认识。2013年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上任的第一年，中国

经济承受了巨大的下行压力，但是仍然成功实现了GDP7.7%的增长，而且通过坚持改革，稳住了增长。

中国这些年取得成功的秘诀是改革和开放，这也是中国继续前行的动力。2013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其中涉及300多项改革措施，涵盖了各界关心的方方面面的问题。

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中国全国人大承担着为改革提供法律保障的使命，目的是使改革有法可依，有序进行。人大也将根据改革的总体要求完善和发展自身，包括进一步履行对“一府两院”的监督职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过去几十年，中国没有卷入大的国际冲突，并日益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的主要力量，尤其在亚洲，中国发挥着重要的聚合作用。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历来特别重视与邻国的关系。不久前，习近平主席提出“亲、诚、惠、容”的睦邻新理念，旨在倡导包容精神，促进亚洲国家的理解和信任，推动各种经济金融合作，使亚洲继续成为21世纪最有吸引力的地区。

和平、发展、合作是当前亚洲国家关系的主流。亚洲国家经贸联系日趋紧密，人员往来越来越频繁。去年中国到东盟国家旅游的人数超过1000万，每周往返中、韩之间的航班达到800多次。中国在与东盟国家和与日、韩对话中积极倡导合作，在东亚峰会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地区合作机制更加成熟，成为推动亚洲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力量。

亚洲国家之间也存在一些分歧和争端。现在大家都比较关心中日关系。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根源是日本领导人的历史观存在问题。日本只有对侵略历史有正确的认识，才能走出精神上的自我羁

绊。在21世纪时代变迁中的日本，需要一个健康、开放的心态，适应新的形势，否则很难成为亚洲大家庭中的建设性一员。

中国与一些邻国存在领土、领海等争议。我们将在坚持主权原则的基础上，本着善意和坦诚的态度，继续通过协商与对话妥善处理。中国与东盟国家正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启动了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在朝核、阿富汗等问题上，中方也在发挥建设性作用，为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宁不断做出新的努力。

亚洲是中美利益交汇最集中的地区。中国领导人提出，中美两国应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如果两国能从亚太地区做起，一步一步地取得成果，就能共同将这种信息传递出去，给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一个定心丸，这样也可以打消某些国家试图从中美摩擦和矛盾中渔利的企图。

与一百年前相比，今天世界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全球化带来的扩散效应，资金、技术、市场和资源等从以欧洲为代表的传统中心地带，向长期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扩散，一批又一批新兴国家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全球几十亿人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这也促使国际治理和世界权力发生调整和变化，国际事务不再完全由几个中心国家决定，全球问题也难以由个别国家解决。这不仅增加了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的力量，也使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世界因而更加多元、精彩。

日新月异的变化使我们相信，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不会倒退到100年前，亚洲也不是100年前的欧洲。任何人如果试图挑战人类良知和国际道义的底线，都会遭到世界人民抵制和反对。

---

1. 2014年2月1日，傅莹应邀出席在德国举行的第5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参加“全球力量与地区稳定”专题的讨论并发表讲话。讲话全文系首次整理发布。

如何看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目前在外交上很活跃，领导人出访和接待来访的日程相当丰富。习近平主席刚出席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4次会议，并访问了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正在对斯里兰卡和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受到高度关注。

中国人大与外国议会之间的交往也非常多，几乎每周都有议会的代表团来。感觉外界对中国的关注和期待非常高，同时担心也前所未有。

今天主要围绕中国国际地位与大家交换看法。

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变量，所谓：“世界最可预测的是中国的不可预测”。围绕中国最纠结的有三个问题：

一是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世界大国？

二是中国是否要与美国争夺世界权力？

三是中国能够为世界做什么？

一、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世界大国？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国内与国际上的普遍看法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外界基本上就是认为中国是世界强国，世界是以对一个新生大国的期待来观察和期待中国。

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外界过高估计中国。我每次在国内讲课会先测试下：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结果很少有超过10%的人赞同这个说法。

而对美国来说，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追赶的现实，美国在19世纪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后起大国如此接近美国。

我们都记得，冷战后美国拥有绝对的“一超”地位。进入21世纪的头十年，美国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2007年开始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软硬实力全面损伤。而中国这些年稳步发展，既没有内乱，也没有卷入外部纷争，加入世贸组织后，同全球的经贸关系也是突飞猛进。

2000年中国的GDP是1.2万亿美元，占美国的九分之一，2012年达到8.2万亿美元，占到美国的一半，也就是说，12年间从美国的九分之一上升到二分之一。

中国的成长最重要的是搭上了冷战后全球化的快车。随着东西方壁垒的消失，世界的资金、资源、技术和人才乃至市场，都从过去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心地带，向更加广阔的边缘扩散。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得以利用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中国人的勤奋和中国制度的高效使中国有条件更好地抓住机遇。

这个变化对世界的意义非常大，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转折性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同时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根据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研究，1988年到2008年的数据显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新兴国家经济体

的中产阶级。相应地，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相对地位受到一定削弱。根据预测，未来到2050年，中产阶级消费占总人口消费水平最高的国家将是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现在就是世界大国了呢？我感觉，普通中国人对国家国际地位的看法是很清醒和客观的。一方面，中国确实还存在贫困，从习近平主席走访贫困地区的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到他们头顶上转着的生锈的老式电风扇和报纸糊的墙面。李克强总理谈到，他去考察棚户区，冬天有些居民要戴着棉帽、穿着棉衣睡觉，他用“政府的心头之痛”来形容。

但另一方面，中国对国际事务介入的机会和能力都在变化，是在上升，国民对世界更加关心和有参与的兴趣。如何定位中国呢？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中国应该是一个有比较大的地区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同时中国也存在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例如国家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也还有领土仍然在别的国家控制之下。因此中国这个大国是不完善的，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处于爬坡阶段，中国需要继续努力发展自己和广泛开展国际合作。

二、中国是否要与美国争夺世界权力？

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悲剧》一书讲到，国家的国际目标就是追求国际霸权，所以中国的上升必然构成对美国的威胁。

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学术界喜欢从大国争夺和冲突的角度去观察。2013年，我在美国一次晚宴讲话中说到，中国人还不认为自己现在就是一个世界大国，也不想争夺国际权力，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在场，她印象深刻。半年后我们在韩国又碰到，她问我，你是否讲过中国人不认为自己的国家已经是世界大国，也不想争夺国际权

力？她说，“我在一些场合引用了你的话，人们都说我一定是听错了”。

最近在阿斯彭部长论坛上又谈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和中国的意图。我说中国许多人对取代美国没有那么大的兴趣，结果会上的人们都笑了，说谁能相信呢？我只好反问：“难道国际社会真的希望中国成为美国吗？世界需要再出现一个美国吗？”这回大家又都笑了。美国代表有点不快，说：“美国怎么啦，美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她补充了一句，“乔治·布什除外”。

确实，世界上很关注，想知道中国这个新生强国要做什么，尤其在亚洲，是不是想把美国赶出去。许多人不了解中国周边出现的涉及领土争议的紧张多是邻国主动挑衅导致的，中国不可能再任由他国夺取自己的领土和海洋权益，毕竟是21世纪了。但是中国并没有扩张的政策。

我观察，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读是相当严重的，在中国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世界的依赖和需求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这种误读容易带来干扰。现在美国处于收缩期，如果将来美国有所恢复，角度进入扩张期时，还对中国有很大的威胁感，就会形成更加强硬的对华制约政策，对国际合作不是很有利。

三、中国能够为世界做什么？

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是相当前瞻的。就在2011年，中国政府援助马其顿23辆校车，却始料未及地引起了国内公众的质疑。在那之前，刚刚在边远地区发生了校车事故，一些孩子失去生命。网上评论说，中国约有2.3亿中小学生，其中9000万学生需要乘坐安全校车，专业校车需求超过100万辆，而校车保有量却刚过1万辆。很多地方的孩

子乘的是不合格校车，更有一些贫困山区的孩子，步行几十里山路上学，有的甚至还没有鞋穿。国内的事情都没处理好，为什么千里迢迢跑去援助别人？

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个双月开会，审议各种议案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报告，讨论总是十分热烈的。从中我能感觉到，国内问题确实很多很严峻，中国人的专注点在国内，而且会比较长的时间如此。

但是，中国人并不是因此而不关心世界，不愿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外界的主要分歧在于，当今世界事务主要是西方国家主导，尤其是美国，它们对其他国家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是“follow me”，就是跟我走，帮我忙。

也是在阿斯彭部长论坛上，英国前外长、国际救援委员会主席米利班德介绍叙利亚已经有950万难民，给周边国家带来巨大的压力。他呼吁各方支持，也很希望中国能发挥作用。我说，要问我的观点，首先是停火吧。无论当初为什么而打，现在造成的损害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想解决的问题。

中国人看国际上发生的这些事情，还是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观察的。西方赢了冷战，就觉得赢者通吃，一直在国际上强势推进自己的制度、理念和价值观。在许多地方发生的问题带有冷战的影子。冷战本身持续了40来年，现在结束了已经20年，但是好像还是没有完结，真是一个漫长的结束。

所以，从政治上看，中国基于自己的理念，并不认可许多所谓的国际责任。当前中国尽国际责任主要是从联合国的角度出发的，例如，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人数最多的国家，过去5年来中国军舰在亚丁湾为5600多艘商船护航，其中一半是外国商船。

中国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生力军，利用自身快速增长的财富使人民基本摆脱贫困。同时，中国为非洲国家提供优惠贷款、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在非洲兴建学校、培训师资、增加对非奖学金名额等。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过去几年，全球经济的增长约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的贡献。我想，如果将来中国能更好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应该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且符合中国自身特点和理念。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比较好地契合了中国的优势和周邻国家的需求，是双赢的公共产品。

---

1. 2014年9月17日，傅莹应邀在汇丰银行董事会年度晚宴上发表演讲，谈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等问题。有关讲话内容系首次整理发布。

中国的成长与“秩序之争论”㊟

如著名建筑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所言：“我终究认为芝加哥将是世界上留存下来的最美丽、最伟大的城市。”

但你们是否知晓，在中国，芝加哥的大学更出名。那些希望学费物有所值的家长们尤其对这所大学感兴趣，因为这里“乐趣已死”（Where fun comes to die）。

芝加哥大学培养了无数的音乐家、科学家和政治家。你们中一些人如果选择了这样的道路，未来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祝福你们。

我猜想，这里的学生大都出生在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他们被称为90后。这个时代出生的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无论他们在哪里，都能几乎在同一时间获取最新信息。

对于我们这代人，当我得知世界上有个操作系统叫Windows时，比尔·盖茨先生已经是世界首富了。而现在，太平洋彼岸中国时尚的年轻人与这里一样，对每次新版苹果产品的发布翘首以待。《速度与激情7》在北京和芝加哥的电影院差不多同时上映。

我也许有些理想化，总在想，在海量信息全球同步的今天，年轻一代能否更加宽容、能否更好地相互理解，从而寻求新的途径来构建维系持久和平的全球秩序?

奥巴马总统于几年前的父亲节在这里发表过一个演讲。他说，作为家长，需要传递给后代最重要的价值是同理心，能换位思考，设身

处地去认识世界。

今天我就想先谈谈中国在世界变迁中的经历。基辛格博士《世界秩序》一书在中国引起了热烈讨论，书中叙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400多年的大国兴衰，强国之间一而再、再而三以战争方式争夺世界权力。

但是，基辛格博士也谈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具普遍性，在世界其他地区曾有不同的体系，彼此孤立地存在。众所周知，那时还没有网络的存在。

就中国而言，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独特的治理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时至今日仍有影响。因而我们对世界的观念也许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我可以沿着书中世界秩序演变的轨迹，举几个中国历史上的例子：

你们大概都曾经读到过，1648年欧洲达成威斯特伐利亚系列和约以结束“30年战争”，之后，初步建立起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秩序，确立了内政自治原则，随后便把殖民统治推向世界其他地方，包括美洲。而美国是1783年才摆脱了殖民统治，宣布独立。

而早在此之前，亚洲长期延续着自己独特的治理方式，各国和睦相处。当时中国的清王朝处于鼎盛时期，到18世纪中国人口已经超过欧洲国家的总和。但是，这个延续近两千年的田园般宁静在19世纪中叶被欧洲帝国打破。

到了1919年，当欧洲签署凡尔赛和约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亚洲大部分地区已沦为欧洲的殖民地，中国的领主完整也屡遭侵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帝被迫退位，政治精英构建共和体制和西式议会的种种努力纷纷失败，国家陷入内乱。年轻人开始从其他方向寻找解决问题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于1921年由几十个人建立的，许多都是20多岁的年青人，他们不比你们年长多少。（看看年青人是怎样改变着世界，真是神奇！）

1941年，当《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宣告“美国世纪”来临之际，中国约2/3的国土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蹂躏，战争中伤亡人员达到3500万。2015年9月，中国将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缅怀英烈、牢记历史、珍惜和平。中国和美国当时并肩作战，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美国飞行员的英勇事迹。

1949年中国终于重获和平，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当时的国家满目疮痍，经济近于崩溃，人均寿命不足35岁，文盲率达到90%以上。

换句话说，“二战”后多年，当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世界权力、建立起所谓的恐怖平衡之际，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生存问题，包括满足庞大人口的吃饭需求。我们走过不少弯路，年少时经历的饥饿和困惑我记忆犹新。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因此，当中国人讲到国际秩序时，通常指的是中国作为成员参与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构和机制。鉴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一直信守和遵循《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出席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峰会，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我讲述这段历史想表达的是，在讨论历史和秩序时，需要注意到各国有着非常不同的经历，这对我们观念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这也是

为什么，各国在一些问题上的感受不尽相同。

我想讲的第二点是如何看中国的成长。显然，在中国获得快速发展之时，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并没有同步增长。一位常年观察中国的欧洲记者朋友如此概括说，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是中国太大——人口多、城市大，中国人买什么什么消量就猛增。

二是中国太坏——好像中国总是在做错事，看不顺眼。

三是中国太怪——吃奇怪的食物，有奇怪的行为方式，例如广场舞。

我经常接待来自美国国会的代表团，很多人第一次来中国。令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天天碰见的普通中国人，比如在故宫博物院里摩肩擦踵的农民工游客和那些梦想成为下一个马云的年轻创客等。

实际上，是普通中国人代表了中国的真实面貌和国家的进步，是他们推动着中国走向富强和成功。

那么，成长起来的中国想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呢？未来的前景是否如某些学者所预见的，必然是中美争夺世界权力？这是我想讲的第三点。

我常常阅读美国政治家撰写的回忆录，美国对世界事务的深入和有效参与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也时常感叹于美国人对其他国家的事务如此热情和强势地介入。

掩卷思量，不禁要问，美国人心目中的世界秩序，是否就是美国治下的世界呢？是否就是仅以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理念、

以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为支撑？而对于新兴大国来说，是否面对的只有臣服或挑战这两个选项？换作是美国人，你们又当作何选择？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新兴的大国，而且并非依靠炮舰开路成长起来的，我们是结合了自身的天然优势与全球化的机遇发展起来的。欧洲引领工业化以来，资金、技术、市场、资源和人才主要集中在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世界，而如今，所有这些要素都在全球化推动下开始向外扩散。

顺着这个浪潮，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断释放巨大的政策红利，实现了3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9%的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日中国是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有人甚至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世界第一位。

但是，当一些国际学者讨论新的世界权力分配问题时，他们会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中国人很淡定，对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世界权力转移或者“世界权力之争”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

对中国人而言，我们经常感受到的是在标准上的不一致问题。例如，在西方国家，当有人滥杀无辜时，他们被视为恐怖分子；而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就被看作是民族或者是政治问题。当中国的邻国在领土问题上做出挑衅的姿态时，美国不置一词；而当中国捍卫自身权益时，就常被说成是咄咄逼人或者胁迫别国。

如果在最基本的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的基础，我们何以在世界秩序演进这样的问题上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呢？就像广东人形容人与人无法沟通时讲的：是“鸡同鸭讲”。

中国目前的重心还在于解决大量棘手的国内难题，包括克服环境污染、反腐败、缓解经济下行、更好地保障民生等等。

同时，在应该构建什么样的未来世界秩序上，中国学者也进行着务实的讨论。大家可能各持观点，但一个共识是：世界已经发生变化，许多旧的概念失去了意义。

首先，在当今世界，不同的秩序像过去那样，在各地区隔绝地平行存在的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今天的秩序需要具有开放性，并且要逐步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和多元的观点。

其二，再通过大国之间战争的方式实现“权力转移”，重新决定新的力量平衡，也没有可能了，因为世界各国关系已经如此紧密交织。

其三，我们所面对的大量新型问题都是全球性的，超越了主权国家和区域的边界。像埃博拉病毒、ISIS，像试图乘船从非洲前往欧洲的移民。需要新的思维和新型全球框架或者说是全球秩序，去应对新型挑战。

令人有所宽慰的是，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行许多有意义的实践，用创新和合作的办法应对和解决新的问题，例如G20和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也倡导了“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来增强亚洲和亚欧大陆之间的互联互通。这些实践是对现有国际秩序和合作框架的补充，使之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和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基辛格《世界秩序》一书是以一种很有深意的设问方式结束的：“我们走向何方？”显然，历史又来到了新的转折路口，关键是将向哪里转变。

这个问题也适用于中美两国，我们是否有决心和智慧走出大国冲突的历史窠臼？能否合作开创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秩序？为此，习近平主席向奥巴马总统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两国之间尽管受到误解和偏见的干扰，实际上在许多领域都建立起密切的伙伴关系。有人甚至把两国比作不情愿的双胞胎。两国互信的水平也相当令人印象深刻了。否则，我们何以相互颁发10年有效期签证？由此可见，年青一代继承的两国关系积极因素大大多于负面因素。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不会一帆风顺。但双方都认识到，要加强合作、管控分歧，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这既是两国关系的方向，又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21世纪全球秩序的演进并不容易，也不是朝夕可得之事。但未来寄望于年青一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拿出很好的答案！

---

1. 2015年5月20日，傅莹应邀出席美国芝加哥大学首届美中关系论坛框架下的学生公开论坛并发表演讲。演讲全文刊发于外交部和中美交流基金会网站。

关于新时期中国的对外叙事[注]

2015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也是“一战”百年之后的第一个年头，世界又一次站在了变革的关口，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变量之一。看中国增加了新的视角，要“从中国的今日看中国和世界的未来”。

所以，本届中国学年会以“中国改革，世界机遇”为主题，是个很好的切入点。它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应该如何认识中国的变化？这个将给世界带来什么？世界又将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在今天的讨论中，许多人谈到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发布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建议稿，这是我们第一次将国家的经济规划和全球经济发展联系在了一起。规划中写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强调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要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大通道建设，要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十三五”规划的核心词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更加突出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外界重视解读“十三五”规划，当作判断今后五年中国发展和全球经济走势的重要依据。这进一步反映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对海内外中国学研究者来说是新的平台。

最近读到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他批评世界对中国缺乏共识，在支持中国还是遏制中国之间徘徊，他不认为美国和西方为中国的崛起做好了准备。同时，他对中国自己是否做好了准备也提出疑问。2015年11月初他在北京见到我的时候说到，中国要求在国际事务中得到更多发言权和更多尊重，但在许多国际事务上又强调自己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他说中国不能又想做世界大国，又对国际责任躲闪。他的观点是有一定代表性的，说明美国人对中国

的政治立场和情感缺乏了解和认识，常常从自己的角度和利益出发，因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而产生情绪，进而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思维。而中国人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策思维也不完全理解，双方在国际重大问题上有共识也有分歧。

中国对西方世界来说，是一本新书。我接触过许多普通美国人，他们第一次来到中国之后十分感叹，现实的中国与他们所读到的情况太不一样了。显然，在西方世界的信息库当中，关于中国的知识是欠缺和片面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觉得是双向的：一方面，在西方世界还有很多人不能放下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有的人还背负着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往往从“政治不正确”的角度去评判中国，难以真正认识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人也需要提高向世界讲述自己的能力，构建中国叙事。这个并不容易，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我们的对外叙事容易进入西方语境的轨道，抑或完全走中国传统话语系统，而看起来，这两者都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与西方相比很不同，但不是完全对立的。我自己的体会是：

第一，我们必须坚持立足于中国根基和中国特色讲中国。就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例，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实质上是一种权力委托，人民把属于自己的国家权力，委托给选出的代表去行使。各级人大在沟通和反映民意、指导国家决策和立法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很难拿中国的人大制度去横向套在任何其他国家的议会制度上做比较，那样既不准确，也难让人理解。

因此，中国叙事要立足于中国政治现实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当然，也不需要涂脂抹粉，我们确实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我们的制度需要不断完善。讲成绩也讲问题才能构成完整的中国画面。

第二，中国确实要努力在国际体系中赢得更多的机会和话语权，同时，我们也需要增强发挥作用的能力。我们需要研究如何能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如何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更高的国际地位意味着更多的责任，我们对责任的认识和表达要跟上国际地位的上升。

第三，中国人需要逐步走出苦难和悲情的心态和表达方式，在中国叙事中不断增加阳光、自信、包容的色彩，更加坦荡地阐释中国的战略目标和政策意图。

习近平主席用“三个前所未有”来标示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他说：“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个自我判断是中国叙事的根基。

中国的发展进步有目共睹，在今天的发言中，许多学者用大量数据说明，中国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世界大国，国际上认为我们是世界强国。基辛格博士说，中国恢复了曾经的辉煌，又一次拥有了深远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我们仍然受到大量难题的困扰，今天大家对问题谈得也很充分。一个形象的说法是，在中国，既可以看到欧洲，也可以看到非洲。我们目前的经济转型升级也相当艰难。

而外界对中国最大的疑虑是，一个新生的、体量这么大的世界强国是否会带来不稳定甚至战争，这恰恰说明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是不完全和不深入的。中国叙事正是需要解决中外认知的巨大落差，用更加系统完备的理论，更加直白和有说服力的话语，让世界更好地了解我们、相信我们。如此，才能为实现两个百年的目标构筑更加平和、稳定的外部环境。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经历了两次热战和40多年的冷战，现在又有人开始谈论“凉战”。而中国人民和世界最广大人民希望的是什

么呢？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世纪。那么，实现这个愿望的具体路径应该是怎样的？中国能做什么？希望世界做什么？世界需要中国做什么？这些都是亟待探讨的大问题。

所以，能不能这样认为：构建完整和有效的中国叙事，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中国学的现代课题。

---

1. 2015年11月20日，傅莹应邀请出席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并发表题为《关于新时期中国的对外叙事》的演讲，演讲节选发表于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网站。

和平最符合人民利益、最有利于人类发展㊟

2017年5月下旬，中美智库联合研究的中方报告在北京发布的时候，同步举行了以“超越分歧，合作共赢”为主题的研讨。当时学者们对中美两国领导人海湖庄园会晤之后两国关系的发展有很多期待，同时，大家对当今世界前景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忧，美方学者对中国的国际意图提出很多疑问。我观察，国际战略学界有的专家看问题比较固化，有一种“国之交，你赢就是我输”的思维方式，这样的研讨很磨人。

为给讨论带进一些新鲜空气，我们邀请了几位新经济企业人做午餐演讲，他们分别来自腾讯、京东、摩拜单车和快手，他们的讲话展示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络应用技术发展速度之快、创新力量之巨大，不仅给美国学者，也给中国学者带来了新鲜的感受，向我们提示了观察世界的新视角。我概括一下他们的观点就是：追求自己快乐，与他人分享快乐。

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压力感无时不在，容易陷入分析和预测的困境。我在想，如果国际行为体少考虑如何打击或者防范对方，多考虑如何创造和分享机会与快乐，世界岂不更好？这个想法也许过于理想化，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新经济人的成功反映了改革开放在新时期取得的成功，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中国成功保障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很难想象在一个战乱或者是动荡的环境中，能诞生这么多充满活力的创新成果。因此，和平最符合人民的利益，也最有利于人类的发展。

在今天的世界和平论坛上，围绕中国如何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有丰富的研讨。确实，中国这样一个大规模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

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世界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也是难以完全预料的。现有的国际利益结构将如何调整？全球市场和资源格局将如何支撑？中国会是什么样的力量、发挥什么作用？全世界都很关心。

这样的讨论对中国人来说是比较陌生，但我们已经不能回避，世界正在重新审视中国，中国也需要确定新的历史方位，正如习近平主席讲的，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三个“前所未有”正是当代中国的新坐标。

今天给了我一个很宽泛的话题，让我讲“任何愿意与大家分享的想法”。

我想讲的第一点是：对于中国人来说，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走好自己的路，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改革发展目标，落实好“十三五”规划，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不断完善法治建设、提高综合治理能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一直以来中国人以发展为“硬道理”，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但是“发展”的成功也推动着发展的内涵升级，不再是单纯地追求GDP增长，而是有质量的发展，绿色和均衡的发展，同时，随着财富的增加，社会对公平分配和从严治理的要求也提升了。总之，中国的发展并不均衡，还有短板，路上的陷阱和坎坷也不少。因此，集中力量发展好自己、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各种难题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的重中之重。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对外政策必然要反映国家最根本的利益，就当前的形势来讲，就是要为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构建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并且确保中国的成长和人民实现富强梦想的进程，不被干扰和中断。

我想讲的第二点是：中国要准备好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更大贡献，为人类的未来承担更多责任，我们的社会需要培育这方面的意识和能力。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对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和顺势而为是中国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同时也必须看到，维系和平、促进发展的因素和挑战和平、阻碍发展的因素都在增加。当然和平面临的主要挑战不再是大规模战争，至少大国之间的战争因为核武器的存在而继续得到制约。但是恐怖主义、混合战争、“凉战”等新型或新旧形态混杂的挑战越来越复杂。

然而，国际安全的机制并不健全，难以形成合力，如何构建全球安全管控是一个大难题。联合国维和机制是最能代表共同安全利益的，但不足以防范和应对所有挑战。而美国作为世界军备最强的国家，坚持以军事同盟体系作为全球安全支柱，但这个同盟体系是排他性的小圈子，不仅不能包容和关注非同盟的安全利益，也无法解决当今世界的许多安全难题。事实上，恰恰是美国一些战略失误加剧了安全挑战。

面对新的安全环境，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都应探索新路径。刚刚举行的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涉及到许多重要的安全问题，这样的对话体现了两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寻求协调与合作的努力。

人类历史上，新兴大国崛起的过程，也是世界利益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国的成长与世界现存结构体系之间无可避免地会形成某种“张力”。历史的教训是，大国在处理这类矛盾时容易出现冲突。中国要避免这种结局，就必须探索能协调彼此利益的新范式。正像人们能从共享单车中获益，国家也应能从共享和平、合作共赢中获益。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国际社会携手迈向共同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倡议，主动向国际社会提供新型公共产品。这些主张和倡议突出共商、共建、共赢的理念，形成一整套新的思想体系，是对世界变革的积极回应，堪称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理论创新。这些倡议在实践中被证明是符合现实和国际社会需求的，当然也会遇到新的问题，需要在解决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不断完善。

我想讲的第三点是，中国要不断提高与世界打交道的能力。李光耀可能是对中国的成长很有前瞻性预见的人，他曾谈到，中小国家将面对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人”。这些年，周边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和外交行为非常关注，我们需要对外界的反应保持敏感，及时回应，更好地增信释疑。

大国需要有比较好的舆论动员能力，需要与国际社会保持多层次和有说服力的沟通，为此，我们需要不断提升和更新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所需要的外交、国际法、舆论和经济等方面的手段和能力。我想，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中国人保持谦虚谨慎的学习精神是很有必要的。例如，当中国的利益与他国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如何向国际社会做说明？大国不难使用强制力解决分歧，但如何管理后果却是无法逃避的难题。历史评价一个大国是否成功，不光看它如何施展实力，也要看它如何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

我们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理念和主张上，需要脚踏实地地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

---

1. 2017年6月24日，傅莹应邀出席第六届世界和平论坛，并发表了题为《和平最符合人民利益、最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晚宴演讲。演讲全文略经修改，发表于世界和平论坛官网。

其他

忆吴建民大使㊟

2016年6月18日听说吴建民大使出车祸，不敢相信。19日我来到吴建民大使的家，夫人燕已经在门口了，她还是那样，消瘦而硬朗地站着，握手挺有力量的，保持着她一生的坚韧态度。进门后，我到吴大使的肖像前摆了一束白色的花，墙上挂着遗像，看着他那份熟悉的宽慰人的微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怎么会？我听到身后燕轻声地叨咕着："总觉得，什么时候门一开，他就走进来了……"真是让人心碎。

年轻时候就是因为燕认识了吴建民大使，当时我刚从驻外回来，被分配到外交部翻译室英语组，燕是资深翻译，负责指点我，也因而成为我一生最重要的导师之一。我这个人出道晚，做什么事都有点漫不经心，有今日如此认真和严谨的态度，多亏了导师近乎苛刻的严厉。她有意识地矫正我的随意性格，出现任何小的纰漏都会不依不饶地教训，我真是怕她了，也是因为怕，才凡事都一核再核，培养起好的习惯。我们当时都更喜欢吴建民，他每天下班会准时来接夫人，一出现总是笑呵呵地，被我们戏称"家长来接幼儿园小朋友"。他也不介意，日日被取笑仍然乐此不疲。

做外交，外语基础很重要，否则在驻外使馆工作会比较困难，当时出国的代表团也需要使馆协助翻译。吴的专业是法语，夫人是英语，两位都达到专业翻译顶尖水平，但吴建民还很认真地学习英语，他私下聊到，有了英文他出国工作也有机会去英语国家，可以照顾到夫人的专业，否则总去法语国家，夫人随任业务就用不太上了。我当时看他们很温暖，外交部许多人因为专业的不同，夫妻天各一方，他们却是无论到哪里任职大都能在一起。

现如今，吴大使与燕却如此忽然间阴阳两隔，我坐在她身旁，觉得什么安慰的话都失去了意义。燕对事故一直发蒙，她了解吴有系安全带的习惯，反复说不应如此疏忽，坐在后排就不系安全带了？果然，就在我们坐在那里的时候，听到武汉来电话说，吴大使是系了安全带的。不过关于车速和其他造成事故的原因还需要调查。

出得门来，心情压抑。吴建民大使去世之后社会反响强烈，我从中认识到，这些年他面向公众做了这么多工作，在我们这些职业人士中实在难得。有公众也有不同声音，同去的利是我的年轻同事，她对网上信息十分感慨，问我怎么看。

我过去对吴大使的讲话非常关注，从中也学到不少，尤其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看历史还是看现实，他辩证的两分法认识对我很有启发，既要牢记落后挨打的经历，又要汲取不开放不改革的教训。他与国内不同意见的辩论也促使我思考。中国公众对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有着广泛的兴趣和关心，这种热情在世界各个国家中不很多见，应该是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历和目前国家成长带来的变化有关系。中国现代外交是从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开启的，因而，从第一天始就牵扯了太多的国民情感和国家权益。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渗透了大量的悲情意识和后知后觉的无奈。

吴建民大使不仅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有深入的理解和认识，自己也有大量的外交实践。我知道他在外交战线上是一个成功的战士，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压力或是复杂环境，他总是能够冷静判断，勇往直前。我很喜欢与他讨论问题，他有一种举一反三，从局部反观全局的习惯和能力。记得他在法国当大使时，我去出差，他很关心我负责的亚洲片的情况，仔细地询问当时正在推进的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包括中方提出这个建议的初衷、政策考虑和对前景的估计。他依据欧洲经验提示我更好地认识区域一体化进程和中国的机会。

对于他所参与的辩论，看得出来，吴大使生前是欣赏对手和认真准备后参与讨论的。从观察的角度，我认为吴大使对3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推行的外交政策吃得比较透，阐释的也相当丰满，他的观点显然是基于这些年实践证明获得成功的经验，是扎实的。但是，当前社会上出现的激烈争论也说明，在如何延续这些政策上，公众也有新的期待。也许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不幸事故，大家有时间做更多的思考和研究，让这场辩论走向深入。这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显然是必要的。

一个国家每个时期的外交政策都需要解决当时最重要的大问题，今天的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是国人的自我认识还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都很不一样了。近年中国的外交行为更加积极主动，赢得更多的国际认可。我最近与来访的外国客人谈话，发现他们集中关心的问题是：中国如何设计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和自己未来的国际角色？显然，我们需要在多年成功的外交政策基础上，构筑更加广阔的外交视野，不断更新理念和思维。与传统的发达国家现代化历程相比，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成就可以说具有“压缩型”特点，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思维的进步无法简化或者压缩，我们的时代思考如何跟上时代的变革，可能是学界当前面临的一个挑战。希望吴大使留下的思考和这场辩论提出的问题，能够促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外交思想，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更好地理解和诠释中国日益丰富的外交实践。

---

1. 2016年6月20日，全文发表于《译言译事》。

后记

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很快。2018年5月，此书付梓之际，中美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经贸领域的摩擦，显得更加突出。美欧与俄罗斯的分歧和围绕中东问题的冲突再度升温。朝鲜半岛的对话与缓和势头则再度重启。

还有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到底会给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和人的行为方式带来什么影响，很是发人深思。

世界还会好吗？“新冷战”是否不可避免？中国如何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有效应对挑战、发挥积极作用？

2018年4月10日，我有幸现场聆听了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重要演讲。他说：“放眼全球，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人类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

习近平主席告诫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善于拨云见日，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界大势。

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这个舞台从来未曾空场，“老剧本”不断上演，其中的情节并不总是美好，从古代自我毁灭式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近代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美苏你死我活式的“冷战”，权力争夺的剧目一次次上演。

中国人对于战争与和平的经历和知识是相当丰厚的。在2400年前伯罗奔尼撒战争上演的年代，中国正处于历时500多年的春秋战国群雄争霸的激荡岁月。历史留给中国人的思想遗产是要珍惜和平，维护安

定，而不是痴迷于战争。例如，孔子主张“和为贵”“慎战”，孟子主张“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即便作为兵法之圣的孙子也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策。

“国泰民安”始终是中华民族的追求。但是，中国在近代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能够很好地保家卫国，丧权辱国的教训十分深刻。因此，中国人民期待国家强盛。中国人深知，和平需要力量来保卫。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凝神聚气，团结一心，努力奋斗。我们是仍处于艰难爬坡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距离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自身改革发展的任务还很艰巨。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仍需要聚焦国内发展建设。

我们需要总体和平的外部环境。

与此同时，中国越来越认识到自身成长对世界的影响，意识到要对世界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需要在世界舞台上找到适当的角色。中国人需要更快地学习，更快地适应世界大国地位，学会及时和令人信服地向世界阐明自己的想法和意图。

世界需要一个“新剧本”，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还是正视新问题寻找新的解决办法，这个选择关系到未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蓝图，这应成为21世纪更好的选择。

很多事情仍在急速演变之中，尚没有最终答案。世界的未来终归要靠年轻人来书写。新一代人应能超越传统的大国争霸思维，找到国与国之间相处的新路径。未来令人充满期待。